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目 录

铁锤砸碎旧世界

——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退休老工人丁根福家史 ……………(1)

钢城老将话今昔

——上海第三钢铁厂退休老工人张秋远的家史 ……………(31)

大路新歌

——上海城建局沪南工务所老工人朱为山的家史 ……………(58)

雾海茫茫太阳开

——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老海员王友根的家史 ……………(76)

血泪漫“金山”

——上海五岭旅社(原金山饭店)老工人高启元的家史 ……………(121)

高楼大厦是见证

——上海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退休老工人吴田根讲家史 ……………(145)

铁锤砸碎旧世界

——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退休老工人丁根福家史

一九七四年春节前的一个上午，一辆上海牌越野汽车，迎着朝阳，向金山方向飞驰。紧挨着司机，坐着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显露着激动和兴奋的表情。他，就是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的退休打桩工、共产党员丁根福老师傅。

这一天丁师傅到公司去领退休工资，听说自己过去的老班组正在巨大的金山工地打基础。老班组的同志们，干劲很粗，提出了“十天打完三百五十根长桩”的战斗口号。利用两台桩架，十天打这么多长桩，这是打桩史上没有过的速度。听到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丁根福怎么也坐不住了，他决定搭乘公司的便车，到工地去看一看。他多么想去参加这场战斗，为社会主义建设出把力啊！

杭州湾畔的金山工地，方圆几十里的海滩上，千军万马，人声鼎沸，机声隆隆。满载着建筑材料的卡车来往飞驰；高大的红旗塔吊威武地伸展着巨臂，把几十吨重的大梁轻轻抓起，一瞬间就将钢筋铁骨拼结起来；土建工人正在争分夺秒，实现标语牌上的誓言：“一天一垛墙，三天一层楼”……。

下了车，丁根福老远就看见了两座四十米高的巍巍桩架，

“噙噙”的汽锤声，又亲切地在耳边回响。红色巨幅标语高挂在桩架上：“元旦社论鼓人心，赤胆忠心干革命；十天打完三百五，顶风冒雪学大庆！”大团大团的蒸汽从汽阀里喷吐出来，如一朵朵白云飘浮蓝天，好象谁用一支支巨大的彩笔正在描绘着社会主义祖国最新最美的图画。

面对着这幅生动的画面，丁师傅激动得眼眶都润湿了：只有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规模和惊人速度！

他走近桩架一看，除了几个老同事以外，还增添了不少年轻人。大家看老丁来了，都亲切地抢着和他握手。老同事们问道：“丁师傅这么大年纪，还跑到寒风飕飕的海滩边来干啥？”青年们打趣地说：“丁师傅心里牵挂着打桩活，是不放心我们吧？”老丁忙回答说：“不，不！大家这么干劲冲天，我这老头子能在家里安心吗？我要亲眼看一看祖国建设的新面貌哇！”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他熟练地攀上了桩架台，这儿摸摸，那儿拧拧，打开炉门，铲几锹煤，让炉火烧得更旺；扶正桩头，让基础打得更牢。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他擦了把汗，又来到卷扬机手身旁，一看开车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于是就在旁边仔细地端详起来：动作是那么熟练而果断，十吨重的榔头在他的操纵下，显得那么轻巧听话，用不了半个小时，长桩就深深地埋在地下了。老丁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等打完一根桩后，就问道：“学了多长时间啦？”青年人回答：“一年多一点。”老丁高兴地说：“学得真快啊，现在年轻人真是一代比一代强。”接着就对小青年说：“来，来，让我这老卷扬机手来试试。”小青年兴奋地说：“丁师傅，刚才打的桩头是第三百五十根，任务已经提前完成，

要到春节以后才有新任务。”老丁只得遗憾地搓着手说：“唉！这一趟我还是赶晚了哇！”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报喜的锣鼓响起来了。老丁亲眼目睹了如今建设的惊人速度，打桩的新水平，看到新一代茁壮成长。他深为自己是一名老打桩工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丁根福向海堤外极目望去，啊！茫茫大海，白浪滔天，打鱼船扬帆飘浮在海面。他注视着顺风鼓帆的船只，蓦然一个念头闯进了脑海，把他带到了遥远的年代……。

打桩小工的悲惨遭遇

那是一九二六年冬天的一个傍晚。

天空盖着厚厚的乌云，黄浦江上北风呼号，波涛滚滚。一只小船破浪而来，船到岸边还没有靠稳，一个身材高大农民装束的人，急忙一个大步跨上岸来。他赤着双脚，一条纳着密密麻麻补丁的裤子上沾满了泥浆，裤管卷到膝盖上。他背上驮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身后还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瘦骨嶙峋的青年。他们带着满面焦急的神色，匆匆地向浦东高庙方向赶去。背上的孩子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一只垂着的右手给一些破布裹着，渗透鲜血，变得殷红殷红。

这就是在上海“陈根记”做打桩工的丁家父子三人：中年人叫丁妙生，驮着的是他的二儿子丁根福，背后跟着的是大儿子丁全福。

当父子三人踏进黄浦江边的破屋时，天色已全黑了。微弱的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锅灶边，孩子们正在捡白天拾来的菜皮，单等着父亲买了米来下锅。一看到父亲驮着受伤的根福

回来，一家人马上围了上来。母亲心疼地抚摸着轧坏了手的二儿子，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如何给根福治伤哪？”年迈的祖母急忙从邻居家里弄来了一把香灰，给孙子轻轻地敷上，重新包扎起来。

丁根福全家共有十口人；年迈的祖母，父亲，母亲，一个哥哥，四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成年累月地奔波在打桩工地，东打点短工、西找点零活，挣回几个钱，哪里够一家人吃的！祖母和母亲白天在全家仅有的一亩土地上种些菜，夜里还要纺纱织布，卖了菜和布，全家也难得吃上一顿饱饭。全福和根福十岁出头，就跟着父亲到建筑工地上去干杂活。弟妹们成天在外拾菜皮，到江边摸螃蟹。他们小小的年纪，已经尝遍了辛酸苦难。

这些天来，丁家父子三人在龙华“陈根记”老板那里打桩。父亲和哥哥要为全家张罗一天吃的，每天早出晚归。根福就睡在工地上。根福白天干了十几个小时的活，夜里就在几张破芦席围起来的桩架下睡觉。寒冬腊月，冷风刺骨，小根福冻得直打哆嗦。在草铺上刚睡一会儿，天还没亮，工头就吆喝着他起来了。

根福睡眠惺松，不得不起来又干起繁重的杂活。他在工地上来回奔跑，一会儿到东搬柴烧水，一会儿到西铲煤清渣，一会儿还要跑去拉桩架上的钢丝绳。一天累死累活地做了十几个钟头，换来的是两顿吃不饱的霉米饭和咸菜汤。

卷扬机开动了，钢丝绳一匝一匝地卷上去，根福忙奔过去使劲地拉着、理着，不让它打圈，累得满头大汗。正在拉时，没料到那凶神恶煞似的工头已来到身后，只听得一声吼：“小赤佬，还不用劲拉！”腿弯里已挨了一脚，根福的腿一软，身子就

倒了下去。这时卷扬机正“嘎嘎”地快速转动，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跟着毛刺刺的钢丝绳到了滚筒边上，一阵刺心的疼痛，连忙将手一抽，幸好人没有被卷进去，可是手已被拉得血肉模糊，一个手指骨也被压碎了。十指连心痛，小根福顿时昏厥了过去。工头一看夹起弹簧鞭，拔脚溜走了。等到父亲和工友们闻声赶到，只见小根福倒在地上，忙找了点旧布头把他的手裹起来，止一止血，可这顶什么用？手上的血管已经破裂，血不住地往外冒。这时“陈根记”老板来工地监工，看到这种情形，凶狠地说：“这里不是养人的地方，搁不起吃闲饭，你快把他带回去！”说完一挥手走了。老板的几个走狗又吆五喝六地嚷道：“怎么，你还不识相点，快走！”丁妙生瞪了他们一眼，悲愤地背起小根福，拖着全福，走出了“陈根记”打桩工地……。

如今，少了一个人干活，多了一张嘴吃饭，根福全家的生活更加凄惨。家里几天揭不开锅，孩子们饿得哇哇地直叫，母亲心如刀绞，她看着一个个孩子，想不出一办法。丁妙生满腔愤慨：“这吃人的世道，哪有穷人的活路！”

就在这苦难生活的折磨下，根福的三个弟弟先后给活活饿死了。

望着一个个死去的孩子，母亲和祖母哭得死去活来。大哥全福为了体贴在家里养伤的根福，为了照顾母亲和祖母，为了和未老先衰的父亲分挑家庭的重担，他更加拚命地做活。每天清早出去打短工前，还挑上一担盐，赶到市里去卖，然后再急匆匆地到工地去上工。

哥哥全福累死累活地干着，二十来岁的人，看起来象有三、四十岁了，脸色灰白，两边的颧骨高高突起，人瘦得象根芦柴棒。可他一声不吭地咬着牙，硬撑着干。

一个清晨，根福看着走路也摇摇晃晃的哥哥，又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去上工，心里十分难受。他拉着哥哥的手，饱噙着眼泪心疼地说：“哥哥，你病得这样厉害，还是在家歇歇吧，让我代你去。”全福发烧已好几天了，他瞒着父母，可瞒不过根福的眼睛。这时，全福感激地看了看弟弟，眼光落在弟弟的手上，那畸形的手就象一把芒刺，扎着全福的心，于是他毅然地推开了弟弟的手，难过地说：“弟弟，你不能去。我就是豁出了命，也不能让你的手去拉钢丝绳！”说完就跟着父亲，一摇一晃地走了。

根福哪里安得下心，他悄悄地尾随在哥哥身后，来到了工地。

根福到了工地，见到哥哥全福和另一个工友正在步履艰难地扛方子。那重有四百多斤的方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全福一步一咬牙，双腿直打颤。根福心里正在担心哥哥会出什么事故时，只见全福一个踉跄，方子从肩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在泥浆里只喘粗气。工友们连忙把他扶起，让他坐到旁边的石块上休息一下。根福赶到他身边：“哥哥！”全福睁开眼睛看到根福，脸上露出了几丝苦笑说：“你怎么又来了！”话没讲完，工头手扬皮鞭又走来了，喊道：“工地上不是让你坐着享福的。不做到晚上，别想拿一分钱。”他一眼又看到了站在旁边的根福，抡起皮鞭就打：“小赤佬，你也想来骗饭吃！”全福一看弟弟遭打，忙用身子来挡，一边喝道：“不准欺侮小孩！”一边叫弟弟快回家去。根福无可奈何，含着热泪离开了工地。

夜来得这么迟，根福倚在门旁，左盼右盼还不见父亲和哥哥回来。等了好一会，前面才来了一个高大的人影，“怎么只有一个人呢？”根福感到奇怪。渐渐地看清楚了，父亲的背上

驮着哥哥。

一进了门，全福就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还来不及和弟弟说上一句话，就咽了气。临死，手里还捏着几个铜板的工钱，口微微张开，好象要和这黑暗的世道评理：难道穷人的生命只值这几个铜板！

高楼脚下的血泪仇恨

哥哥死后，一家人的生活更加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时有个在康益洋行打桩的邻居不幸出了工伤，要找个替工，问根福愿不愿去。尽管根福那畸形的手还没有长好，可是眼看一家生活无法维持，他只得答应下来。

康益洋行的老板名叫康立德，是个丹麦人。刚来上海时，随身的行李只有一只装了几张图纸的破皮包，身穿一套旧呢服，脚拖一双开口皮鞋，贼溜溜的眼睛，投机家的嘴脸，完全是一个外国流氓。可是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依仗着租界里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庇护，靠着他那招摇撞骗的伎俩，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不几年，便成了一个百万富翁，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

丁根福来到了康益洋行。一个领班把他带到康立德的买办芦逸云那里。洋奴芦买办眯起一双三角眼，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个新来的小工，阴声阴气地问道：“你会做什么？”“打桩的活儿我都做过。”芦买办慢吞吞地转过身去，从写字台里拿出一张纸来，朝根福面前一摔：“盖个手印。”根福不识字，困惑地看了看旁边的领班。在买办的示意下，领班把那张合同念了一遍。丁根福模模糊糊地只听得：“……在本合同期内

病伤等作自动离职……工资中扣除百分之十五作为伤亡老残之抚恤金……。”念完之后，丁根福按了手印。芦买办叫他跟领班做打桩司炉。

每天天不亮，根福就得把桩架的大炉烧热，把水管里的冷水加热成蒸汽。榔头一响，更忙得不可开交，挥舞着铁锹加煤没个停，可一天十几个小时干下来的六毛钱工资，给老板扣去一成半，又给工头扣去二成，到手的就很少了。碰到雨天不干活，就分文也拿不到。

一九三二年秋天，康立德承包了国际饭店工程的打桩生意。

一清早，工地上就“噔噔”地响起了打桩榔头的声音和工人们悲愤深沉的号子声。两台黑黝黝的桩架有三十米高，上面除了锈迹斑斑的角铁和乱七八糟的钢索和葫芦外，一块脚手板也没有。工人爬上高高的架子，只能站在十几公分宽的角铁上操作。榔头每打一下，人就随着桩架剧烈地晃动一下，要是从角铁上滑下来，就得粉身碎骨。二百来平方米的打桩场地，到处堆放着合抱粗的长木桩，两台桩架之间布满了钢索，卷扬机一开，钢索瞬时绷紧，工人一不留心就会被绊倒，甚至弹到半空中摔下来丧命。

康立德为了这笔一根桩头一根金条的生意，是不管工人死活的。他一天要到工地来三、四次，一清早，他要来看一看，人到齐没有，榔头是否在响；中午来转一转，看看工人们吃一顿饭占了他多少时间，催促工人吃完了饭马上开工；傍晚来兜一圈，看看天黑之前还能为他赚多少钱。

一天，根福一早起来，好容易化了两个多小时把炉子烧热，不料在天亮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康立德老板的轿车

喇叭声又响起来了，他摇晃着肥胖的身体下了车，向桩架走去。当他一看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便瞪起了那对吝啬的水泡眼，骂道：“你瞎了眼了，烧炉子不看看天气，用我这么多煤。”边说边朝根福冲了过来，按着他的头就往炉膛里塞，“我要把你当煤烧！”瘦小的根福挣不脱他的魔爪，头发被烧得吱吱响，眼前直冒金花，一股灼热的空气逼得他喘不过气来。正在这危险时刻，工人们看到康立德又在下毒手，就从四面围奔过来。康立德一看形势不妙，忙松了手，想溜走，可是工人们已经团团围住。“不许行凶！”“不许欺侮人！”工地上顿时喊声四起。这时，洋奴芦买办带了几个白俄监工闻声赶来，看到工人们个个都瞪着愤怒的眼睛，知道来硬的已经不行了，连忙陪着笑脸说：“大家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不要动肝火嘛！”

“什么不要动肝火！”人群中跨出一位毛师傅，气愤地责问芦买办：“我问你，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没有心肝？”问得芦买办哑口无言，拖着康立德如丧家之犬，钻进小轿车里一溜烟地逃走了。

根福的头发已经全被烧焦，满脸水泡。他紧紧地握着毛师傅的手，感激地望着四周围的亲切的工人兄弟，泪水夺眶而出。

为了生活，第二天根福只得带着满头烫伤，又到工地上工。熬苦熬累地又干了一个月，有个卷扬机手出了工伤，因为根福平时已经学会了开车，老板就叫他顶替了这个缺额。

一个漫漫大雾的早晨，国际饭店工地上灰茫茫的一片，桩架在雾气中浸得湿漉漉的。在这大雾之中，工人要爬上二三十米高的桩架干活，一点保护措施也没有，十分危险，可是贪婪的老板只想到“榔头一响，黄金万两”，哪顾工人的死活，逼

着工人冒着大雾开工。

根福检查了一遍机器设备，忽然发现吊锤头的钢丝绳已经断了两股。刚好洋奴芦买办大刺刺地走过来问：“怎么还不开车？”根福指着那根有伤痕的钢丝绳说：“这根钢丝绳很危险，要换一根新的。”其他工人听到了，也围上来看，都说要换新的。芦买办瞟了一眼说：“大惊小怪！动不动要换新的，老板哪有这么多本钱！没关系，开车！”

芦买办把工人们一个个赶上桩架去了。当毛师傅走过根福面前的时候，根福发现他脸色阴沉，似乎有什么急难郁积在心头。忙叫住他问道：“毛师傅，你面色很难看，怎么啦？”

毛师傅叹了口气说：“乡下来信说，我母亲病重，要我马上寄钱回去。我要求老板先算给我半个月工资，他非但不肯，还骂我是找他的麻烦。没办法，我昨天晚上在外面跑了半夜，今天又兜了一个早晨，到处去借，一分钱也没有借到，真急死人。”

根福安慰他说：“别着急，等下工以后大家凑一凑，总能凑几个钱的。”

芦买办发现他们在讲话，又吆喝起来：“快干活，再偷懒，扣你们的工钱！”

毛师傅只得向根福点了点头，走上桩架。根福向踏上角铁的毛师傅喊道：“毛师傅，桩架上滑得很，多加小心！”

锤头“噹噹”地响起来了，每打一锤，桩架被震得摇晃一下，在这大雾天里，根福真为架子上的工人担心，便放慢了锤头的打击速度。不料，吊锤头的那根有伤痕的钢丝绳突然断裂了，锤头松落下来，断了头的钢丝绳连着葫芦弹出去。只见从桩架高空中摔下一个人影来，“咚！”的一声，撞在桩架底盘

的角铁上。根福赶忙停了卷扬机，赶下去一看：“啊！这不是毛师傅吗！”急忙想上前扶起他，走近一看，毛师傅的脑壳已经破裂，鲜血和脑浆溅得满地，三十几岁的毛师傅，在帝国主义老板和洋奴的压榨下，就这样活活摔死了！

这时，桩架上的工人也都下来了，他们围在毛师傅尸体旁，握紧双拳，眼睛里射出愤怒的火光。毛师傅的惨死，是帝国主义老板执意要在大雾天开工逼死的！是洋奴芦买办拒绝调换坏钢丝绳而害死的！是这吃人的世道压死的！

老板康立德和洋奴芦买办自知理亏，躲得远远的，只剩几个白俄监工留在工地上。一会儿，白俄监工陪着帝国主义巡捕来了。他们蛮不讲理地先发制人，叫嚷说：“怎么停了机器！快开工，快开工！”

工人们气愤地说：“人都损死了，还开什么工！叫老板来，我们要同他算账！”

一个帝国主义巡捕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是他自己不小心跌死的，怪谁？闲人都不准拥在这里，快去干活。”

工人们一听，一齐哄了起来：“没这么便宜，这是叫老板和芦买办逼死的，一定要找他们算清这笔血账！”

康立德和芦买办怕事情进一步闹大，忙派人出来调解，答应给毛师傅收尸，发给丧葬费，才暂时把事情平息下来。

可怜的毛师傅，给母亲治病的钱还未张罗到，自己却先丧了生。可是，在建造国际饭店的整个过程中，失去生命的何止一个毛师傅？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每幢大楼，哪一幢不是造在中国工人的尸骨上的！

钱塘江上的愤怒火焰

一九三六年春天，丁根福随着桩架来到杭州，为钱塘江大桥工程打基础。同去的还有他的堂兄弟丁富道。

杭州的春天，柳枝碧翠，桃花映红，可那是富人们寻欢作乐的天堂。康立德带着家眷，牵着哈巴狗，在这里游山玩水，尽情挥霍。而丁根福和工友们却日日夜夜在工地上卖命。

钱塘江春水涌发，浪涛滚滚。江中浮着木排，安放桩架。每天，只有一只小木船把几百个工人分批接送到木排上去，工人们就在这时刻有被浪头卷进江里去的危险中打桩。工人一上了木排，就被禁锢在这块小天地里，一干就得十几个小时。每次下工时，接送的木船总是迟迟不来。有一次下工，根福看到木排边上靠着一只设备良好的小火轮，以为是来接工人上岸的，一只脚刚跨上小火轮，就被一个德国监工一脚踢下来，骂道：“穷苦力，这是你乘的吗？”原来这只小火轮是专门接送德国监工和白俄监工的。康立德老板还嫌原有的白俄监工不够，又雇来了在黄河大桥工程做监工的德国流氓，他们每月拿的工资，竟是工人的四十倍。

一天夜里，急骤的暴风雨侵袭着钱塘江，江面狂风呼啸，浪涛连天，一片乌漆墨黑，伸手不见五指。这样恶劣的天气，江中是不能行船的。可是豺狼一般的德国监工嚎叫着，在工人住宿的茅草棚里窜来窜去，挥舞着棍子强迫工人去做夜工。丁根福和堂兄弟丁富道以及十五六个工友，挤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棚里，听到德国监工的嚎叫，轮到做夜班的丁富道只得从铺上爬了起来，准备动身。几个工人气愤地说：“这种鬼天气

还能做夜工！”“我看船都过不去！”“现在风浪这么大，开船危险，还是等风浪小点再说吧。”

穿着橡皮雨衣的德国监工却蛮不讲理的吼叫着，“这风浪是一时停得下来的吗？现在不去就滚蛋，怕死的以后别想吃这碗饭。”

根福从铺上拿起一件短褂子，披到了富道的身上，说：“挡挡风雨吧。”富道感激地望望哥哥，又把短褂子放回铺上，说：“披上也不管用，白糟蹋了短衫。”说着就走出草棚，钻进狂风大雨中去。

富道出去后，根福一直揣测不安地睡不着，直到快要天亮时，刚要迷迷糊糊地睡着，却突然被一阵惊惶的喊声吵醒。

“翻船了！翻船了！”

根福和工友们从铺上猛跳起来，只见两个浑身湿透的人，跌跌撞撞地走进草棚，一个是船老大，一个是小工头。

根福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赶忙上前去扶住船老大，问他究竟怎么翻的船，现在丁富道和工友们在哪里？船老大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故的经过。

半夜，几个德国监工把工人们赶上木船，就返身回到宿舍去睡觉了。载着七十八个人的木船，冒着狂风暴雨，向江心驶去，浪头打来，木船就在江面忽上忽下，船内的人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快到江心了，忽然一个浪头打来，把船舵打坏，船立刻失去控制，在江中打转，随波逐流。船老大赶忙喊：“快逃命啊，要翻船啦！”“噤！”的一声，船撞在露出水面的桩头上，接着船就仰底翻身，七十八个人只逃出了船老大和小工头。

狂风怒吼，暴雨直浇，钱塘江水汹涌翻滚，七十六个工人

的躯体埋葬在江底……

丁根福悲愤万分。几个钟头之前，富道被德国监工赶上木船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现今却已葬身江心了。

工人们听到这个噩耗，怒火万丈，不约而同地围聚拢来。人群中有一位工人喊了一句：“我们不干了！走，找老板算账去！”工人们就象潮水般地冒雨向康立德的写字间涌去。

芦买办慌慌张张地从床上爬起，一看情势不妙，立即打电话给住在杭州城里寻欢作乐的康立德。洋老板一听“工人们闹事”，天一亮，就急匆匆地赶回工地。

工人们提出了“打捞死难者，发给抚恤金”的合理要求，康立德阴险的脸上露出几丝奸笑，假惺惺地对罢工工人说：“抚恤金好说，你们赶快复工，派出代表来洽商，否则耽误了工程，到时候大家发不出工资，可别怪我。”

工人们识破了老板的诡计，提出了：“团结起来斗争到底”的口号。罢工继续到了下午，忽然从外面开来了三卡车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一下了车便气势汹汹地把工人包围起来，墙角上架起了机枪，威胁工人复工！

面对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工人们毫无惧色，寸步不退，斗争的情绪越来越高涨。这时，在附近造铁路的工人也赶来支援打桩工人的罢工斗争，声势越来越浩大。

罢工继续了两天，工地上一片寂静，康立德象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策。他迫于工人的压力，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打捞死者，发给抚恤金。

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战争的火焰烧到了钱塘江畔，康立德带着家眷和洋奴买办、监工，逃回了上海。留下了大批工人，流落在杭州。丁根福在杭州城里打

了几天短工，凑了几个钱当路费，才回到了上海。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艰难岁月里，丁根福一家的生活过得更加凄惨。那时，百业萧条，物资奇缺，根福和父亲常常做一天停两天，不仅生活无着落，生命安全更无保障。父子俩常常日夜奔波，到处打杂工，还是养不了全家。有一年，父亲在一个仓库里看门。一次，里面少了儿根旧木头，老板硬说是他偷的，勾结了日本兵把他抓去严刑拷打，折磨得半死才放出来。从此，父亲便成了残废，连一点轻工作也不能干了。根福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压得他终年喘不过一口气来。

丁根福在苦海中挣扎，在油锅中熬煎，好容易熬到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丁根福心想着，这下子可该有好日子过了吧！谁想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窃取了胜利果实后，无耻地投靠美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内战，更加残暴地压迫劳动人民，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丁根福一家很快又落入失业和饥饿的灾难深渊。在贫病交迫下，父亲丁妙生含恨死去。父亲死后，根福家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他拚死拚活，做马做牛，可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物价飞涨，根福拿到工资，回家去买米时，米价已跳到二十万元一斗，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一条肥皂，这叫一家老小怎么活下去啊！

这样，丁根福熬过了不知多少个凄风苦雨的长夜，他盼啊盼啊，盼望着黎明的曙光。

庆解放斗倒洋老板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城头红日照，劳动人民得解放。
丁根福挤在欢迎自己的子弟兵的行列中，眼睛里滚动着

闪闪的泪花。

上海解放了，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冒险家的乐园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造得过来的，资本家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不甘心无产阶级从此翻身作主人。康立德十分仇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还梦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一天，他假惺惺地请了根福等二十几个工人到他家里“作客”，说是“有事商量”。

老板叫工人到家“作客”，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根福和大家商量后，断定这家伙又要玩弄什么阴谋，为了看看他究竟想搞什么鬼，决定一起到康立德的花园洋房去作一次“客”。

说起来，丁根福在康益洋行干了几十年，老板的住宅有五、六处，可是还一处也没见过。

康立德的徐家汇法华别墅，装饰得富丽堂皇。雕塑着飞禽走兽图案的围墙内，有一个五百多平方米的大花园，翠绿的草坪四周栽种了各种奇花异草；宽敞的房间里摆着各种古董；漂亮的汽车间里停放着最时髦的小汽车。

一见人来，洋狗就“汪汪”地叫了起来。片刻，康立德披着睡衣，出现在门口，后面跟着洋奴芦买办。他们脸上显露出笑容，连声：“欢迎！欢迎！”一进了房间，又是送茶，又是敬烟，好一副殷勤的样子。可是丁根福和工人们心里清楚，这明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肠。

果然，不一会儿，康立德开了腔，芦买办起劲地忙着翻译：“往后，大家只要跟着我干，我不会亏待你们，赚来的钱大家分分；不过，你们有什么话也不要瞒着我，直接跟我讲好了。”接着又津津乐道他的发家史：“我过去和你们一样穷，后来我辛辛苦苦地做，运气一点点好起来，撑了这份家业。往后你们象我这样干，保证你们人人发财。”丁根福和工人们当场驳斥了

康立德的无耻谰言：“你要想叫我们跟你走，这是白日做梦！我们给你做了几十年，心里都有一本账，今天我们当家作主了，你的好日子也到此为止了。”

康立德一听马上翻了脸，恶狠狠地说：“共产党长不了，用不着二、三年就垮台，我还要等着看看。”大家听了，肺都气炸了，拳头在台子上“砰”的一击，向老板严厉指出：“这是你痴心妄想，这个主人我们做定了，一直要做下去，你的剥削账，我们一定要清算！”就这样，康立德的阴谋破产了。

在党的教育下，丁根福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懂得了什么是剥削，什么叫压迫，明白了只有团结起来向地主、资本家作坚决的斗争，才是穷人唯一的出路。一九五〇年，他和二十几个工人在康益洋行组织了自己的工会，丁根福被选为工会委员，他们向康立德老板提出：“改善工人生活，采取劳保安全措施，工会要监督企业经营”等正当要求。

狡猾的康立德一面拖延时间不给工人答复，一面在背后策划着一场更大的阴谋。他唆使芦买办纠合了洋奴、工头、监工等一伙流氓，也成立了一个什么“工会”，与丁根福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的工会唱对台戏，并扬言要开除了丁根福等工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他坐着小轿车来到“杨浦基地”门口，摘下了工会的牌子，摔在地上。工人们闻讯后，马上从四面八方围集过来，把大门牢牢围住，当老板的车子从基地里开出来时，大家一拥而上，把康立德从车里拖了出来。康立德吓得脸色煞白，头上直冒冷汗。

丁根福和工人们大声责问他为什么摔工会的牌子，康立德佯装自己不识中国字，说：“不知道这是工会的牌子。”当他被驳得无词对答后，竟无耻地说：“这是我的地方，我不允许别

人在这里挂牌子。”根福他们怒从心头起，瞪着冒火的眼睛，警告康立德：“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我们是这儿的主人，你如再敢胡作非为，立即加以制裁！”康立德看着工人们一张张怒目以待的面孔，吓慌了手脚，忙说：“是，是。”

但是，康立德和他的走狗们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一天深夜十二点钟，康立德和芦买办乘了小轿车偷偷地来到“杨浦基地”，不从大门走，而是翻墙进去，又倒打一耙，反诬看大门的工会委员老刘“失职”，把老刘开除出洋行。

第二天工人来上班，听到老刘被解雇，非常气愤。在资本家的报复面前，工人们决不退缩一步。

丁根福和大家商量好，等在康立德的办公室里。老板和洋奴一前一后地进来了，一见工人们在这里，吓得面如土色。工人们马上围住了他们，要老板签字同意老刘复工，不准随便解雇工人。康立德不肯签字，丁根福和工人们就同老板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老板被斗的消息传了出去，有些洋行的工头跑来说情了。说什么，“不要累坏了老板，以后大家没饭吃。”“你们要仁义一点，为人莫做绝！”丁根福和工人们理直气壮地回答：“过去，老板、洋奴、工头压榨毒打工人，讲什么仁义道德？工人惨死在桩架下的何止几十人！如今，老板还想骑在我们工人头上欺压我们，难道我们工人不能起来斗争吗？”

丁根福和工人们严厉警告这些洋奴走狗：“如果顽固地站在洋老板的立场上，与工人为敌，最后决没有好下场。”一席话说得几个家伙灰溜溜地走了。

斗争的第三天，康立德忽然想起了写字台下有个暗铃，过去是直通伪警察总局的，解放后那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公

安局。我何不叫他们来，先告一状，说工人闹事，资方无法正常工作，这样岂不可以解我危矣！康立德暗暗自喜，立刻移动脚步，靠向写字台，偷偷地按了一下暗铃。

片刻，马路上响起了警备车的“呜呜”声，一队端着冲锋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冲上了办公大楼。

康立德摇头晃脑地正在自鸣得意之际，军代表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对工人们说：“我们听到警铃，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你们与老板斗争，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丁根福紧紧地握着亲人解放军的手说：“太感谢你们了。”

接着，军代表请工人同志们坐在一起，命令康立德和芦买办站在边上，严厉地训斥了他们一顿，指出：“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今后你们不许再为非作歹，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工人的监督。”又指着芦买办问：“你是什么人？你喝中国人民的血汗，替外国人镇压劳动人民，完全是一个洋奴，走狗！”说得芦逸云乖乖地低下了头。

在工人的斗争下，康立德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合理要求。丁根福看着签了字的纸头，心潮翻滚。过去，工人被帝国主义资本家踩在脚底下，不得不在老板吃人的合同上盖手印；今天，我们工人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老板就不得不在工人面前低头，在工人提出条件的纸上签字。

一九五三年五月，由于康立德拖欠大量税款，被迫将康益洋行的一些破破烂烂的机械设备出售给华东建筑工程局。康立德的走狗、洋奴芦逸云因为长期以来充当老板走卒，敲诈勒索，解放后继续作恶，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破坏国防施工，罪恶累累，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处十五年徒刑。可是，康立德还是

贼心不死，继续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竟收买洋奴走狗，侵犯我国内河航行权，严重违反我国的革命法纪。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康立德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驱逐出境。这个在上海横行了几十年的外国流氓，在中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象一只丧家之犬，夹着空皮包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中国。

得新生当家作主人

丁根福转入国营企业工作后，第一个重大工程就是到闵行发电厂打基础。丁根福师傅满怀喜悦的心情，乘坐着大卡车来到了工地上。

这是一九五四年中的一个畅心悦目的春天，工地上柳絮杨花，和煦的阳光下，万象更新。一排排崭新的宿舍迎接着新来的主人。丁根福看着这规模宏大的工程，又看到为他们安排好的一张张整洁的床铺，不由得想起了过去睡在桩架下的“通风床”上的日子。他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后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真正做一个国家的主人。

晴空万里，桩架威武。第一根桩马上就要打了！丁根福穿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登上了开车台，仔细地检查着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零件，这些早已熟悉的东西，今天是中国人民的财产了。绿色的信号旗挥动了，哨子“嚯！”的一声划破了长空，丁根福稳稳地扳动把手，蒸汽“咕唏”一声从大汽阀里喷吐出来，榔头就“嗵！嗵！”地欢唱起来。丁根福听着这声音，兴奋地咧开嘴笑了……这是自豪的笑声，幸福的笑声，胜利的笑声！毛师傅惨死的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丁根福再

也不是为老板打那用血和泪浇成的桩头，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大厦打基础！为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打基础！

白天在工地上埋头苦干的丁根福，晚上就在灯下学习文化，他决心为革命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夜深了，寒气袭人，在旧社会轧伤了的手阵阵作痛，拿不住笔，但他坚持着学习直到深夜。后来队里办了夜校，为这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创造了学习条件，丁根福学习起来劲头更足了。半年后他已经能阅读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书籍了。他越读心里越明亮，越读革命的干劲越足。

一九五五年三月，丁根福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防设施的施工。打桩任务很重，时间又紧。工人们干劲冲天，决心完成这一任务，以实际行动回击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挑衅。工地处处是战场，工人们唱着激昂愉快的劳动号子，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劳动景象。

一天，工地正在紧张地施工，蒸汽锅炉的一根烟管里冒出了白雾雾的水汽，“不好！冷水管破裂了！”丁根福一眼看出锅炉发生了故障。蒸汽锅炉内的压力高达八个大气压，如果冷水碰到灼热的锅壁，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一场巨大的事故严重地威胁着在周围施工的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一旦锅炉爆炸，打桩工程就无法进行，整个施工都得停下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老丁师傅奋不顾身地一个箭步冲到锅炉前，他大喊一声：“快闪开！”自己却果断地打开了炉门，用铁锹迅速扒出燃烧着的煤块。看到这一情景的工人们急忙高喊：“危险！丁师傅。”丁根福的手臂上烧起了泡，熊熊的烈火把铁锹也烧弯了，他还是稳健地一锹一锹不停地铲着。锅炉内的气压下降了，

爆炸的危险消除了，可是要等锅炉冷下来再修水管却要老半天，加上修好了水管再烧热炉子就得一天时间。丁师傅想到这是国防施工，为了打击侵略者，保卫伟大的祖国，一分一秒也不能耽搁！他又迅速披上了浸湿的麻袋，钻进炉膛，抢修水管……。

灼热的炉膛，滚滚的热流，沸腾的水汽，这一切都没有挡住丁师傅。他为抢救国家财产，及时完成国防施工任务而英勇战斗。他咬着牙，使劲地拆换着坏了的水管，汗水象雨点一样滚落下来，热气逼得他透不过气来，人就象在云雾中，迷迷糊糊。这时，他又想起了旧社会为康立德烧炉子，被凶残的老板按着头往燃烧着的炉膛里塞的情景……于是他又振作起精神继续战斗。他暗暗叮嘱自己：“根福啊，解放前，为老板卖命，可是今天，是国家的主人，为了革命的利益钻进炉膛，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还不见丁师傅出来，同志们的心里十分焦急。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抢修，丁根福终于抢修好了锅炉，熊熊的火焰又升腾起来，打桩机又在纵情地歌唱了。可是老丁因为大量出汗而发生虚脱，晕厥了过去。工人同志们马上把他送到医疗站去治疗。

根福在病床上醒来，周围站满了人，一双双关切的眼睛注视着他，这情景使他十分感动。旧社会被洋老板按着头塞进炉膛，头上烧起了很多泡，结果只得自己用破布包扎一下就又到工地上做苦力了。新社会，自己只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组织上和同志们这样的护理和关怀，真是旧社会资本家看工人生命不如草，新社会毛主席、共产党把工人当作宝。

在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医疗下，

丁师傅很快恢复了健康，又精神抖擞地战斗在打桩工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了。

几年来，丁师傅如饥似渴地学习，忘我工作，得到了广大职工的好评。一九五五年，他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并选为出席全国工业会议的代表。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他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他对待革命工作更是废寝忘食。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那时，老丁已经五十多岁，家住在浦东高庙，可是工作地点在真如，一东一西相隔几十里路，但他每天上班总要提前个把小时到基地，检查一下机械设备是否安全，钢丝绳有否毛刺……晚上还要干到七、八点钟才歇手。同志们赞扬地说：“别人做一班，他要干二班，丁根福的劲道真是用不完。”领导上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多次劝他早点回去休息。老丁回答得很干脆：“旧社会起早摸黑，那是替老板卖命；现在抓紧时间干，这是与帝国主义抢时间，建设社会主义。不把劲头都使出来，我躺在床上也心不安啊！”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原有的打桩机的性能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而有些技术人员迷信洋专家，对于改革旧桩机，提高打桩效率信心不足。党组织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丁根福去搞，鼓励他改革旧桩机，为社会主义的打桩事业作出新贡献。

老丁肩负着党的期望和阶级的委托，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同志们一起搞试验，摆开了战场。

丁根福满怀信心地把铺盖从家里搬到了基地，和同志们

一起日以继夜，孜孜不息地向着科学技术领域开始了顽强的进攻。夜深了，老丁仍在灯下坚持工作着。他用那只在旧社会残伤了右手握着笔，凭着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学得的文化，不断地在图纸上画着，改着。他疲倦了，就喝一杯热茶，洗一把冷水脸，继续再干下去。

多少个呕心沥血的不眠之夜熬过了，多少张图纸报废了，最后，老丁终于在党组织的鼓励和同志们的支持下，成功地改革了旧打桩机。榔头锤击速度由原来的每分钟七十次提高到九十次，工效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个季度就可为国家增产五万七千余元。但是老丁并不满足，乘胜前进，一鼓作气地改装了一台电动打桩机，同时还改革了塔式桩架和桩架道轨，大大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节省了修理工时，提高了打桩工效。

几年来，丁师傅坚持不断革新旧设备，破除洋框框，先后成功地实现了数十种革新项目，为国家增产节约了几百万元。

一九五九年，丁根福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一九六四年，丁师傅又光荣地被广大群众推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那个时候，丁师傅正患肺病住进了医院。这一天，丁师傅又缠住了医院的领导，要求出院：“我的病已全好了，让我出院吧。前方的生产任务正紧张着，我住在这里也心不安啦。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老工人这么关心，有一点毛病就千方百计医治，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哪里求得起医啊！生了肺病只能等死，更谈不上住院疗养了。”医院领导被老丁师傅的恳切的话语所打动了。

正在这时，听见医院大门口响起了阵阵锣鼓声。不一会，老丁师傅就看到自己单位的领导同志和工人老师傅们，拿着

一张大红喜报来看望他，喜报上写着：“热烈祝贺丁根福同志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工人师傅们兴高彩烈地喊着老丁，纷纷和他握手，祝贺他当选“三届人大”代表。当支部书记郑重地把一份红色通知书交给了根福时，他双手捧起，心潮起伏，万分激动。一个在旧社会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老工人，长期以来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身上布满了老板的鞭痕，饱尝了资本家剥削压迫的痛苦；解放后，彻底翻身，扬眉吐气，当家作了主人，这巨大的变化，给了老丁师傅强烈的翻身感。自己只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就给予这么高的荣誉，如今又被选为“三届人大”的代表。他又想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而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要去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的工作，这说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工人阶级寄托着多么大的期望呵！想着想着，大滴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

红色列车向着北京徐徐开动了，上海车站上人山人海，欢送的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烈欢送三届人大代表上北京！”“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车站，这是一幅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啊！丁根福穿着一套崭新的蓝色工作服，坐在丝绒的软席卧铺上，向上海人民挥手告别。看着千万双热情洋溢的眼睛，丁根福又不禁回忆起在旧社会乘火车到钱塘江造大桥时，堂兄弟翻船丧命；桥墩造好了，老板康立德分文不给，根福连回上海的路费也没有，好容易东拼西凑地弄了几元钱，买了一张火车票，蜷缩在露天的棚车上，一路饿到上海……。

汽笛一声长鸣把他惊醒过来，车轮飞快地转动起来。历史的车轮啊，你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把万恶的旧社会碾得粉碎，把翻身作主的工人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

到达北京，正是黎明时分，大轿车早已等候在车站，汽车一直把代表们送到人民大会堂。辉煌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在朝晖的沐浴下格外壮丽。丁师傅踏上宽敞的台阶，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望一眼这宏大的建筑，想一想自己是一个在建筑行业做了四十多年的建筑工人，旧社会造过几十幢高楼大厦，可那时候造好后，连台阶也不让踏一踏。在康益洋行的时候，老板康立德的住宅有五、六处，工人根本不能进，连到老板的写字间去领工资时，也只能等在狭小的“扶梯间”门外。现在毛主席请劳动人民来讨论国家大事，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

人民大会堂里云集着来自各条战线、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有好几千人，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结。丁师傅在这里又碰到了许多熟悉的劳动模范，大家交谈着各条战线的新成就。

上午十点整，大会正式开始。这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丁根福坐在代表席的第一排十一座，离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近；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向代表们招手致意。丁根福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深感到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人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

“国家的主人！”翻身作主的老工人丁根福更深刻地体会到“国家的主人”的含意。晚上，他把一天参加大会的激动而兴奋的心情记在日记本上：“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要真正做一个国家的主人，给毛主席争光，为工人阶级争光。”

反潮流继续革命永向前

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使丁根福老师傅深切地关

心着国家大事，关心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每一发展。当选三届人大代表后，他更感到自己肩头的责任重大。虽然他已年近六旬，却利用一切时间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每一个有关政策文件，并紧密联系阶级斗争的实际，找出正确的答案。本来，丁根福以一个老工人所特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解放后，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国内的地主阶级也被打倒了，资产阶级已失去了生产资料并在工人阶级的监督下进行改造，今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只要一心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就行了。但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通过周围一系列现实斗争的教育，丁根福觉得原来的那个想法不对头了。慢慢地，他的脑子里出现了许多问号：为什么他和同志们改革老设备中受到那么多的阻力？为什么有些领导人只相信少数专家权威而不相信群众？为什么有些过去是康益洋行的洋奴、工头现在又会受到重用？有的甚至还垄断着生产技术大权！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会不会变颜色？劳动人民会不会再吃二遍苦？……

一九六六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丁根福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学习着毛主席一系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心里顿时亮堂了。十月初，他就贴出了革命大字报，并坚决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猛烈地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八月，组织上派丁根福参加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张杨中学，并担任工宣队指导员。

丁根福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在旧社会度过了大半辈子，

连学校的门也没有进去过，现在党和毛主席把自己送到了学校里，并担任负责工作，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党和毛主席对工人阶级是多么关怀和信任！想到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撑腰，什么困难都不怕，一定要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他背着铺盖，和工宣队员们一起斗志昂扬地进驻了张杨中学。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邀请工人代表上北京观礼。这一次，丁根福又带着上海工人阶级的委托，带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衷心祝愿，来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这里，他第四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当毛主席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天安门城楼，神采奕奕地向代表们招手致意的时候，丁根福两眼滚动着幸福的泪花，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看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笑容，他浑身增添了百倍力量；看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定步伐，他更加敬仰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看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大的身影，他更加坚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

在观礼期间，毛主席把自己在中南海里亲自养的鱼第一批请工人们吃，把自己种的果树第一次结出的果子，送给工人们尝。

丁根福拿着一个苹果和两个核桃，心潮翻滚。这苹果和核桃，寄托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亲切关怀；这苹果和核桃，寄托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无限期望；这苹果和核桃，给了丁根福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无穷的力量。

丁根福回到家里，把这些珍贵的礼物端端正正地安放在

桌子上，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老人家解放了苦难的打桩工人；是您的光辉思想哺育着儿女们茁壮成长；儿子和女儿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女儿还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中国工人代表团出国访问，……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无限恩情，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无上光荣，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正确！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丁根福决心跟着您老人家干一辈子革命，任凭风浪有多大，继续革命不回头！”

一九七〇年十月，丁根福师傅光荣地退休了，但他人老心红志更坚，想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无保障，新社会，党和毛主席对劳动人民无限关怀，年纪大了还能享受退休金；想到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怎么能安心在家养老呢？他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到地区党组织报到，要求为地区工作出一份力。地区党组织热烈欢迎丁师傅参加地区工作。不久，老丁师傅被选为高庙里委会党支部委员。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丁根福师傅积极领导地区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老丁师傅先后参加了市建筑工程局的老工人宣讲队和川沙县的工人讲师团，到十几处地方宣讲，用自己新旧社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有力地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丁师傅愤怒地说：“林彪搞‘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要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就是要让康立德那样的洋老板重新回来，让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这是开历史倒车，劳动人民决不答应！”有一次，他发烧达三十九度，同志们都劝他回家好好休息，但是，第二天他还是坚持到一个中学去参加预先约定好的批林批孔大会，并在早晨三点钟就起身准备发言稿。

老丁深深认识到，批林批孔是件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头等大事，只要自己生命不息，就全力投入战斗。这真是：

年近七十不服老，
继续革命向前跑；
老当益壮志更坚，
一颗红心闪光耀。

上海市基础工程公司工会

钢城老将话今昔

——上海第三钢铁厂退休老工人张秋远的家史

在上海第三钢铁厂，只要一提起老工人张秋远，简直是无人不知的。这个中国的老一辈钢铁工人，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但他身体还很健朗，有一张黑苍苍饱经风霜的脸。他一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充分地反映了中国钢铁工人的斗争精神以及这一代老钢铁工人在解放前艰难的生活遭遇。他退休以后，人老心不老，年高心更红。他经常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刻关心厂里的生产情况。在他看来，一个革命工人“思想是永远也不能退休的”。他每天早晨起来，总要站在窗前，看看厂里冒着烟雾的烟囱，了解一下厂里的生产情况。他只要一看厂里大大小小烟囱冒烟的情况，就知道有几只炉子在炼钢、有几只炉子在烘炉或检修了。只要一发现厂里的炉子出了问题，他就会立即向厂里跑，去当“参谋”、“顾问”，并和大家一起投入战斗。

张秋远对工厂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在他当护炉技师时是这样，退休以后也是这样，炉子就是他的生命，他爱工厂、爱炉子超过爱自己的孩子。每当他向那些年轻的炼钢工人谈起工厂时，他就会说：“今天我们中国有这么巨大的、现代化的钢铁厂，真是来之不易啊！没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不会

有我国今天的钢铁工业。”这就是张秋远的肺腑之言。他深深地懂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也要靠钢铁工业的发展。他爱工厂爱炼钢炉爱得就象入了“迷”、着了“魔”似的。有一天深夜，张秋远一家人正处于梦乡的时候，突然张秋远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声地对正沉睡着的儿子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厂里的炉子穿钢了。”他的儿子忙着穿衣服，准备跟父亲一起到厂里去抢救。这时张秋远的老伴也醒来了，她问：“老头子，谁跑来告诉你炉子穿钢啦？”张秋远呆住了，是啊！谁告诉自己炉子穿钢啦？他禁不住哑然失笑，敲了敲自己的头，说：“唉！原来我刚才做了个梦，是梦里有人来告诉我说厂里炉子穿钢了。”一家人全都笑了起来。第二天，他老伴把这件事告诉了邻居，一下子传开了，连厂里的工人也听说了。大家都很感动，有的工人说：“张师傅真是人老心红志不衰，退休多年，还这么关心工厂的生产，关心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张秋远为什么对工厂有这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呢？这是许多年轻的钢铁工人需要知道的。张秋远常常向青年人讲自己的家史，讲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有一年春节，有许多青年人到张秋远家里来“拜年”，张秋远在大家的要求下，又讲起了祖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以及旧中国工人所遭受的压迫、剥削。这真是：

新年话旧年，
今昔相对比，
不知过去苦，
哪知今日甜！

一九〇四年，张秋远生在湖北省孝感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那时，中国还处在腐败透顶的清王朝的统治时期，广大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张秋远家也是“日无披肩衣，夜无隔宿粮”，张秋远就是在这时来到了苦难的人间。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农村，张秋远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从他懂事起，就整天跟着二姐挖野菜、拾烧柴。尽管他父亲辛辛苦苦地给地主扛长工，母亲日日夜夜地织土布，一家人还是常常揭不开锅。在这艰难的家境逼迫下，他大哥十二、三岁就离乡背井到外地当童工，后来就进入中国最早的钢铁厂——汉阳钢铁厂当小工。他的两个姐姐相继当了童养媳，二哥送了人，六个兄弟姐妹就只剩下秋远和小妹。但日子还是不好过，父亲只得打发小小的张秋远跟着大哥到汉阳钢铁厂去谋生。

一九一七年的一个冬天的早晨，阴沉沉的天空乌云密布，凛冽的寒风在苍茫的原野上呼号着。衣衫十分褴褛、单薄，也只有十三岁的张秋远，由他的大哥带领着，向着从孝感通往汉口的路上走去。他们既没有行李，也没有路费，就凭两条腿步行到汉口。一路上，寒风刺骨，又冷又饿，走了一天多，才走近汉口，看见了汉阳钢铁厂。

汉阳钢铁厂是清朝反动官僚张之洞所创办的，开厂还不到几年，就已破败不堪。这个一度被清朝洋务派吹得天花乱坠的工厂，实际上是他们树起的所谓官办冶铁的一面破旗，它以大量民脂民膏，养肥了大批到中国来发财的洋人，却并未炼

出过多少钢铁。厂房已破烂，几支竖在空中的烟囱有气无力地吐着黄烟，厂区杂乱无章，有一辆陈旧、落后的小火车拖着车皮象老牛拉破车似的缓慢地行驶着。

小小的张秋远原以为来到工厂总比在乡下好，至少能吃饱穿暖过人的生活吧？但当他随着大哥一走到厂门口，看到大群衣衫褴褛、面带饥容的钢铁工人放工出来，立刻使他的幻想破灭了。他看到一辆小汽车横冲直撞地从厂里开出来，车里坐着一个胖得象猪一样的外国人。大哥关照弟弟说：“秋远！这车里坐的是‘洋阎王’，以后遇到他们可得提防着一点啊！”

“洋阎王？”张秋远从未听到过这个名称。

“是啊！这个厂名义上是中国的，实际上大权都操在德国人手里。厂里的一些德国技师，象魔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工人身旁，故意找岔子，动不动就毒打，开除工人。我们有好几个工人兄弟的命都送在他们手里，大伙恨死了他们，背地里就都叫他们‘洋阎王’。”

张秋远深深感到穷人到处都在受苦，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将来你进了厂，平时做活要多留神，有机会就学一点技术。总有一天，这些‘洋阎王’会被我们赶跑的。到那时候，由我们中国工人自己来管理钢铁厂，这就好啦！”大哥继续体贴地说：“不过，千万别让工头、‘洋阎王’找到岔子，否则要被他们吊起来用鞭子抽的。”

听了大哥的这些话，小小的张秋远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要走的是一条非常艰险的道路啊！

这天，大哥领着张秋远去见工头。这个工头长着一副瘦猴脸，斜着白眼，把张秋远从头到脚的打量了一番，冷冷地说：

“这么小的人，能干点啥呀？准备吃白饭吗！”

大哥忙说：“别看他个子小，乡下孩子吃得起苦，有力气，会做事。”

“那好吧！我一向与人为善，就把他留下！”工头假惺惺地说。

晚上，张秋远就住在一间破屋的小阁楼上，楼板上铺着乱稻草，还有破棉絮，散发着霉臭味。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挤着几个与张秋远年龄相仿的童工，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几乎每个人的背上、胳膊上都有一道道血红的鞭痕。

苦难的童工生活开始了。

黑沉沉的夜幕还笼罩着大地，寒风裹着飞雪呼啸着。半夜两、三点钟，张秋远就让工头狼嚎似的叫声惊醒了。他按照工头的吩咐，随着一群童工直奔厂门口去拿“厂号”。所谓“厂号”，就是工票。如果拿不到厂号，轮不到工作做，一天就连吃的也没有，只得挨饿。张秋远穿着单薄的衣衫，抵御不了风雪严寒，刀子似的西北风直往他的皮肉里钻。脚上那双布鞋早已破了，露在外面的脚趾冻得又红又肿，有的已在化脓，踩在尺把深的雪地里，只感到一阵阵钻心似的疼痛。张秋远忍着疼，艰难地向着工厂的大门口走去。……

厂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挤着一群人。张秋远和许多童工一起在寒风中瑟缩地颤抖着。一直等了三、四个钟头，张秋远才拿到一张“厂号”，随着人流涌进了厂门。

料场上，横七竖八地堆着一些生铁、废钢。焦炭、石灰撒了一地。低矮的车间里，炼钢炉在死样怪气地喷吐着火焰。混浊的空气中，弥漫着灰砂，夹杂着呛人的煤烟。加料的工人，有的顶着熊熊烈火一锹锹地将料投进炉膛；有的推着装满废

钢的滑架，迈着艰难的步伐向着炉门方向走去。有的炉子，黑古隆冬地，就象死了一样，炉膛里冻结着又黑又硬的渣子，炉壁砖缝中间已长出了野草。

张秋远和一些童工就在料场上推着装满废钢烂铁的翻斗车，那些翻斗车年久失修，又不常加油，轮子象钉死在车身上似的，很难滚动。张秋远使尽全身力气，只推了几个小时，就推不动了。又冷又饿的张秋远，脚就象铅一般沉重。他饿昏了，头晕目眩，一下子就扑在翻斗车边上了。“啪——”地一声，工头的皮鞭落在他的背上。张秋远痛醒过来，看到了瘦猴脸工头正凶狠地瞪着他，嘴里还不三不四的骂着。张秋远真没想到这个自称“与人为善”的家伙，竟这么不讲道理，眼睛里喷出了仇恨的火焰。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对工头、资本家的强烈仇恨。

一天上午，张秋远路过平炉车间去拿修理翻斗车的工具，平炉正在炼钢。他想：“钢是怎么炼的呢？”想起大哥关照自己随时注意学一些炼钢的技术，于是就到平炉跟前看一看，并且向一个工人问了问炼钢的情况。没想到这时，被“洋阎王”——德国技师魏克看见了。他一见张秋远和平炉前，就象野兽似的闪着凶残的眼光，一下子冲到张秋远跟前来，叽哩咕噜地骂个不停，并恶狠狠地追上前去，踢了张秋远一脚。张秋远身子一歪，从两丈多高的平台上掉了下去，闷闷地跌在一堆钢渣上。

“洋人踢死人罗！”工人们惊呼起来。

张秋远早已昏死过去了。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来，染红了灰色的钢渣……

工人们一下子围了拢来，见张秋远不仅嘴里流血，连鼻子、耳朵里也流出血来，禁不住群情激奋，愤怒地围住了魏克，

几十双愤怒的目光射向这个“洋阎王”。魏克害怕了，一边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一边胆怯地往后退着。

工头忽然钻了进来，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别……别……。只怪那小子不好，谁叫他违反厂规，东游西荡，跑到平炉跟前来的呢？真也是活该！”

工人们怒吼起来：“你们没看见他手里拿着工具？难道在车间里拿工具也算犯了厂规？”

工头理屈词穷，忙换了副面孔说：“好吧！好吧！叫他大哥来，让他去治一治，擦一点药水吧！”说着，他就拉了拉魏克，两个人夹起尾巴溜走了。

一会儿，大哥闻讯赶来，见秋远已血流满脸，昏迷不醒，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大哥含着泪，只得抱着张秋远走了。

在一间破草棚里，大哥替张秋远擦净脸上的血迹，使劲地摇着张秋远，不住地呼喊：“秋远！秋远！你醒醒，你醒醒，你大哥在你身边哪！”

已经下班的工人涌了进来，送来了草药，敷在张秋远的伤口上。一位大嫂端来了一碗豆浆，用汤匙撬开张秋远的牙齿，一口一口喂下去。温热的豆浆流进了张秋远的喉咙，阶级的深厚情意使他渐渐地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看见周围的工人师傅，见自己在大哥的怀中，止不住满腔的悲愤，失声痛哭起来……。

二

一九二二年，张秋远已十八岁了。他离开了汉阳，开始

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在汉口拉过黄包车，到上海当过码头工，干尽了人间牛马活，尝够了人间的辛酸苦。一九三一年，他二十七岁了，同一个贫农的女儿李凤结了婚。结婚后，没有过上一个好日子，仍然过着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久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他家乡的肥田沃土。日本飞机对汉口狂轰滥炸，大街上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他想：“与其将来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做工，还不如到后方去做工的好，多少炼一点钢铁，为打日本鬼子出一分力。”于是，他决心离别妻儿，出发到桂林去了。

为了到桂林去，张秋远与同去的工人勒紧裤带，当卖衣服，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桂林，又是一盆冷水浇在张秋远的心头上，“为抗战多炼钢”的一丝希望也成了泡影。

那时中国的钢铁工业本来就支离破碎，一片萧条。桂林中都冶铁厂，名义上打着“为抗日多炼钢”的旗号，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根本不想真的干。张秋远和一些撤退到大后方的工人，一起修复了炼钢炉，满心以为能炼些钢铁，可是资本家借口原料缺乏，常常让炉子空着肚皮。后来，张秋远又被派到偏僻的鹰山响水崖的炼铁炉车间，名曰车间，实为荒山。那里顽石累累，荆棘丛生，陈旧的炉子又低又矮，建炉以来从没冒过烟。面对这破败景象，张秋远和其他工人有力使不出，又气又急。有个老工人用脚一蹬炉边的砖，砖块居然掉了下来，这样的炉子别说炼铁了，就是烧饭也煮不熟。原来这只炉子是按照洋人十八世纪的技术资料来设计的，东倒西歪，透风漏气，根本就不能使用的，哪里能炼出钢铁来呢！

工人们为了多炼钢铁打日本鬼子，对炼铁炉进行了翻造。刚动手了几天，资本家闻讯赶了来，大发雷霆，污蔑工人异想天开，损坏了他的家当，竟无耻地扣去拖欠工人的工资，以作赔偿，真把工人们肺都气炸了。

烟囱不冒烟，炉子不炼铁，工人们就只好成天打杂。两年过去了，还不见炼一炉铁。工人的工资虽然七折八扣，但还是能发给一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天，一个工人从桂林回来，拿来了一张报纸，给大家看：“看看！我们中都冶铁厂生产国产钢铁的消息。”

张秋远听一个工人读了报，更奇怪了。

原来报纸上的新闻说：中都冶铁厂，为了发展民族钢铁工业，支援抗日战争，钢铁产量不断增产，为国防工业提供原料，制造大量武器弹药，支援前方，等等。

“这是吹牛！”张秋远忍不住地说。

那个工人说：“不仅是这样。我在总厂的确看见许多钢锭，原来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有些人专门在那儿把外国商标摘掉，打上中都冶铁厂出品的中国商标，再转卖出去。”

张秋远纳闷了：“这搞的什么名堂？”

但是不久张秋远和其他许多工人都明白了：原来资本家修建炉子并不是要出钢铁，只是为了装装门面。一方面打着幌子向当局要求借贷、投资，另一方面再拿这些钱来搞投机倒把。而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又借此向人民大肆勒索。他们就这样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大发国难财的。

张秋远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的面目逐渐看清了，对这些大发国难财的官僚、资本家的狼子野心也看透了，他知道靠这批家伙是不可能发展中国钢铁工业的，他的多炼钢铁抗日救

国的幻想破灭了。这时，他收到了家里来信，说父亲生病，妻子儿女都在街头讨饭。他感到自己来到大后方，一事无成，心如油煎，就决心回家乡去。对工人要离职，资本家真是求之不得，还声言：“谁愿意走就走！本厂决不留难。”就这样，张秋远离开了中都冶铁厂。

回到家乡，他走进家门，只见老父病卧在床上呻吟，妻子号哭呜咽，孩子饿得奄奄一息。这种凄惨的情景，叫他怎么不心酸？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千家万户，哪一家不是过着苦难的日子？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张秋远只得借了高利贷来做小生意。他想贩卖柴炭，结果在过封锁线时柴炭被日本鬼子抢去了。他又借高利贷，挑了担子在街上卖鸡蛋，结果是连人也让日本鬼子拉伕拉去了。

赤日炎炎的盛夏，张秋远与那些被拉伕来的苦工在鬼子刺刀的逼迫下，在汉江的码头上背着沉重的货包。人们汗流浹背，又渴又饿，艰难地迈着步子。一个体弱的苦工支撑不住，昏倒在地，就被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鬼子捆绑起来，丢入江水中，残忍地以杀人来取乐。

这残酷的情景，使苦工们心中燃着仇恨的火焰，冲向那几个杀人的日本鬼子。

码头上的日本鬼子也哇哇地叫着，用刺刀对准了这群狂怒的苦工，把他们给拦住了。

汉江水呵！永远记下了这笔血泪仇！

一天，张秋远正呆呆地站在铁丝网边，阶级兄弟惨死的景象一直在他脑海里浮现。这种地狱般的苦难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啊！他恨不得逃出这虎狼窝。他遥望着灰蒙蒙的远方，思

念着家乡的亲人。忽然，一声轻轻的呼唤，打断了张秋远的沉思。他定睛一看，竟是个白发苍苍的乡邻。

“大爷！你怎么来啦？”张秋远抓住铁丝网问。

“秋远哪！算是把你找到啦！”大爷颤抖着声音说，“你离家一个多月，没个消息，可把家里人急坏了。你父亲病更重了，大口大口地吐血，怕快不行了。他老人家整天地叨念着你，想见见你，托过我三次都没找到你……”

张秋远正想说话，见一个日本鬼子骂着奔了过来，那个大爷连忙闪身走了。

“大爷！大爷！我会回来的啊！”张秋远大声叫着。

那个大爷走远了。张秋远紧紧抓着铁丝网，恨不得用双手扭断这铁丝，插翅远飞，飞到亲人身旁。突然，背后传来“叭嘎牙罗”的骂声，那个前几天杀害中国苦工的鬼子冲了过来，对准张秋远，“啪”的一个耳光。张秋远被打得一个趔趄，两眼金星直冒，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你的，不能哇啦哇啦！明白？”鬼子嚎叫着。

张秋远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咬咬牙，倔强地回答：“不明白！”

鬼子听了“哇”地一声，象疯狗似的暴跳起来，跑上来劈头盖脑地又是几个耳光。这个野兽抓住了张秋远，用日本武士道的柔术甩了张秋远一个“背包”，把张秋远摔倒在地，用带钉的皮靴踩他的肚子、胸脯。张秋远昏了过去。

惨无人道的鬼子又用冷水把他浇醒，要罚他跪在地上托水盆。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张秋远怒目圆睁，昂首挺立着。

这时，围在张秋远身边的苦工越来越多了。人们看到鬼

子侮辱中国工人，个个紧握着拳头，怒视着鬼子，一步步地逼了上来，他们准备和鬼子拚命了。

那个鬼子见势不妙，忙缩紧了脖子，一步一步倒退回去，最后象王八似的缩进乌龟壳一样的碉堡里去了。

夜里，棚子里十分闷热。张秋远躺在地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悲愤交加。他原是个钢铁工人，也有着一颗为国家、民族炼出钢铁去消灭日本侵略者的热心。可是他从沦陷区跑到大后方，又从大后方跑到沦陷区，却到处找不到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现在身陷魔窟，受尽凌辱，只落得有国难保，有家难归。精神上的痛苦远远超过他肉体上所受的痛苦。眼前，他一合眼，就会出现老父亲那又黄又瘦的脸，耳边仿佛听到父亲呼唤自己的凄厉声音。他想到过去母亲去世时，自己远在上海当码头工，连最后一面也没见着。现在父亲已经垂危，难道也不能见一面啦？想到这里，不禁一阵心酸，泪水夺眶而出。夜深了，他浑身的伤痕在隐隐作痛，感到自己在这里再待下去也要被折磨死，还不如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冲出这虎狼窝。于是，他暗暗下定了逃跑的决心。

快到后半夜了，天地一片漆黑，张秋远摸索着走出了屋子，沿着墙根爬到铁丝网前。他警惕地望了一下四周，就拚命挖铁丝网下的泥土，然后用砖头一块块地将铁丝网垫高。正在这时，有一道手电光直射过来，原来是放哨的鬼子走过来了。张秋远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直等那个鬼子走远了，他才身子紧贴着地面，钻出了铁丝网。他在地上爬着、爬着，连手心和膝盖也磨破了。他忍着痛，爬出了危险地带，站起来跑了。

茫茫的黑夜，张秋远开始了跋山涉水，向着自己的老家孝

感县的方向走去。他历尽千辛万苦，在一个乌黑的夜里，终于走到自己老家的村口上了。

村子上发生什么事了？简直认不出来了。

打谷场上凝结着一片片黑紫色的血迹，整个村庄到处是断墙残壁，四处散发着刺鼻的焦臭味。只有他家和邻近几家小土屋没有被烧。张秋远摸到自家屋前，心里不禁一阵紧缩：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凳子翻了，锅被砸了，破烂东西散满一地。“难道他们都……”一个可怕的念头袭上了张秋远的心。他只感到一阵昏眩，踉跄了几步，差点跌倒。他斜靠在一棵烧焦了的树干上，过了一会，他又强撑着身子，去寻找亲人了。

田野里一片凄凉的景象，空气象死一般凝结住了。

张秋远在村子周围到处找，找到了坟地里。黑黢黢的，一个又一个土坟堆上野草在索索地响着。忽然，张秋远看见了几个大人、小孩躺在草堆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喊：“谁？”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张秋远走近了，果然，是自己的妻儿；亲人相见，悲喜交集。妻子哭着说：“秋远啊！爹……爹已经死啦！”张秋远想到自己终于没能在爹临死之前见上一面，心里无比悲痛，也忍不住哭了。

原来不久前，村里来了三个鬼子和一个汉奸，一进村就要鸡、要蛋、要“花姑娘”，大家忍无可忍，举起了锄头、铁锸，当场就把三个鬼子打死了。没隔几天，逃回去的汉奸领了两支鬼子的马队来扫荡，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浓烟大火从孝感一直蔓延到黄陂，三十六个村子遭了殃。张秋远的父亲就是在这时被日本鬼子害死的。

“这儿，就是爹的坟啊！”妻子指着一个土堆说。

炎热的夜空，浓云猛骤，一阵凉风刮来，突然，夜空中一声

惊雷，一道道闪电劈开了这黑暗的世界。

张秋远默默地站在父亲坟前。他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满腔的仇恨！

三

抗日战争胜利了。

这个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取得的，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却一直缩在峨眉山上，消极抗战，投降卖国。而抗日战争一取得胜利，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却十分卖力，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把他们龟缩在峨眉山上的军队用空运抢占沦陷区的大城市进行劫收，疯狂掠夺国家资财，积极准备内战。沦陷区的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遭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解放区，劳动人民才真正得到了翻身解放。

这些年来，张秋远东打一天短工，西干一天零活，妻子儿女四出讨饭，这哪儿是人过的日子啊！张秋远总以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穷人有好日子过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劳动人民是不可能得到翻身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大哥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说上海有一家中兴钢铁厂（上钢三厂的前身）正在招工人，希望张秋远能够去上海。张秋远收到这封信十分高兴，以为自己从此有了本行的职业，可以养家糊口，有好日子过了。他为了筹集盘费，白天黑夜地给人家做短工、干零活，直到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才出发到了上海。那时张秋远已经四十三岁了，成了个又瘦又长的“小老

头”，体力大不如前了。

和兴钢铁厂是属于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实际上这只是汇集资金的一块招牌，工厂还是控制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张秋远等到招工的日子，就到和兴钢铁厂去投考。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挑选有力气、有技术的工人为他们卖命，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考试。

这天，天气十分炎热，参加考试的人们在骄阳下排着长队。只见平炉车间里有着两只小小的平炉，炉子装入量只有九吨。负责监考的工头是个非常凶恶的胖家伙，他把参加招考的工人领到料场上，指着一堆钢锭说：“钢铁厂全是力气活，不是‘养老院’。我们要的是有力气的工人。来，先看看你们有几个能扛起这两百多斤重的钢锭，扛到平台上去。”

这种残酷的考试，一下子就把一些体质差的工人赶走了。那些自知扛不动这钢锭的工人自动地走了，长长的队伍一下子缩短了不少。张秋远自知长期受饥挨饿，体质大不如前，但他咬了咬牙，还是扛起了一根钢锭。他和那些扛了钢锭的工人一起向着又高又陡的平台梯级走去。走在张秋远前面的那个工人，一起步就双腿发抖，上梯子才几步，身子就摇晃；突然，那个工人腿一软，连人带钢锭摔了下来，幸好钢锭没有压着他，但他已口吐鲜血了。

“妈的，扛不动来凑什么热闹？”监考的工头冷笑着说，“快替我滚开，你不能录取了。”

张秋远连忙撂下钢锭，上前把那个工人扶了起来。那个工人擦着嘴边的血，怒目瞪了那工头一眼，打着胸口一瘸一瘸地走了。

张秋远同情地瞧着那个工人走了下去，心如刀割。他重

又扛起钢锭，一步一步小心地走上了平台。

第二天，张秋远又小心翼翼地经过各种考试。最后，那个监考的头才算是给了他考勤卡，说了一声：“你被录取了。”张秋远看着手中的考勤卡，心里一下子明白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穷人仍然和过去一样，仍然受苦受难啊！

从此，每天天不亮，张秋远就得赶到厂门口去排队，让工头在考勤卡上记时间，如果误了点，就得扣工资。从早到晚，他穿着草鞋，披着破麻袋，将一块块废钢扛到平炉旁，向炉膛里投去。他不断地出汗，又不断地被灼热的炉火烤干，身上满是白花花的盐花。但是他得到的工资，根本就无法养家糊口。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就带一小铁罐霉米和炒熟的咸菜。到了中午，他就将一块废钢放在炉门口烤红，然后钳出这块红钢放在地上，再墩上铁罐烧饭。吃饭没有规定的时间，要把活干完了，抽空才能吃饭。但是，活是永远干不完的。如果工头对他不满意，随时都可找岔子。有一次，张秋远因不堪工头的辱骂，顶了工头几句，得罪了工头。于是，当张秋远把铁罐墩在红钢上烧饭时，工头走来一脚把他的一罐饭踢掉了。

“妈的，光顾吃饭，不想干活啦？”工头骂道。

张秋远也火了，说：“你讲理不讲理？到一点多钟了，还不让人吃饭啊？”

工头哼了一声说：“没干完活就不准吃饭。”

张秋远真气得连肺都快炸了。

工头常常派最苦的活让他干，如叫他修格子房，或者进沉渣室敲渣。格子房里，周围都是发红的耐火砖。张秋远头顶湿草袋，吸足一口气，钻了进去。里边热浪扑面，只要一张嘴，就会吸进火一般烫的热气。当张秋远昏昏沉沉地钻出来时，

站在外边的工头拎着水从头到脚把张秋远冲一下，再叫他进去。特别是在沉渣室敲渣，更是火烫灼人。有一次，张秋远挥着二十四磅的大榔头，在沉渣室敲渣子。黑里透红的钢渣象雨点一样溅在张秋远的脸上、身上，前胸后背都烫出了鸡蛋大的水泡，脚面上也被烫起了泡。事后，连洗澡也不好洗。水泡破了后，就结起了一块块伤疤。但是伤疤还未退，检修的日子又到了，又得去敲渣了。这种受苦受难的痛苦生活，简直象是在人间地狱里一样啊！

张秋远从十三岁起就进钢铁厂当童工，虽然经常遭到失业，有时只好到处做小工、干杂活，但钢铁厂的活毕竟干了二十来年，也从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炼钢经验。可是在这个厂里，技术大权都垄断在极少数几个高级技师手里。工人只能成年牛马似的听使唤，干重活。在资本家的阶级分化下，一些技术人员拿着比工人高过许多倍的工资，他们把技术当命一样地保守起来。工人不仅学不到一点技术，就是象张秋远这样有经验的工人，技术也得不到发挥。因为技术人员怕工人有了技术会抢他们的饭碗，所以，如果知道哪个工人有技术，就要想方设法找他的岔子，停他的生意。因此，张秋远在这个厂里只好长期地当小工、干杂活。

不久，一个惨痛的打击又落到了张秋远的头上。

这天，张秋远下班后想去看看在吴淞钢铁厂的大哥。在马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吴淞钢铁厂的熟人。那人一见他就气急嘘嘘地说：“秋远，你大哥在炉前突然发了中风，眼看就要不行了，你快去看看他吧！”

这个消息真是太突然了，犹如晴天霹雳般的轰得张秋远脑袋嗡嗡直响。他略定了定神，问清大哥已被人抬到家里，就

一路小跑向大哥家奔去。

大哥住的是名叫“滚地龙”的棚屋。当张秋远到他大哥家里时，他大哥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

一些工人亲切地陪着他大哥，大家心情很沉重。张秋远一见大哥就叫了起来：“大哥！你怎么啦？”

大哥毫无反应地躺着，只有鼻孔里还有一息微弱的呼吸。

“刚才我去向厂方借钱，厂里账房说：‘这个人工资也停发了，还借什么钱？’资本家真毒辣，他见工人生了病，就一脚踢开了。”一个老工人对张秋远气愤地说。他把厂方的一份停职“通知”给了张秋远。

张秋远接过停职“通知”，心中不禁燃起一股仇恨的熊熊烈火，他猛地站起来，把手中的通知单撕得粉碎，他恨那些毫无心肝的资本家，恨这黑暗的旧世界，恨不得一锤把它砸个稀巴烂！

这时，他大哥突然喉管里呼噜了一阵，头一歪就咽了气。这个十几岁就进钢铁厂做工的老工人，四十多年来流离奔波，被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体弱多病，终于让资本家吸干了血汗，含恨离开这黑暗的人世了。

眼泪从张秋远的脸上流下来，他悲愤地说：“大哥！这个世道不会长久了，你安息吧！”

夜很深了，黄浦江水拍打着江岸。张秋远站在江边，咬紧牙根，仰望着茫茫的黑夜，回想着大哥苦难的一生，旧恨新仇在他心头翻滚。近来，他不断听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频频溃败，因此他感到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了。他望着黄浦江的上空，觉得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将到来了。

象平地一声春雷，解放的炮声已越来越近了。

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人民的军队迅速地逼近上海。

在临近解放的日子里，和兴钢铁厂的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反动官僚盗卖物资、破坏工厂。张秋远和阶级兄弟一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毅然地扛起铁棍作武器，投入了艰巨的护厂斗争。黄浦江边乌云溃散，杨思桥畔曙光初照。蒋匪帮残兵败将纷纷逃下海，人民解放军跟踪追击。敌人为了争得苟延残喘的时间，就用炮火狂轰，用炸药狂炸工厂。张秋远不顾炮弹在身边爆炸，也不顾武装的匪军怎么杀人不眨眼，始终不离战斗的岗位，决不让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来破坏平炉。他和许多护厂队员一起，坚决保护人民的财产，使工厂完整地保存下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响亮的歌声传来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人民解放军来到了，来接收人民的工厂了。

一轮红日升起，东方变得一片红，解放了！

四

春风吹遍黄浦江，红日照进钢铁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代表庄严宣布：“工人同志们！从今天起，工厂是人民的财产了，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啦！”

站在人群中的张秋远再也不能平静，四十年的苦水仿佛一下子要倾吐出来，翻身得解放的千言万语也似乎要迸发出来，他眼眶饱含着热泪，激动地尽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的发自内心的呼声，顷刻与大家的呼声混和在一起，象雷鸣一般，划破彩云震撼长空。

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支援前方,平炉不能不冒烟,轧辊不能不转动。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恢复生产,张秋远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决心把破残的工厂恢复起来,开始走上重建新中国钢城的第一步。面对着缺器材、少原料、破败萧条、凄凉冷落的烂摊子,张秋远他们群策群力,日夜东奔西走,翻遍垃圾堆,挖开污水沟,半块铬镁砖,几把钢钎,几颗螺丝钉都不放过。甚至还发动家属拾废铜烂铁。工人们拔尽长满车间的野草,赶跑了在炉膛里做窝的鸟雀。他们重砌了炉子,点燃了炉火。平炉车间复活了,烟囱冒出了欢腾的烟,鼓风机也尽情歌唱了。

刚开始生产,就遇到了一次困难和考验。

这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七、八月份,上海遭到了特大台风的袭击。黄浦江水猛涨,风涌浪高,把堤岸冲垮了一段。江水倒流,冲进了工厂,威胁着生产。

“格子房进水啦!”有人大声惊呼起来。

张秋远一听说格子房进水,就大吃了一惊。因为格子房是蓄热室,这儿进了水,平炉内的炉温就会降低,就会使钢水冻结在炉膛里,就会毁了炉子。军代表也在现场,张秋远挺身而出,对军代表说:“军代表!我有个建议,你立即组织工人兄弟去抢堵堤岸,这儿格子房由我负责抢救。”军代表表示赞成,立即行动。

有个技术人员建议停炉抢救。

张秋远毅然决然地说:“宁可丢了生命也不能停炉。”周围的工人都齐声说:“对!”张秋远带头第一个钻进格子房,用一草袋又一草袋的泥沙堵住了洪水继续流进去,他又一面盆、一面盆地把江水泼了出来。张秋远身上冒烟了,头发也烧焦了,

身上烫起了一个一个大水泡，但他还是坚持战斗。工人们见他这样，都很感动，大家涌上前去，不怕热、不怕烫，纷纷钻进格子房代替张秋远继续战斗。

经过一场紧张抢救，终于排除了格子房进水。

平炉的炉温又逐渐升高了。

张秋远一边擦着身体，一边用药水搽在水泡上，脸上却充满胜利喜悦的笑容。

有人问：“张师傅！你身体烫成这样还高兴哪？”

“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张秋远看着平炉炉门口喷吐的火焰，喜悠悠地说：“今天与过去不一样啦！过去我们是为资本家卖命，今天是为我们自己干了，我们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为社会主义干，为共产主义干，为了这个不要说把我身体烫了，就是献出生命，我也会笑哩！”

是的，解放以后，张秋远变了。他是那么精神奋发，身体也是那么健朗，几十年来的愁云从他脸上一扫而光，他的脸上总是充满着愉快的笑容，甚至连走路脚步也变得十分轻松，身上充满着革命的干劲。

当平炉出钢时，当钢水象一匹红绸展开、奔腾着向盛钢桶流去时，当车间被钢水的红光映红时，张秋远的眼眶湿了，他是多么兴奋、多么地激动啊！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六日，这是张秋远永远难忘的一天。他面对着红艳艳的党旗，热泪盈眶，举起了右手，紧握了拳头，向党和毛主席宣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张秋远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成了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阳光普照下，他在革命的征途上前进得更快了。

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声中，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凌晨

晨，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上钢一厂来视察，来到了我们上海钢铁工人中间。张秋远听到这个喜讯，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黄浦江奔流得更欢了，平炉车间的钢水也奔流得更动人心魄了。东风化雨红旗飘，炼钢炉前春意闹。

为了多炼钢，炼好钢，张秋远不分白天黑夜地和群众一起大闹技术革新。他干脆把铺盖也搬到车间里，他睡在车间，吃在车间，战斗在车间。已经五十四岁的张秋远，瘦长的个子是那么精神焕发，干活象拚命。烈火的烤灼，使他的鼻梁和脸颊呈现了玫瑰红，也使他对党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炼得更红了。

一天，当满满的一炉钢水烧到发白发亮时，张秋远正检查好出钢槽回到炉前，就拿着看火镜观察炉内的情况。突然，他发现钢水翻起的大泡中隐隐约约有些黑星子，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急忙凑近炉门，不顾火舌舔到自己身上，烤得眼睛直流泪，一直注视着炉内。他看出来，大叫一声：“炉底有坑！”

正在休息的炉前工一听，忙围拢过来，纷纷举起看火镜观察。有个青年工人迷惑不解地咕唧了一句：“炉火、钢水不是挺正常吗？”

张秋远一听到这话，就耐心地对他说：“钢水在摄氏一千六百度的高温中翻腾，正常的钢水泡子是发白雪亮的，而现在你看，大泡里含有不少黑星子，这就是渣滓，一定是炉底受损，铺垫的镁砂和炉渣被钢水翻上来了。”

“炉底受损？”炼钢工人最担心的是发生严重事故，顷刻之间，气氛紧张起来，大伙儿噤噤喳喳地议论着。

作为护炉技师的张秋远更是心如火燎，但头脑也更冷静。既要保住快要炼好的这炉钢，又不能让炉子受到更大的损伤。

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肩上的份量。他思考了一下，果断地站出来指挥，一边采取周到的防护抢险紧急措施以防万一，一边继续加速冶炼，一等到符合质量标准就马上放钢。

钢水还在奔泻，他早已准备好补炉的工具和材料。装满钢水的包子刚吊去浇铸，炉膛里还鲜红透亮的，张秋远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保证下一炉钢水准时炼好，他毅然拿起压缩空气管子，插进还有一千多度高温的炉膛，对准坑坑洼洼的地方把残钢废渣吹去。不一会，就看清炉底果然有一个深六、七寸的大坑，钢水差一点就侵蚀到炉底砖。要把这样少见的深坑里的渣滓吹干净，需要多少艰苦的劳动，又需要多少顽强的毅力啊！

一分钟、二分钟过去了，张秋远脸上被烟火熏烤出来的汗珠象雨点一样洒落下来，滴在滚烫的炉前铁板上，化作缕缕的白烟。四分钟、五分钟又过去了，他只觉得头昏眼花。同志们见他摇摇晃晃快站不住了，忙跑上来要替换他，张秋远坚决地摇了摇头：“别替我，炉子要紧，换个人，一停手，钢水残渣又会回流到坑里去，你们拎桶水朝我身上浇就是了。”为了多炼钢，炼好钢，他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真是“泰山压顶不弯腰”，坚持战斗在烟雾腾腾火光熊熊的炉前。清除了炉渣，就开始了补炉，大家把一锹锹镁砂向炉膛内扔去，一会儿就补好了。

“当——当——当！”加料的钟声响了。

大家见张秋远满身焦糊味，都很感动，一只只手递过一杯杯冷饮水。张秋远干裂的嘴唇动着，说：“快！争分夺秒，再炼一炉优质钢，把时间争回来。”张秋远一心为钢，忘我的劳动态度，使一些工人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霜打青松松更青，雪映红梅梅更红。

一九六二年春节来临了，一年到头奋战在炉前的张秋远，被老伴好说歹说劝上了从浦东周家渡开往江边码头的轮渡，带着一家人去市区走走，买一点日用品。

在渡轮上，他老伴说：“老头子！你整年整月的尽想厂里的炉子，连剃个头都没时间，等会剃个头。”

“嗯！剃头事小，炼钢事大。”张秋远摸摸自己的头发说：“近来，苏修反华反得很厉害，他们把厂里的专家撤走了，合同也撕毁了，恶毒攻击我们。他们以为没有他们，我们就炼不出一炉特种合金钢了。我们要争气，一定要把许多高级合金钢炼出来。你看看，哪有时间顾上剃头啊？”

渡轮快靠上岸，大家的视线都被江南造船厂刚下水的巨轮的雄姿吸引过去。他老伴指着这艘巨轮的船头问：“这叫什么船名啊？”

张秋远心不在焉地回答：“叫烟囱嘛！”

“啊！”他老伴大吃了一惊。她忙回头一看，只见站在身后的张秋远正聚精会神地望着上钢三厂平炉车间那高大的烟囱。日光中可以清楚看到烟囱冒出来的团团浓烟飘动着。老伴又好气又好笑，刚想责怪张秋远，只见张秋远眉头皱紧，似乎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了。

渡轮靠上岸，张秋远没下船，却指着烟囱对老伴说：“你看！起先烟囱里的烟是笔直不断地喷出来的，现在变得断断续续，一团一团象在喘大气。一定是炉子出了毛病了。为了打击帝修反，一定要炼好争气钢。我马上得回厂去，你自个去南京路吧。”

老伴听张秋远这么说，虽然心里感到最好同老头子一起

去南京路,但她还是点头同意了。

张秋远就这么又坐船回对岸,赶到厂里去了。他一走进车间,边脱衣服边走上炉台。果然,平炉炉前围满了人,原来是炉内老虎头水箱漏水了。炉内不能喷煤气,所以一会开,一会关,烟囱里的烟断断续续的了。

“啊!好了,护炉技师张师傅来啦!”

有人问:“张师傅!你怎么知道炉子出了毛病啦?”

“我在江边码头,一看烟囱就跑来了。”

大家听了,都十分激动,对张秋远更敬佩了。

张秋远立即投入战斗,带领大家抢救。当抢救完毕时,张秋远早已弄得全身一片乌黑,汗珠直淌。但他脸上充满笑容,愉快地去洗澡了。

他洗好澡,又被一群青年工人围住了。大家要他谈谈护炉技术方面的问题。张秋远就在休息室里把自己在解放前偷学的技术、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学的护炉技术向大家详细讲了。他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这些青年原来是新进厂的,是分配学护炉的。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张秋远把这当成头等革命任务来完成。他把着手教他们,从怎么吹压缩空气,怎么扫除炉内废钢残渣,到怎么补炉。并告诉他们怎么观察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事故苗子的方法。

有一次,平炉正修好炉。张秋远就带着一个青年工人一起检查炉子,炉前炉后转来转去,敲敲弄弄,听听看看,当他走到煤气升道口时,忽然感到里边回风声音不对,便捶了捶脑袋说:“不对头。”他忙走到炉前,就要往炉膛里钻。那个青年工人拉住了他,说:“里边检修用的电灯已拆掉,什么也看不见

的，再说烘炉子的火已点燃了。”旁边的一些泥工也劝阻他。张秋远急了，说：“我们要对毛主席、对党负责，对工作一定要一丝不苟。”他挣脱了同志们的劝阻，钻进了开始发红的炉膛。

炉内呛人的烟雾使他睁不开眼，无法查清煤气升道口里的情况。他想了想，拾了一块石子扔了进去，只听得“当啷”一声，断定里边有东西。他连忙叫来泥工，把煤气升道壁拆了几块砖，再用铁条捅进去，边搅动边侧耳细听，又是“当啷”一声。张秋远凭着长期积累的经验，说：“同志们！有一块铁板砌在道壁里边了，煤气管道有了阻塞，就可能引起爆炸，造成大翻坑。我们一定要把它取出来。”

果然，大家把煤气升道壁再拆开，一块泥工作业踏脚用的铁板赫然出现在眼前，大家忙把铁板取了出来。

“好险啊！”大家同时出了一身冷汗。

张秋远对旁边学习护炉的青年工人说：“你看，我们护炉工作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那个青年工人说，“我一定向师傅好好学。”

张秋远谦虚地笑了。

这一年春节，张秋远家里有一群年轻的工人来“拜年”。张秋远瞧着一个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心里非常高兴。他说：“你们都成长啦！能够挑起革命重担了。见你们一代新人成长，我比什么都高兴。你们永远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干了几十年，在旧社会吃够了苦，受尽了罪，只有解放以后才真正成了一个炼钢工人，现在生活多么幸福。我已经上了年纪，退休了。但是说真的，我真想‘返老还童’，象你们这样重新开始。我羡慕你们，为你们高兴。我人虽退休，心是永远不会退休的啊！”青年们听了他这席肺腑之言，都十分

感动。整间屋里，笑声不绝，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张秋远走到窗前，指着雄伟的钢厂，说：“看！多美的工厂啊！平炉又在出钢了。往后这是你们的啦。”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升起来了。

阳光把张秋远的脸映得通红，使他更精神焕发了。房里的一群青年也显得更朝气蓬勃了。

张秋远背诵着毛主席教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师傅！”大家欢快地叫了一声。

张秋远也欢快地笑了。

大路新歌

——上海城建局沪南工务所老工人朱为山的家史

初夏的一个早晨，天空晴朗，朝阳明媚。上海虹桥机场披着一身金色的阳光，显得格外开阔、壮丽。一架银灰色的大型客机昂首翘尾地停立在机坪上，它那雄赳赳的姿势，就象一位等待出征的勇士。

高大、明亮、整洁的候机室大厅里，人们东一簇、西一堆地侃侃而谈。衷心的祝愿，诚挚的嘱咐，幸福的欢笑，依依的话别，形成一股热烈而并不喧闹的声流，给人以亲切、温暖的感觉。

在大厅的北角上，一簇人围着一位中年男子，在热烈地向他祝愿道别。这个中年人四十几岁，中等个子，体格壮实，精神焕发。他，就是上海城建局沪南工务所工人朱为山。他伸出双手，面堆幸福的笑容，忙着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祝愿、叮嘱和道别，可是他却只是憨笑、点头、握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是啊，此刻他心里激动着呢。一个解放前的马路小工，现在要出国了，而且是去到那遥远的阿拉伯半岛南部，支援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修建公路。他的心里啊，就象一江黄浦江水都被煮开了，激荡沸腾，热浪滚滚，千言万语，叫他从何

说起呢？

招呼旅客上飞机的喇叭响了，朱为山又一次和同志们热烈握手告别，然后跟着人流向停机坪走去……。

飞机的四只螺旋桨开始“呜呜……”的转动起来，一会儿，就带着机身滑向跑道。当飞机滑到跑道尽头，转了个向，又突然停了下来。但是，只有短短不到一分钟时间，四只螺旋桨又猛然吼叫起来，紧接着，就对准那条笔直的跑道，象支脱弦之箭似的向前射去。

这一刹那间，在朱为山眼前闪现出一条金光灿灿的宽坦大道，就象一条金色的带子，笔直笔直地从天泻落，并不断迅速地在他眼前伸展、扩大，最后，终于化入那广漠无垠的蓝天之中……。

飞机在万里晴空中平稳地飞行着。朱为山的心里却久久平静不下来，特别是那条金色的大道，深深地铭印在他的心坎上。

路，他这个马路工曾修筑过多少路。可是在旧社会里，马路小工成年累月地用血和泪为剥削阶级筑路，自己祖祖辈辈却脚陷泥潭，没有出路！他的思潮如滚滚长江，又把他带到那苦难的岁月……。

一九二九年，朱为山出生在盐城朱家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一家七口，全靠父亲带着为山的两个哥哥租种地主几亩地糊口。为山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和哥哥下地劳动，一家人累断筋骨，流尽汗水，到头来一年的收成大部倒进了地主

的谷仓，一家人还是忍饥挨饿。一九四四年夏天，一场大水淹没了田地，吞没了庄稼，全家又陷入了颗粒无收的困境之中。那时，为山有位在上海做工的叔丈回乡料理丧事，见为山家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硬着头皮把十五岁的为山带到上海，想好歹给他找条生路。

为山到了上海后，叔丈东托人西求情地奔走了几个月，也无法给为山找到一个工作。后来，叔丈好容易打听到为山有一个远房亲戚，在当时的工务局当小工头，便决定去请他帮个忙。

这天，为山跟着叔丈一起来到这位远亲家。叔丈给他介绍了情况，请他给为山找个工作，可是那位远亲一声不响，过了好半晌，他才似笑非笑，阴阳怪气地说：“找工作，哪有这么便当，上海失业的人多如牛毛……”说到这里，他又停下了，连对叔丈和为山看也不看一眼。

为山从未见到过这位远亲，也从未听到过有这门远亲。他那阴阳怪气、爱理不理的样子，使为山很反感，所以就在心里叫他“温吞水”。看他那个架子，好象他们不是来请他介绍工作而是向他来要饭的。但叔丈还是耐着性子对他说：“你是八工段的工头，请你给上头说一说，还是行的。”

“温吞水”对叔丈瞟了一眼，嘿嘿冷笑着说：“说情？找上头说情的人多着呢，好话是不能当饭吃的。”经过一番交涉，为山要拿出五六斗米钱送人情，还要为“温吞水”家当佣人，才允许做工。

就这样，为山第二天就背着条破棉絮离开了叔丈家，在“温吞水”家的过道里搭了张铺，开始了他那马路工兼小佣人的生活。

上工的第一天，天不亮为山就急急忙忙赶到设在枫林桥的八工段。工段大门外早已站了许多脸色黑黄、衣衫褴褛的工人。工段的黑漆大门死死的紧闭着，为山只好挨着一位高个子老工人身边站着等候开门。

秋天的清晨已颇有点寒意。为山身上只穿了件单布衫，站了一会感到有点耐不住了，便轻声问身边那位老工人道：“叔叔，怎么还不开门哪？”

“早着呢！”那位老工人看了为山一眼，说，“工头大烟恐怕还没抽足呢。”

“那我们为啥不可以晚点来？”

“晚点来？”那老工人苦笑了一下，说，“小阿弟，你是刚来的吧？”

为山点了点头。

“所以，你还不知马路工的苦哇。每天六点钟开工，五点半就得赶到工地，五点以前工头就要点卯，可有时他高兴了，四点多就点卯，你赶不上点卯就算你迟到，要扣你工资。我们又没钟没表的，还不是随他摆布呀！”老工人说着，忿忿地吐了口唾沫。

这时，大门忽然“豁啷”一声开了，老工人忙拎起饭盒，拉了把为山：“走，进去吧。”

走进围墙大门，只见在一幢三层楼房前的台阶上站着个瘦瘦的大烟鬼工头，嘴里叼着支香烟，手里拿着本点名册，对着人群大声叫着：“一一四号。”人群里有人应了声：“来了。”

“一一五号。”瘦工头又叫着。

人群里没人应声。瘦工头用铅笔在册子上重重地划了一下，说：“这小子今天又不来了。”又回头对身后一个人说：“给

他找替工！”

老工人用手轻轻捅了下为山说：“听到了吧，你一迟到，工头就借口给你‘找替工’，这一天你就干不到活了。你这一天的工资就落进了工头的口袋，活呢？还是要大家干。”

不一会，点卯结束了。瘦工头装模作样地喳呼了一阵，大家就拿着工具上工地去了。台阶前就剩下了为山一个人。瘦工头发现了他，厉声问道：“小赤佬，还不快去做生活，站在那里做什么？！”

为山说：“我还没点着呢？”

“胡说，我每个人都点到了，你准是偷懒，迟到！”瘦工头翻了白眼珠又问，“你几号？”

“不知道。”为山回答。

瘦工头一听，瞪着眼珠说：“你他妈的是白痴吗？自己的号头都不知道！”

一见面就挨骂。为山心里很气。他真想回答他：“你才是白痴、大烟鬼！”可是他知道，这样一来，他也就别想工作了，那五六斗米的礼也白丢了，叔丈又要为他东奔西走地托人求情，因此只能忍着气说：“我第一天来呢。”

瘦工头想了一下说：“你是不是叫朱为山？是你亲戚介绍来的吧？”

为山点了点头，没作声。

“那你不早说？”瘦工头用点名册在他头上拍了下说，“好吧，以后你就在我手下工作了。可是不准调皮捣蛋，干活不准偷懒，点卯不准迟到，否则，莫怪我不留情。”

为山听他一连串说了好几个“不准”，心想：“这大烟鬼还挺会挑剔，以后得留点神。”

这时，瘦工头从里面拿出件旧蓑衣，一顶油纸糊的旧笠帽和一件红马甲，背上用白布扎着三个号码：“326”，交给为山说：“这是给你的，以后你的号头就是326。”

为山接过这些东西，转身就往工地跑。

“站住！”瘦工头对为山喝道。

为山不知什么事，只好停下来，回头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他。

“马甲穿起来！”瘦工头命令着。

为山觉得穿起这红马甲挺难看，象个囚徒一样。但看工头的架势，似乎是非穿不行的，也只得把它套在身上。

为山来到工地，看到十几个人正弯着腰，耷拉着头，拉着一只大石滚，“吭唷，吭唷”地来回转着。沉重的石滚在煤渣地上发出吱咕吱咕的声音。那些工人赤裸的上身套着件红马甲，油光光汗涔涔的，鼻孔里不断地喘着粗气。为山看着这情景，想起自己在乡下，因为没有牛，父亲和哥哥就是这样拉着犁耕地的。上海有那么多汽车，想不到也要这样来修马路。他正想着，瘦工头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一见他就叫道：

“小赤佬，还呆着做什么？就在这里拉石滚！”

为山只得接过绳子，往肩背上一套，便拉起石滚来。半天拉下来，肩背上的皮很快被磨破了，经汗水一渍，刀割似的疼痛。那石滚子越来越重，他的两条腿却越来越软，有时，简直想一头倒到地下，好好躺上几分钟。可是那瘦工头却时常来盯着他，见他背后的绳子松了些，就喳呼起来：“小赤佬，别偷懒，今天你是第一天，要是偷懒，就叫你回家去。”

下午，天边涌起了一堆乌云，为山实在支持不住了。心想，天要下雨了，这下可以休息一会了。因此，就咬着牙关硬撑

着。一会，豆大的雨点洒落下来，拉石滚的人一下子散了，纷纷向临时工棚跑去。为山实在一步也跑不动了，就在马路边的屋檐下坐了下来。屁股刚碰上阶沿石，“啪”的一声，一根皮鞭抽到他的光背脊上。他回头一看，瘦工头凶神恶煞似的瞪着他骂道：“小赤佬，偷懒你总是第一个。”

“天下雨了。”为山理直气壮地回答他。

“这点雨大惊小怪什么？蓑衣是发给你玩的吗！”瘦工头说着，举起鞭子又要向为山抽下来。一个姓王的老工人上来挡住了。

“算了吧，人家第一天来，还是个孩子呢。”王师傅对工头说。

瘦工头鼻孔里哼了声说：“孩子？老子的钞票可不是好骗的！”

为山真想拾起块石子朝这大烟鬼脸上扔去，可是全身实在一点力气也没有。这时，他见其他工人都穿上蓑衣从工棚出来了，这才明白早上瘦工头发给他那套蓑衣笠帽的用意，只得迈着艰难的步子向石滚走去……。

过了几天，瘦工头又叫为山去烧柏油。

秋天的晌午，太阳仍然使人感到有点火爆火燎的。为山跟着王师傅等几个老工人来到烧柏油的地方，还未走近油锅，只觉得一股热呼呼的油蒸汽迎面扑来，刺鼻的难闻。在老师傅的指点下，为山和另外两个工人把一桶桶的硬柏油放在一个用砖搭起的炉灶上预先加热，等到油桶里的硬柏油开始发软后，再把柏油桶推到那只熊熊燃烧着的大油锅前，将桶里的柏油倒入大油锅加热到三百度，然后再由工人用小铁桶一桶桶地运送去浇铺路面。天上烈日炎炎，地下油烟熏人，不一会，为山

就感到头晕眼花，浑身瘫软无力。可是他们还必须连续不断地把已经加热了的油桶推到大油锅前，倒入油锅。二百来斤重的柏油桶，几个人吃力地顺着一头搭在油锅上的跳板往上推，一不小心就会滚落下来压伤人，或者把油桶跌落到油锅里，那就更加不堪设想！为山见这样推实在太吃力，便想爬到横搁在油锅上的一块跳板上去帮着往上拉。当他一只脚刚踏上跳板，背后突然伸来一只手把他拉住了：

“谁叫你上去的，你不想活啦！”

他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王师傅。王师傅把他拉到地下，又说：“你刚来不懂事，也不问问我们，那上面是能去得的吗？”

接着，王师傅就告诉为山一件惨剧：过去有一个姓郑的新工人，年纪才二十几岁，身体抵得上三个为山。在一次烧柏油时，他也站到油锅上面那块跳板上，可是只几分钟，就被滚烫的油汽熏得几乎昏倒，他正要下来，不料腿一软，脚一滑，就一头栽进了冒烟的油锅，等大家把他拉起来时，已经没个人样子了，满身粘糊着滚烫的柏油，大家只好看着他被活活的烧死……。

听完这个悲惨的故事，为山汗毛都竖起来了。他从心坎里深深感激王师傅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

半天柏油烧下来，为山实在精疲力竭四肢难抬了。那难闻的油汽熏得他脑袋象要炸开来似的胀痛难忍。他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却一口也不想吃，还一个劲地想往外吐。收工时，大家都去洗手洗脚拿起东西回家了，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阶沿石上好一会，才慢慢拎起小饭罐走向“家”去。从枫林桥到小西门，他蹒跚地走了一个多小时。一到“温吞水”家，他还要给他们洗衣刷锅拖地板，忙完这些，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第二天，他又得天不亮就去上工，上工之前，还得为“温吞水”一

家生好炉子，烧好早饭……。“温吞水”说，在上海住房子是要用金条押租的，对为山已是天大的面子了，而且为山还在他家吃饭。有啥办法呢？穷人除了一身筋骨两只手，一无所有啊！

二

就这样，朱为山成年到头地白天做小工，夜里做佣人，到了月底别人都领到了工资，他却分文没有到手。头一回，他去问瘦工头，瘦工头对他白了一眼说：“你小子不看看人头，我会吃掉你那几个工钱吗？你的钱早叫你那亲戚领去了。”

为山又去问“温吞水”。“温吞水”正在喝着酒，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却去拿来只红木算盘，嘀嘀笃笃一拨弄，把算盘往为山面前一推，说：“你自己看看吧，房钱饭钱，水电杂费，这些都不能让我给你出吧？”

经这一算，为山的工钱就只剩下一个零头了，而且，那五六斗米的送礼的钱还没有扣。最后，“温吞水”丢出几个零钱，说：“远虽远，亲总是亲呀，那笔送礼的钱只好我再顶一下，等你以后人大一点升了工钱再分期扣还罗。这几个就给你拿去零用吧。”

为山心里想：“好厉害的家伙，连我将来的钱都预先给扣掉了！看来我只要在这里，是永世也别想出头了。”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为山很清楚，只要他一离开这个“远亲”家，那么他就会立即遭到解雇。所以，他只得暂时忍受着。

在八工段，为山是年龄最小的一个。瘦工头认为他人小好欺，凡是对别人压不下的差使，就专找着他来。一天早晨，为山给“温吞水”家生好炉子，烧好早饭，就急急匆匆奔去上

工。他气喘喘地奔到工段，见瘦工头正在点卯，他庆幸自己总算没有迟到，工头就找不着他的岔头。可是等瘦工头点完卯，却不听到叫他的号头。等别人都走了，瘦工头对他说：“小赤佬，今天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晚？”

为山不服地说：“我又没迟到。”

瘦工头翻着眼珠说：“你干活死样怪气，嘴巴倒顶神气。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点卯是第一个。”

“为什么？”为山仍是不服地问。

“为什么？”瘦工头歪着脑袋，斜着眼睛，象只准备决斗的公鸡，说，“从明天开始，你得在大家点卯前把工具先推到工地去，晚上大家收工后，你得把工具收齐车回来。”

“为什么单叫我收送工具？”为山气愤地说。

瘦工头发泼地说：“他妈的，你是我手下的人，老子就不能支派你吗？你究竟干不干？”

为山本想回他说：“就是不干！”可是他知道，这句话一出口，就意味着他离开工务局。在上海，他除了叔丈，就举目无亲，而那个“温吞水”，恨不得把他连骨头都一齐吞下去。叔丈自己也是吃了早顿无夜顿，自己决不能再去牵累于他了。因此，只得咽下这口气，转身就向工地走去。瘦工头还在背后喳呼着说：“小赤佬，谅你也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瘦工头这次虽然暂时压服了为山，却也知道这不是个随便可以压服的小伙子。但他心想：“要是我连这样个小赤佬也压不住，那以后我又怎么能支配那几十号人？”从此以后，他就专门盯着为山找岔子，决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一次，瘦工头分派为山去抬石子。这活本来都是大人干的。一箩石子有二百多斤，抬着要跑老长一段路。为山当时

才只十六岁的人，个头又长得瘦小，哪里抬得动。可是瘦工头说人手不够，硬是要为山去抬。有几个老工人都为山评理，要瘦工头另外分派点别的活给他。瘦工头翻着眼说：“你们这些人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他自己没说不行，你们却非说他不。以后我还能支派人吗？我这头脑干不了，让你们来干罢。”

老工人离开后，瘦工头心里得意地想：“小赤佬，今天可要看你的了。你要向我求个情，否则，嘿嘿！”

可是，为山连正眼也不看他一眼，一声不响地拿起杠棒就向堆石子的地方走去。

二百多斤一箩石子，就象在地上生了根似的。杠棒搁到肩上，为山连身子也挺不起来。两个装箩筐的工人想给他少装点，可是瘦工头却象个阴魂似的盯住他，并扯着嗓子嚷嚷：“装满，别磨洋工！”和为山搭档的那位老工人只得把杠棒往为山那头伸得长长的，并让他先直起身子，自己再站起来。这样，为山才勉强地把那一箩石子抬起来。但走起路来两只脚就不听使唤，身子一个劲地东歪西倒。老工人一面尽力把箩筐往后拉，一面指点他：“步子跨小点，身子别往前挺，这样会闪伤腰的……”

时令正当三伏大热，头上赤日炎炎，地下路面烫脚。为山咬紧牙关抬了几箩，就累得浑身汗如雨下，嗓门干得冒火似的。但他总算挺下来了。瘦工头看着也发了呆：“想不到这小子还真能挺住了。”

中午吃饭时，为山却累得一步也迈不开了。放下杠棒，他饭也不想吃，就席地坐在旁边一家绸布店门口的阶沿石上，想借着屋荫先乘下凉，歇口气。他光着膀子穿着件红马甲，汗水

早已把它紧紧地粘贴在身上。那个布店里的老板一见这件红马甲，忙出来干涉：

“喂，红马甲，快走快走！你这么一坐，叫我别做生意啦？什么样子！”

为山不服气地问：“我坐在这里怎么就挡住你做生意啦？”

那家伙一听勃然大怒：“你嘴巴还老！你不到阴沟里去照照你这副样子，人家看见了谁还愿意上我这店门！”说完，他又回头对店堂里叫道，“去把他们头脑叫来，……”

为山还想和他争个明白，一位老工人过来把他拉开了：“这种人，你同他争什么？他把工头叫来，有你的便宜吗？还是快去吃饭吧，马上就要开工了。”

为山憋着一肚子气跟着老工人走了。

下午抬了一会石子，为山又跟大家一起去翻路面，到晚上下工时，两条腿简直好象不属于自己了。他提着小铁饭罐，连身上那件红马甲也懒得换，就挪着艰难的一步一步走回去。走了一段路，他实在走不动了，恨不得就在马路边上躺下来。可是，回去晚了，“温吞水”那个鬼婆娘又要对他喳喳呼呼地噜苏半天，因为还有一大堆家务要等他做呢！走过电车站时，他摸摸口袋，还有几个零钱，就破天荒地乘上了电车。刚乘了两站，上来了一个白俄查票的，一见他，就皱了皱眉头说：“红马甲，你下去！”

“我还没到站。”为山说。

“你不可以上来的，马上下去！”白俄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我乘车出钱，为啥不可以？”为山不服地说。

“阿拉公司规定，红马甲，不可以，快下去！”

那白俄长得象根电线木头一样，又长又瘦，车子一靠站，不容为山再分说，就将他推了下去。幸亏为山扶住一棵梧桐树，才没有跌倒在地上。

为山气愤至极，想对着车门骂他几句，可是电车早已“鸣”的一声开走了。

天已完全黑了，马路两旁的商店灯火通明，红红绿绿的霓虹灯象鬼眨眼似的乱转乱跳。对这一切，为山只有感到厌恶。他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红马甲，心里又升起一股怒火。他穿上这件红马甲一年还不到，可是受到了多少侮辱和欺凌！工头说什么这是马路工的标志，穿上它目标明显。实际上它却是马路工被欺压侮辱的标志，让工头们监视起来目标明显。穿上这件红马甲，工头老远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每个工人劳动时的情形，只要你稍有松怠，工头就可以根据你背上的号码来扣除你的工资。有许多工人领工资时发觉自己被扣了工资。想到这里，为山恨不得把身上这件红马甲脱下来撕个粉碎。可是，想到明天还得穿着它上工，而且眼前自己身上连件遮身的破布衫也没有，只好仍然把它穿在身上。他愤恨地想：“红马甲啊，红马甲，你简直是套在马路工头上的紧箍咒，马路工何时才能甩掉你而出头啊！”他正愤愤地想着，一只皮鞋脚突然踢到他的屁股上。为山抬头一看，见一个又高又粗的伪警察两手叉腰地站在他的面前，嘴里还在喝叱：“快滚快滚，不准坐在这里！”

为山心里想：“今天怎么尽碰见鬼！”也不想和他争论，就站起身来向前走去。谁知那伪警察还是在背后盯着他。当他走到一条横马路时，伪警察就命令他道：“红马甲，转弯。”

为山原来要向南拐弯的，但心里气不服，便瞪着眼问道：

“为什么？我走路也不能吗？”

“不准在这条路上走，懂吗？瘪三！”伪警察挥着手里的警棍威胁着说。

为山还想和他争辩，不料那家伙一把抓住他的后领，猛力把他推了过去。为山向前冲了几步，差一点没跌倒。

当时，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地压榨着中国人民，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可是，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的“天堂”，却禁止所谓衣衫褴褛的“游民乞丐”到租界上一些热闹马路上去，甚至象马路工、清洁工、黄包车工人这样一些下层劳动人民也在“禁止”之列。

为山迈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愤怒地想着：路，不论是光洁的柏油路还是平坦的水泥路，哪一条不是马路工修的？可是修筑这些路的人不仅成年吃不饱穿不暖，连在这些马路上行走的自由都没有！这是什么世道啊！

一九四五年秋天，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垮台、投降了，而喧嚣一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也长不了，他们在搞了一阵虚假的繁荣之后，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打击下，很快就走向穷途末路。那时，为山已经离开了那位“远亲”而独立生活。可是附在为山身上吸他血的并不仅仅是一两个工头，而是一群蚊虫似的剥削者。因此，为山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多少。如果说前两年累死累活，还能勉强糊口的话，到了一九四八年那就连一个人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在蒋家王朝接近灭亡的那段日子里，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早晨拿到的一点微薄工资，到晚上只能买到几只大饼。为了生活，为山不得不白天做马路小工，晚上又去踏三轮车。可是，白天和黑夜一样，黑夜却更加黑暗。有一次，为山一下工晚饭也来不及吃，

就急急忙忙踏着三轮车赶到北站，去等那到站下车的旅客。一个伪警察不声不响走到他车子旁边，什么理由也不讲就把他的坐垫拿走了。车子没有坐垫怎么能搭客呢？没有办法，为山只好把白天做工的钱全部拿出来买了两包香烟，又费了许多周折才把坐垫赎回来。这个晚上，为山不仅没做到一分钱生意，连白天一天的劳动也白丢了，回去还得交付三轮车租费，这样，又连第二天的工资也白白地赔掉了！

但是，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暂时的，黑暗的尽头，就是旭日东升的明天！

三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解放大军迎着绵绵春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上海市区。上海解放了，从此，奴隶们扬眉吐气翻身作了主人。

欢呼吧，“卑贱的奴隶”们！

跳跃吧，时代的主人翁！

这时朱为山已二十岁了，他看到这天翻地覆的变化，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干起工作来就象一只小老虎，浑身是劲，斗志冲天。在党的领导下，他和同志们一起组织工会，斗争为非作歹的工头，镇压恶霸，废除压迫工人的旧制度，在反轰炸反封锁斗争中，他积极地投入抢修队，哪里有战斗就冲向那里。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三反五反运动中，他积极参加“打虎队”，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胆揭发，勇敢斗争，为保卫人民利益坚守阵地，寸步不让。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朱为山迅速成长。一九五三年秋天，他参加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半年多以后,他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在举行入党宣誓那一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有多少话要对党讲啊!可是千言万语,又叫他从何讲起呢?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他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现在,又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了他新的生命,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下定决心把入党作为继续革命的起点,准备用自己的双手去修筑通向共产主义的大路,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党和毛主席时刻关怀着劳动人民的劳动和生活,随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马路工的劳动条件也在不断改善,机械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一九五八年,领导上决定要朱为山去学习汽车驾驶,以适应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朱为山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孜孜不息地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为革命刻苦钻研技术,很快就成为一个出色的驾驶员。每天,他驾驶着汽车奔驰在大路上,来回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感到面前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一天黄昏,已经下班了,朱为山和往常一样,仍在细心地洗刷车身,检查发动机,给汽车做保养工作。党支部书记老葛满面春风地跑来对他说:

“朱为山同志,休息一会吧。来,到我办公室里去坐坐,我要和你谈谈哩。”

朱为山盖上引擎盖,拿起把回丝,边擦手边跟着老葛来到办公室。老葛端过一把椅子说:“你坐下,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朱为山觉得老葛今天有点异样。平时,他和工人很随便,一点没有干部架子,有什么事同工人商量,总是开门见山,今

天怎么这样郑重其事。便笑着说：“有什么任务，你尽管说么，干吗这样郑重其事的。”

老葛还是不正面接触问题，问道：“你家里人都好么？”

朱为山感到老葛这个人越来越奇怪了，便忍不住推了把老葛，说：“老葛，你搞什么名堂！我家里的事情你不是一清二楚，个个身体健康，人人心情舒畅。”

老葛认真地说：“假如现在组织上要你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工作，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

朱为山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的召唤，这是起码的一条。老葛，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的。”

“这我知道。”老葛又把朱为山按下说，“我是说，如果现在组织决定要你到国外去工作，你有什么意见？”

朱为山听了一楞，可是立刻就笑着说：“老葛，你别跟我开玩笑。我这大老粗有多少分量，你还不知道？”

“朱为山同志，这是真的。现在国家要派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到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去支援也门人民修筑公路，组织上已决定派你去。”老葛严肃地说。

这一回，朱为山真的呆住了。半晌，他说不出一句话来。此刻，他能说些什么呢？一个马路小工，一个在旧社会连电车也不准乘的“红马甲”要出国了。这叫他怎么能够相信？可是支部书记那郑重的语气，严肃的神态，又使他不能不相信。最后，他心情焦急地说：“老葛，这，你，——我能干什么呢？！”

“为山同志，组织上决定你去，就相信你能担负起这项工作。”老葛也有点心情激动地说，“为山同志，一个马路小工出国，这在过去是不能设想的。但在今天，在今后，决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性质决定的，这是革命发展

的必然，是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这次你去支援也门人民的建设，决不只是个人的行动，而是代表着解放了的中国无产阶级，去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回家的路上，朱为山还在反复咀嚼着支部书记老葛的话，心潮起伏，象大海波涛。十五年前，他穿着褴褛的衣衫瑟缩在八工段大门前等点卯，工头的喝叱和抽打，牛马般的劳动以及种种欺压凌辱……。这些可诅咒的往事，一幕幕放电影似的在他脑海里浮现。现在，他这个马路小工要出国了，将要去到那他所无法想象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奇迹吗？然而，这样的奇迹在我们的国家里并不是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它将变成一种常见的现象，朱为山不过是许许多多中的一个罢了。

* * *

蔚蓝色的天空，飘浮着几片白云。大型客机象一只矫健的银鹰，穿过云层，披着灿烂的阳光，稳稳地继续飞行着。朱为山坐在舒适的机舱里，经过这段回忆，心情更开朗了，胸怀更宽广了。此时，他更加懂得：革命的道路对他来说还只刚刚开始，无产阶级为之终生奋斗、孜孜以求的不只是自己的翻身，而是全人类的解放。

雾海茫茫太阳开

——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老海员王友根的家史

一九七一年的初秋。

一个月色朦胧的深夜。

东太平洋的茫茫洋面上，忽然出现一团灯火。在那无边无涯、空旷寂寞的大洋中，远远看去，它宛如黎明之前高悬苍穹的一颗启明星，光华四射，闪闪耀眼。就近一看，啊，它原来是一座“海上城市”——一艘夜航的远洋巨轮！

船上所有的灯全被打开了，特别是前后两根大桅上的两盏水银大灯，把周围一公里左右的海面都照得通明雪亮。在船桥后侧，可以看到两个清晰的大字：东风。

船上的主机已经停了车，只有两台发电机还在嚙嚙欢唱。大烟囱里，还在均匀地喷吐着白色的烟圈。

船并未停下来。由于在大洋中无法下锚，所以它仍在随风漂流着。

怎么回事？是主机出了毛病，还是船上哪个部件坏了？

不，都不是的。现在，就让我们到机舱间去看看吧。

一跨进机舱间，一股热浪迎面扑来。轮机舱的老师傅们正在紧张地劳动着。主机的有些部分被拆卸开了，老师傅们手执行灯在仔细地检查着。一会，一个年过半百、身材魁梧的

老工人从主机的底层钻出来。他一脸油污，满身汗水，皮肤被烤得红通通的。他，就是这艘轮船上的轮机长王友根老师傅。这时，另外几个老师傅一齐走上去向他汇报：

“油路系统良好。”

“电路系统良好。”

“汽缸冷却系统良好。”

“……………”

王友根一面用回丝擦着手，一面兴奋地点着头。当大家汇报完毕，有一个青年工人过来问道：

“友根师傅，我们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港呀？”

友根师傅扬起头想了想说：“如果没有别的情况，我们明天中午可以到达维多利亚，下午就可以到加拿大温哥华了。”

青年人有些不解地说：“还会有什么别的情况？我们自己造的主机，连续航行十三昼夜没出一点问题。难道纸老虎还敢来捣乱？”

“这可不能麻痹。”王友根认真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我们还是在公海上航行，别人不来碰我们，我们决不放第一枪，如果他们要来捣乱，我们就给予坚决还击！”

这时，主机操纵台前的传令钟响了，值班轮机员迅速扳动闸把，机器“呜”的一声又“隆隆”欢唱起来。“东风”号又开始劈波斩浪地前进了。

“东风”号是我国工人阶级于一九六〇年自行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现在它代表祖国人民，第一次横渡太平洋来到北美洲。船在太平洋上整整连续航行了十三个昼夜，主机和其它辅机没有发生过任何毛病。还有一天的航程就要到达

目的港了，为了过细起见，王友根同船长、政委等商议后，还是停车作了一次详细检查。事实再一次证明，我国工人阶级自己制造的主机和其它辅助设备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但是，回到轮机长室，王友根还是不能入睡。现在，他连一丝睡意也没有。轮船正以每小时十八里的速度靠近北美大陆，这时，可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东风”号装载着的并不是普通的物资，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荣誉，整个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此刻，他必须仔细地考虑一下，还有哪些准备工作要去做，哪些部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一定要在进港之前作好安排。他拉开窗帘，打开舷窗，一股带着咸味的海风扑面而来。他深深吸了口气，极目向远处望去，见东方的海平面上已露出第一线曙光。再向下望去，只见海水蓝澄澄的清澈明亮。凭经验，他知道维多利亚已经引颈在望了。

这天下午，“东风”号终于到达日的港温哥华了。王友根从舷窗里向外望去，只见码头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彩旗飞舞。一些华侨儿童们，穿着中国的民族服装，唱着中国歌曲，跳着中国舞蹈在欢迎他们。码头的铁栅栏外，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汽车停了好几条街，交通也为之阻塞。

在船长的指挥下，“东风”号迅速、平稳、利落地平了码头。码头上的海关旗一落，早已久候的华侨同胞们一拥而上，他们一上船，就同每一个船员紧紧拥抱，有些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欢迎的人群潮水似的不断往船上涌来，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似乎船上的每样东西，每块钢板都使他们感到亲切、新奇。船上的几十位船员，应接不暇地忙着给大家介绍，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高大的机舱间，现在也显得十分拥挤了。人们对这里似乎特别感到兴趣。

“这主机是我们自己造的吗？”

“每一样零件都是自己的吗？”

“材料也全部是自己的吗？”

“……………”

王友根一刻不停地在给大家介绍情况和答复问题，忙得满头大汗，还是无法完全满足华侨同胞们的要求。他们不仅对机舱间的每一台机器都有兴趣，而且对新中国的海员生活，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项成就，甚至对王友根本人的身世经历，都要求详细了解。有不少人还要轮机员们和他们一起在主机操纵台前照相。

在温哥华停泊的一个星期里，他们日以继夜地接待着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这些参观者除了华侨，还有一些外国的友好人士。他们有的来自邻近的城市，有的来自遥远的加拿大东部，也有的来自毗邻的美国。以年龄看，从怀抱的幼儿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无一不情感激越，留恋忘返。因为，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万吨轮船，而是新中国的伟大变化。对于华侨同胞来说，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祖国，自己祖国的繁荣富强。不少华侨同胞，他们远离祖国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二十几年得不到祖国确实的消息，更无法回国探望，而只能把对祖国、家乡的怀念之情深深埋在心底深处。现在，亲人们一下子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下子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踏上祖国自己造的万吨巨轮的甲板，犹如踏上家乡的土地。过去连一枚钉子也要从外国进口的中国，现在造出了万吨巨轮，横跨半个

地球来到他们面前，这怎能叫人不激动呢？这种激情，难道是语言所能表达的么？

最叫王友根难忘的是船靠泊的第一天晚上。一个八十多岁的华侨老人，披着一头银发，拄着一根发亮的手杖，在两个青年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爬上舷梯，当他第一步踏上甲板，既不同任何一个船员打招呼，也不向谁提什么问题，却一把抱住门框，用他那满是皱纹的老脸紧紧地贴着钢板，竟象个小孩子似的哭了。王友根忙上前扶住他说：“老伯伯，别太激动，先到休息室里去坐一会吧。”

老人看来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顾不得理会王友根，哭了一会，才转过身来对王友根说：“我哪能不激动呀，过去我象个没娘的孤儿，任人欺侮蹂躏；今天我见到了亲娘，孤儿扬眉吐气翻了身……”

听到这里，王友根也忍不住地双眼湿润了。

此后，这位老人天天拄着手杖到船上来，既不愿进休息室，也不愿进大餐厅，却端端地坐在船头上，好象在对别人说：看，我就是这里的主人！

后来，王友根了解到，这位老人年轻时也在外国船上当过海员，曾经历尽艰险，受尽欺凌，最后漂泊到北美洲。由于年老体衰，只好潦倒异国，靠到处给人打杂为生……。

每天深夜，当忙完一天的接待工作回到房间里，王友根的脑海里总会重现出这位华侨老人的脸容，耳朵里似乎又响起这位老人的声音。是的，王友根是太了解这位老人的心情了。虽然他们素不相识，但老人过去的经历，不也正是他所经历过的吗？然而，今天王友根却作为新中国的一位轮机长，驾着祖国自己制造的远洋巨轮，从太平洋的西海岸来到东海岸，到处

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尊敬的目光。这个变化，这个情景，怎能使他不激动呢？

想到这里，王友根再也躺不住了。他点燃了支香烟，轻轻拉开房门，慢步踱到后甲板上。

外面，月挂中天，夜风爽人。白天闹哄哄的码头，这时显得格外安静。银白色的月光洒落在水面上，映出粼粼波光。退潮了，海水在无声地向远处退去，王友根的思潮也随着海水向那遥远的年代流去……。

—

浙东沿海，岛屿星布。在玉盘洋口的舟山群岛中，有一个叫金塘的小岛，这就是王友根的家乡。这些岛上石多土少，解放前，这里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他们不是给渔霸下海捕鱼，就是远离家乡去为人撑船。友根一家就是个地无半分屋无一间的赤贫户。鱼汛里，阿爸斗风搏浪地去给渔霸捕鱼，鱼汛后，就只好到处给人打短工。生活的重担压得他直不起腰，年轻轻的就得了黄疸病，不到三十岁，就抛下一家大小与世长辞了。在阿爸生前，友根一家四口，除了阿爸阿妈，友根上面还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姊姊，由于吃不饱，在阿爸去世前一年就饿死了。阿爸死那年，友根才四岁，阿妈肚子里还怀着个即将出世的妹妹。

阿爸丧事刚料理完，阿妈又要分娩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当时，还是五十多岁的外婆来照料，让阿妈生下了妹妹。满月不到十天，妹妹就被送进了育婴堂。一家五口人只剩下了友根和阿妈两个人，可是，体单力弱的阿妈既不能下海捕鱼，

也不能上船航海，日子还是没法过啊！最后，阿妈只得咬咬牙把友根这棵独苗苗交托给外婆，自己到镇海去给人当奶妈。

外婆家也是个吃了早顿无夜顿的赤贫户，外公早死了，两个舅舅都在外面自谋生路，大的在上海黄浦江上摇舢舨度日，小的在外面给地主当长工。孤苦无依的老外婆还算有一副硬朗的身板骨，靠着给人家缝补浆洗度着苦日子。遇有大户人家婚丧喜事，她就去帮人家烧烧火、打打杂，混个一顿半餐；有时也给人家磨磨山芋粉，换回一两斤山芋干填填肚子。她本来光身一人，倒也落得干净；一人吃饱全家饱，一人不饱全家饥。现在得拖上个小外孙，虽说一老一小也有了个伴，可是要养活一张小嘴巴也不容易啊。不论到哪里给人帮忙做工，她总得把他带上。人家常嫌她多带了张嘴，就不大愿意来叫她帮忙了。于是，她只好给人家陪笑脸说好话。这些都给小友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觉得有钱人都是冷酷无情的。

那时，阿妈给人做奶妈，每月仅得三四元工资，全数给外婆贴补上，才使他们这一老一小得以勉强地度过那艰难的岁月。

到友根十二岁那年，老外婆已六十多岁了。她常抚摸着友根的小脑袋感叹着说：“孩子，象你这样的年纪，在有钱人家正是上学的时候呢，可我们穷人家连饭也吃不起，哪来钱给你上学呀？外婆的日子是不多了，可你还是棵刚冒头的小苗苗哩，总得给你找条生路，外婆才能闭眼哪！”

友根自小就是个倔强的孩子，听着外婆的话，眼眶不禁也湿润了。他觉得外婆是个挺善良的好人，可是老天爷为什么要让她这么苦呢？他知道外婆是多么离不开他，他同样也舍不得离开外婆，但外婆完全是为他着想呀。不过，他心里茫茫

然，他的生路究竟在哪里呢？人来到这世界上为什么就没有生路呢？

这时，阿妈早已离开镇海到了上海，在上海自来水公司一个姓张的高级职员家里做佣人。不久，阿妈来了封信，说是在上海南市一家新华机器厂为他找到了个学徒的位置。因为姓张的东家在这个厂里有股份，是阿妈说了许多人情才争取来的。

老外婆真是悲喜交加。用阿妈辛辛苦苦积下的两个月的工资给友根买了张船票，并为他准备了个小行李卷，就把友根送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谁知友根一到上海，却当头被浇了盆冷水。厂里的老板一见友根，连连摇着头说：“太小，太小，这样小的人能做什么呀？还得给他白吃两年饭食才能派用场呢。”

阿妈含着眼泪给老板求情，告诉他穷人从乡下来一次上海不容易，甚至提出可以多学两年。可是有钱人的心都是铁做的，尽管阿妈说破嘴皮，老板就是不肯收。最后，阿妈只好东奔西走地借了两个月的工资，又把友根送回乡下去。直到友根十四岁才又进了厂。

从此，友根总算有了条生路了。阿妈再三叮嘱友根：“一定要咬紧牙关熬下这几年，不然以后就再没生路啦！”

是啊，穷人要找条生路是多么不容易，可是友根要熬完这几年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新华机器厂一共只四十几个职工，其中有三十几个是学徒，只有四五个老师傅。其余就是领班、账房和跑街。

按老规矩，最小的学徒一进门照例是打杂，一直要打到下面再有新的学徒来。所以，师兄们都叫小学徒为“替身”（即替

死鬼的意思)。友根进厂的第一天,师兄就把他领到一只大煤炉前,说:“这只炉子以后就归你管了。”

友根定睛一看,炉子旁边还有一只大风箱,足足齐到他的胸口,两只黑洞洞的风眼就象一对怪兽的大眼睛,直瞪着友根,似乎在对他说:“伙计,你侍候得了我吗?”

据师兄介绍,全厂几十人的吃饭、用水和生产上的锻打及一般热处理,都要靠这只炉子。所以从早到晚一刻也不能停。他的任务是:早上五点以前要把炉子生好,六点之前把几十人的早饭和洗脸水烧好,七点钟开工之前洗清全部锅碗,接着老师傅们来炉子上锻打、加热、淬火、退火……,而他就得一刻不停地拉动那只大风箱。

那只齐胸高的大风箱拉起来足足有二三十斤重,他得站着身子,运足全身力气,一仰一合地把整个身体扑上去才拉得动。开始,他还没拉到三五十下,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汗如雨下。可是铁件在炉子里加热时是不准风箱停下来的,必须等老师傅把铁件取出处理时,他才能换口气。有几次,他直拉得头晕目眩,两眼金星直冒,差一点扑倒在大风箱上。老师傅见他实在吃不消了,就接过来帮他拉一阵。不过,这得领班不在旁边,如果给领班看见,不仅小学徒要遭打骂,老师傅也要挨训斥。

深夜,老师傅和老师兄们都收完工去休息了,友根和两位最小的师兄一起还要揩清车床,扫清地下的铁屑和倒完垃圾。等干完这一切躺到铺上,人疲乏得连蚊虫叮在眼皮上也无力把它赶跑了,可是过度的疲劳却使人一下子无法安然入睡,全身筋骨酸痛得无处可放,合起眼来人还在一仰一合地拉风箱。

据老师兄们说,友根上面有个师兄,就是这样活活累死

的。他比友根大一岁，进厂不到一年，就患了肺癆，后来又变成全身浮肿，常常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不久，他就一头扑倒在那只大风箱旁默默地死去了。

友根并没有见到过那位师兄，可是说也奇怪，他的脑海里不知为什么经常会出现那位师兄的悲惨形象。他时常想：难道这也是我的结局吗？

一天十几小时的沉重劳动，稍有疏忽，还要遭受领班工头的毒打。有一天，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资本家借口客户要货急，指使那个姓汪的领班来逼着工人连夜干下去，并要友根帮一位老师傅摇龙门钹。友根拉了一天的风箱，吃饭时连一双筷子都拿不稳，这时又饿着肚子，哪里摇得动那样重的龙门钹？动作稍一迟缓，那姓汪的领班对着他就是一巴掌。打得他两眼金星直冒，差一点跌倒下去。友根心里不服，回头瞪了汪领班一眼，这家伙就说他不服分派，不问情由地对友根一阵拳打脚踢，甚至还抓起一把大扳手向友根砸去，幸亏旁边老师傅们拉住，友根才未遭毒手。

事后，老师傅告诉友根，汪领班打他，实际上是“杀鸡给猴子看”，是为了压服大家。这是汪领班一贯的手段。还有些老师兄告诉他：在他进厂之前，就有好几个师兄被这家伙打跑了。他们宁可在马路上当流浪儿，在桥头上推黄包车，也不愿回到这里受这份罪。

阿妈满怀希望为友根找到的这条“生路”竟也是这样的坎坷艰难呀！每当友根干完一天的沉重劳动，筋疲力竭地躺到铺上，心里常常这样问自己：“我能挨到满师这一天吗？这条‘生路’能走得出头吗？”

但是，路不平，有人踩。不久，在这些学徒中就爆发了一

场小小的反抗斗争。

这天，姓汪的家伙照例因为强迫大家连做大夜班而打了一个学徒。第二天，三十几个学徒和几位老师傅们商量好，一齐不开工。

洗脸水和早饭都准备好了，可是三十几个学徒谁也不起身。

快七点了，汪领班跑来狼嚎般地叫起来：“你们这些猪猡，都快到开工辰光了，还不起来，你们是不准备开工还是怎么的？！”

大家装做不听见，没一个人理睬他。他大发雷霆地爬上学徒们睡的小阁楼，又踢又骂。可是还是没一个人理睬他。

最后，他没办法了，只得气急败坏地把老板叫了来。

这还是新华机器厂开厂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老板怕事情闹僵，便先来软的一手。

“为什么还不起床？我知道你们昨天做得晚了，今天就算八点钟开工吧，可现在都快到七点了，也该起床啦？”

谁也不给他赏脸。还是没人动弹。

老板失了面子，心里有点耐不住了：“你们要存心罢工吗？那总有个原因罗？那就派个代表出来谈谈么！”

谁不知道这是“钓鱼”？还是没人理他。

老板终于恼羞成怒了，他虚张声势地咆哮着说：“好，你们要存心和我捣乱，今天新华厂就停工。但我要告诉你们，新华厂不会关门！我们可以法律解决，可别怪我手条子辣！”

这时，几个老师傅见时机成熟了，便走过来说：“老板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么，我看他们也没什么别的要求，主要觉得汪领班打人太厉害，大家都有点寒心。”

当着汪领班的面，老板觉得不能不摆点威势。同时汪领班是为他们资本家卖力的，也不能不给奴才一点面子。便叫道：“这是岂有此理！打几个学徒就这样了，那还了得吗？！不服贴的统统给我滚蛋，几十个学徒难不倒我！”

老板原来只想显显威，不料三十几个学徒真的一齐卷铺盖了，并一齐伸手向他要回乡的盘费。

老板知道事情是闹僵了，可一时又找不到个头。最后，只好把几个老师傅叫到一边，要求他们出面调解。老师傅们按着事先商定的口径，提出必须除掉汪领班，否则他们无法说服学徒们。

当然，在旧社会资本家要找几十个学徒是不费劲的，但这些学徒大部分都已顶得上老师傅的技术，而且又不必给工资。资本家自然是不肯为了保全一条走狗而作出这样大的牺牲的。汪领班自然也懂得主子的心思，便趁势下台阶地提出了“辞职”的要求。当然，资本家也并不会真的踢开一条忠实于他们的走狗，后来又为他在别的厂里安排了位置。但不管怎么说，学徒们这次初试锋芒的斗争总算胜利了。这场胜利不仅大长了工人志气，大灭了资本家及其走狗们的威风，而且也深刻地教育了工人自己。从此，友根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穷人的生路是应该这样去走的。

友根的学徒期限是四年。四年在人的一生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对于友根来说，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这四年，他熬过了多少深夜！忍受了多少苦难！遭到了多少打骂！甚至就在快要满师这一年，还差一点送掉了小性命！

一九三二年一月，在长期的疲劳和饥饿的摧残下，友根生了一场重病。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规模入侵中国，

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前夜。整个上海，到处是一片人心惶惶。友根心里惦记着在给人帮佣的阿妈。一天，工厂停工了，他便不顾一切地拖着有病的身子去阿妈的东家处探望阿妈。谁知，阿妈已被东家带着搬到租界里去了。友根拖着沉重的步子，心绪惘然地回到了厂里，可是厂里已空无一人。他想爬上小阁楼去躺下，可是没迈到扶梯脚下，就人事不知地倒下了。

外面炮声隆隆，枪弹飞鸣，敌机发着怪叫在低空盘旋，不时投下死亡的炸弹，震得屋摇地动。这一切，友根全都不知道了。在昏迷中，他还是惦念着不知去向的阿妈。他知道阿妈也在惦念着他，可能正在为不能见到自己唯一的亲骨肉而悲伤地哭泣呢！但东家平时是不准她出来的，更不用说在这战火纷飞、东家正要使唤人的时候了。难道他就这样再也见不到阿妈的面了吗？不，不能啊！他一定要见一见阿妈的面。他想挣扎起来，再去找阿妈。可是头刚一抬起，又昏迷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隐隐听到有个声音在呼唤他。声音是那样遥远，好象在高山上传下来的。他肯定是阿妈，甚至还看到阿妈那憔悴的脸上挂满泪珠。他拚命伸出双手，一头向阿妈怀里扑去，接着，他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友根，友根，是我啊！”

当他再次醒来时，见一位师兄一手托着他的头，一手拿着只杯子，正往他嘴里灌水。师兄泪水满面地告诉他：两天前，账房和领班们就逃得不知去向了。这天，几个师兄弟在炸弹轰隆中找了他半天没找着，只好离开了工厂。现在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马路上找不到一辆黄包车，一个人又背不动他。最后，师兄给他留下一块锅巴和一盆水，要他饿了就啃一点，渴了就喝一口。师兄决定去找友根那位在黄浦江上摇舢舨的

舅舅。

过了两天，舅舅找来了。他含着眼泪把友根背到自己那条小舢舨上，摇到闵行镇寄托在一个朋友家里，又去租界上找友根阿妈。

一个多星期后，阿妈终于找到了。但阿妈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管束，她除了抱着儿子痛哭一场，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往哪儿安置这唯一的亲骨肉。所幸的是友根这时的病情已渐渐好转，开始能坐起来喝点粥汤了。最后，阿妈和舅舅商量后，只好借了几元钱路费，托人把友根带到乡下老外婆处。……

二

友根总算平安地度过了这场灾难，并且于这年年底满师了。

可是，熬过四年的学徒生活不容易，满师也不容易。老板提出要友根办两桌满师酒。两桌酒席的代价，等于阿妈两年的辛苦劳动。友根如何办得起？不办满师酒，老板就不给开工资，在同行业中也休想找到工作。最后，友根只好再给老板白干半年。半年以后，老板仍然不肯开全工资，每天只给友根五角钱。友根觉得，要摆脱这种永远当学徒的命运，只有离开这里。十九岁这年，他愤然离开了新华机器厂。

从此，十九岁的王友根就象一只没有帆舵的小舢舨，赤手空拳地在茫茫的生活海洋中到处漂泊和流浪。他做过造船厂的临时小工，当过轧米厂的机匠。为了混过自己一张嘴，他什么都干。可是失业和饥饿总是象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上海混不下去，他就回到贫穷的故乡；故乡也活不下去，又只得来到

上海。年迈的老外婆看着这个长得又高又大的友根，成年这样没根没蒂地漂来泊去，也没个人关心照应，心里真是又疼又急。王友根二十岁这年，在老外婆的作主下，他和一个穷海员的女儿成了亲。

老外婆满心希望友根有了个家以后，生活会安定些，谁知他肩头的生活担子却更沉重了。新婚后两个月，友根不得不带着妻子再次来到上海谋生。虽然他又在江南造船厂做上了临时工，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子还是混不下去。第二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广大腹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上海不少地方在战火中变成一片废墟。一些华商厂店或倒闭解散，或毁于炮火。只有租界上的一些洋商洋行，还能继续维持。就在这时，友根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这个三口的小家庭，象暴风雨中的一条小船，在战火、失业和饥饿中挣扎着。后来还是在几个穷朋友大力帮助下，他托了许多人情，总算在英商太古公司的一条长江船上找到了个生火工的工作。从此，王友根就开始了那种长年漂流无着的旧社会的海员生活。

在旧中国，帝国主义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司”、“洋行”，对我国进行无孔不入的经济掠夺。太古公司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个。在这个公司所属的船上，从船长到大副、二副、三副及轮机舱的老轨（轮机长）、二轨（大管轮）等主要职务，都由洋人担任。在这些船上，中国船员被视为奴隶一般随意使唤，新上船的船员，还要以自己微薄的工资供这些洋人头脑抽烟喝酒。否则，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你岔子，动辄训斥辱骂，罚工资停生意。刚上船的王友根，就因为不懂这些“规矩”，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接连被调换了两条船。

一九四〇年春，王友根被调到一艘叫“四川”号的海轮上，开航海防、新加坡和泰国等海外港口。当时，希特勒在侵占波兰以后，正积极准备向西线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腹地的侵略步步深入，并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整个亚洲大陆，西太平洋沿岸海域，基本上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使一般商船的航行受到很大威胁。船出海后何时才能回来，那是没有定准的。这是王友根第一次跑外海，因此他不得不对家里作一番安排。他东奔西走地忙了几天，勉强给家里借了点生活费。使友根不放心的是，第一个孩子还未满周岁，妻子又太年轻，阿妈在前年“八·一三”打仗时已回乡下，上海全无一个亲戚照应。今后如果他一年半载不能回来，叫这年轻的母亲和幼儿怎么过活呢？他实在无法再往下深思。穷人过日子，只能泥萝卜搯一段吃一段啊！最后，他抱过儿子亲了亲，只好忍着辛酸的眼泪告别了他们。

来到“四川”号上，王友根发觉全船上下没有一个熟人，别的中国海员之间也很少有相互熟悉的。原来，这正是外国资本家的阴谋。他们由于害怕中国海员互相团结起来同他们斗争，因此经常在中国海员中实行大换班。这次“四川”号出航，从水手长和生火长以下，就全部换了新人。当时，这条轮船上的三轨因公休缺勤，外国人知道王友根是个技术上很出色的钳工，就指定他代管锅炉的工作。

王友根一下机舱间，英国人二轨极司裘就叫他做装填料的铁皮罐。他用英语叽哩呱啦地讲了一阵，王友根也听不懂，极司裘轻蔑地摇了摇头，十分不耐烦地拿过一块白铁皮卷了个圆筒，敲好搭扣，又用焊锡把它焊起来。算是给王友根做了个样子，并要王友根照样做两只给他看看。

王友根看他做完，心里觉得好笑，这个生着一头黄毛，有着一对绿眼珠、年龄不过二十出头的毛孩子，自己技术上一窍不通，却要摆出一副大管轮的架子来教训别人。于是就立即剪了块白铁皮，卷成圆筒，三下两下就把搭扣敲好了。他一连做了三只，还没有极司裘做一只的时间长。

极司裘拿起王友根做好的一只铁罐看了看，又往地下一丢说：“为啥不焊锡？”

“根本用不着焊锡的。”王友根回答说，“因为你敲得太重，把搭扣边敲瘪了，扣不牢，所以要焊锡，以后还会脱开来的。”

极司裘又拿起王友根敲的另一只，翻来复去地看了又看，觉得实在无懈可击，只得重重往地下一丢，叽哩咕噜地红着脸走开了。

谁知，王友根却从此得罪了洋人头脑，招来了无数非难和辱骂。

王友根虽然是个很有经验的钳工，但管理锅炉还是头一回，因此不免有不熟悉的地方。由于他能虚心向别的老师傅请教，一般情况下还能对付过去。可是在轮船开出后的第二天，王友根接早晨八到十二点的班头。刚刚接好班，就发现锅炉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他急忙到处检查，一时查不出什么原因。声音却越来越大，不一会，机舱间就出现了雾腾腾的蒸汽。王友根和其他几位老师傅正忙得满头大汗，极司裘就怒气冲冲地冲下机舱间对着王友根气势汹汹地问：“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声音？！”

王友根说：“不知道，我正在查呢。”

极司裘走过去一看，发现一只蒸汽吹灰废水阀打开着，于是又对着王友根大发雷霆起来：“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

么的？混蛋！”

王友根哪里受得住这种辱骂，便也回他道：“你神气个屁，我刚刚接班，还没来得及摸清情况呢。”

极司裘对中国语半通不通，听出王友根也在和他对骂，更加怒不可遏地辱骂起来：“你这蠢驴！如果干不了就给我滚！”骂完，他就气冲冲地走掉了。

有几个老师傅对友根说：“你上船没给他喝过白兰地吧？以后他有得找你岔子呢。”

友根气愤地说：“我还给他喝白兰地，总有一天我让他去喝海水！”

就这样，极司裘在一个航次里找了他好几次岔子。友根也知道，只要自己每个月给他喝两瓶白兰地，对他表示一下尊敬，以后就可以太平无事。但一来他是个宁折不屈的人，二来出海时为了安排老婆孩子的生活费，已经借了些债，哪来许多钱买酒给他喝？极司裘见友根总不买他的账，就更加想方设法地挑剔他。

有一次，友根值零到四点的班头，下面正好是极司裘接班。可是他一直干到四点半，还不见极司裘来接班，而八点钟自己又得来接班，再要延长下去，根本就无法休息了。友根只得到极司裘房间里去叫了。

他来到二轨室，一推开房门，一股又酸又臭的酒气直冲脑门。友根扭亮电灯一看，极司裘醉得象头死猪似的，头低脚高地躺在铺上，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几只空酒瓶、空罐头和几本黄色画报。看着这些秽物，闻着这股臭气，他只感到一阵难忍的恶心。他叫了几声，那家伙却毫无反应。友根用力推了他两下，大声告诉他接班时间早过了。极司裘才懵懵懂懂地

睁开眼睛，嘴里却连连叫着：“滚！滚！……”他翻了个身，又死猪似的睡着了。

王友根感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对他说：“现在是你的班头，我可不管了。”说完，就急急忙忙离开了这臭气熏天的地方，回到自己舱房里睡觉去了。

当王友根刚要迷迷糊糊睡着时，极司裘却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又叫又骂地责问王友根为什么不把他叫起来接班。王友根心想：“你这小子明明是蛮不讲理存心欺侮人！”便也忍不住地同他对骂起来。那家伙握着拳头要对友根动武，友根也针锋相对地握紧拳头准备和他干，幸亏同房间的两位老师傅来拉开，两人才没打起来。

这次事件王友根明明是没有过错的，可是当船返航回到上海时，公司却把王友根叫去训斥了一顿。说他辱骂二轨，严重失职。不容分说地记了他一次过，还扣了他半个月的工资，又把他从“四川”轮调到另一艘“海宁”轮上。

王友根怀着愤慨的心情走出太古公司办公大楼，闷闷地向家里走去。

离家已经半年多了。出去时柳树才吐芽，现在已是秋风萧瑟的深秋。马路两旁的梧桐枯叶雕零地在秋风中摇曳，落叶在马路上满地乱滚，更给人增添了凄凉的感觉。出门时，友根为家里勉强地准备了两三个月的生活费，现在已半年多过去了，这母子俩究竟生活得怎样了呢？虽说女人还可以帮人缝缝洗洗，但还拖着个未断奶的孩子，这副担子对她来说也是不容易挑的。想到孩子，他心里的阴云似乎驱散了些，天空似乎也明朗些了。那小子生得大头大脑，哭起来声音嗷嗷响，和老子完全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长大了一定也是条

彪形大汉，就是总不肯认自己的亲老子。每当友根抱着他时，他总是又哭又叫，又抓又踢，好象同老子根本不认识似的。这就是他这个当海员的老子的命运。由于长年在海上漂泊，难得才回次家，结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认他了。想到这里，他不觉暗自苦笑起来。现在这小子大概都会走路了吧？当走过一家玩具商店时，他便花了几角钱买了只有花纹的小皮球，也算父子离别半年多后的见面礼吧。

友根一路走着想着，不觉已经来到家门口。他轻轻推开门，只觉得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妻子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边上，完全没有发觉他的出现。王友根感到有点异样，预感到有场什么灾难已经降落到自己头上，心也一下子收缩起来。但他还是鼓足勇气强打起精神叫了她一声：“银兰，我回来啦。”

她似乎突然吃了一惊，猛地站起身来，用一对无神的眼睛直楞楞地看着他。这种眼神，只有从一个精神上受了极度打击的人眼睛里才能见到。

“孩子呢？”王友根问。

女人一听这句话，突然哇的一声扑倒在床上，全身颤抖地哭泣起来。床头边一叠孩子用的衣被尿布，散乱地倒在她的头旁。

友根看着这情景，心里一切都明白了。犹如炸雷击顶，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的神经似乎完全麻木了。一只小花皮球从他的手里落到地上，在屋角里滴溜溜地滚动着……。

三

友根离家半年多，第一个孩子就这样夭亡了。那是在他

回家前一个多月，孩子天天高烧不退。友根女人急得日夜流泪，可是却拿不出一分钱给孩子看病。那时，友根离家时留下的两个月生活费早已用光了，银兰只好给人洗衣服做零活，勉强勉强地才能混过一大一小两张嘴，哪来余钱给孩子求医买药呀。后来，还是左右邻居的帮助，才给孩子到医院里挂了个号。医生一检查，说是早期脑膜炎，要先付十两黄金的住院费，才能为他抢救。但能否治好还不能保证。友根女人只好把孩子抱回家，日夜盼望丈夫能及时回来，也许可以想点办法。可是左等右等，丈夫总也不回来，孩子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最后终于在一个深更半夜死去了。

孩子死后，银兰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再加上丈夫离家半年毫无音讯。她常常呆呆地坐在屋子里吃不下，睡不好。年轻轻的妻子，就变得呆头木脑、多病多灾了。回家以后，友根精神上虽然也很悲痛，但他身强力壮，心境开阔，总是耐心地去开导银兰，设法给她作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和治疗。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友根被调在一艘长江轮船上工作，所以能经常回家照顾妻子。但银兰的身体和精神刚刚恢复过来，公司突然又来了通知，要他们的船立即开往新加坡。

一九四〇年，德国法西斯在美英法等国家的纵容退让面前，在欧洲战场上侵占了一些国家。这年六月，法国投降后，英伦三岛就直接受到了法西斯德国的围攻。欧洲大战形势的这种发展，大大地鼓舞着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〇年九月，日军开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并紧张地准备着规模更为广泛的太平洋战争。在这种形势下，英国统治阶级慌了手足，他们急急忙忙命令把所有船只全部集中起来，准备投入战争物资的运输。当然，这些情况对中国海员是严守秘密的。

王友根当时工作的那条船叫“万源”号，载重量只五六百吨。这种船吨位小，吃水浅，一般是不能航外海的。但是英国资本家完全不顾中国海员的生命安全，一面强令开航，规定不去的一律作自动离职论处，不发给任何遣散费；另一方面用欺骗手段，说半年就可以回来，去的人每月可发给几个月的安家费。但这些都骗不了有经验的老海员，不少人都宁可自动离职，也不愿拿自己的生命去冒这种险。

王友根觉得左右都没有出路。不去，不仅自己又要失业挨饿，家里还有妻子，第二个孩子出生才二个多月，乡下还有年老体衰的阿妈；去吧，在这战争乌云密布的年代，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他觉得穷人横竖都没有生路，那种失业流浪，到处告借的日子也实在受够了。饿死还不如拚死！他一咬牙，决定去。

一九四一年春，王友根和他们的“万源”号转道香港等地，到达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又抛了半年多的锚，英国陆军当局就宣布他们的船为征用船舶，命令他们横渡印度洋去装运军火。

叫一艘五六百吨的浅水船去横渡印度洋，这等于叫他们去喂鲨鱼。可是英国人根本不理中国海员的意见，声称这是军令，谁如违背就要以军法处置。

没有办法，海员们只得想出了个绝望的办法，用厚木板把所有的门窗夹起来（只留一个通向上层甲板的门），用螺丝拧紧，以防船在大幅度倾侧时沉没。

由于机器设备的陈旧，船的航行速度非常缓慢。启碇后一个多星期，才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了热带风暴频起的印度洋。

在风急浪高的印度洋中，五六百吨的“万源”号简直象一只小小的玩具，在一排排的浪山中抛上滚下。有时它的倾侧竟达四十度左右，救生甲板上的救生舢舨都快碰到海面了，另一个浪涛又把它打过来，才使它没有兜底翻转。有时它简直不是在倾侧颠簸，而是象只皮球似的在浪涛中翻滚。只是由于所有的门窗都密封着，海水无法一下子灌进去，它才没有沉入海底。

在船舱里，除了固定的东西，一切都在不断地移动着自己的位置，发出乒乒乓乓的撞击声。在所有的舱房里，早已找不到一件完好的玻璃器皿。一些饱经风浪的老海员也开始晕船呕吐起来。那些平时神气活现的外国头脑们，更是连身子也直不起来了。就这样，船在孟加拉湾外面转了好几天，才仅仅前进了几十哩。不久，两只救生舢舨全被海浪卷走了。接着，舵机又出了毛病。那些外国头脑一听这消息，连忙把全身涂满柴油（防止跳海后受鲨鱼的攻击），一人抢住一个救生圈，以便在船倾覆前跳海逃命。那位英国船长也吓得面无人色，连忙下令返航。

经过机舱间老师傅们一场紧张的抢修，舵机总算勉强修复了。一个多月后，“万源”号又返回到了新加坡。

船到新加坡一靠码头，那些外国头脑们一个个象兔子似的溜上岸去吃喝玩乐了。可是，王友根和一些中国海员们连休息时间也捞不到，又投入了紧张的修理工作。

不久，王友根和一批中国海员又被调到另一艘海轮上。英国人还是要他们冒险去运军火。但是军火还没装完，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袭击珍珠港的

次日清晨，空袭了新加坡，并同时以陆军通过泰国攻入马来亚，从海陆两方面围攻新加坡。

当时，王友根和一批中国海员都睡在一条装运军火的兵船上。清晨天刚拂晓，王友根在睡梦中被一阵难听的“嗡嗡”声惊醒。他刚从铺上坐起，还没来得及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近处突然响起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日本飞机，——轰炸！”

王友根听得几个中国海员的惊呼声，脑子里明白过来。一个可怕的思想立即在他脑海里跳出来：自己这条船和周围一些船上，都装着军火弹药，一旦中弹，立即会引起巨大的爆炸！因此必须立刻离船上岸！他匆忙拎起一只手提箱，外衣也没来得及穿，就冲出舱房，边走边大声喊叫着：“赶快下船，赶快下船！”

他迅速地走下舷梯，冒着雨点般的弹片向码头外奔去。

“哒哒哒，……，——轰！”

头顶上，几十架飞机在轮番俯冲投弹，并向船上跑下来的人群进行疯狂的扫射。码头上已有几处建筑物中弹起火，空气里充满呛人的火药味和焦臭味。有几个人倒在地上，血从伤口里流出来，染红了身下的水泥地。有几个人倒下了又挣扎着爬起来再跑，跑了几步又倒了下去……

王友根总算幸运地从弹雨中一口气奔出了码头。当他刚跨出码头大门，想站在墙角下换口气，突然从后面传来一阵震天动地的爆炸声，爆炸声不断地持续了好几分钟，震得他脑袋“嗡嗡”直响。他回头一看，自己那条船正在浓烟中不断闪耀着爆炸的火光，浓烟遮蔽了半边天。

王友根总算从死亡中逃出来了。可是他到哪里去呢？他

想了片刻，决定到太古公司办事处去找英国老轨（轮机长）依文斯。因为王友根还有一个月工资在他那儿呢。今后他得吃饭呀。来到公司办公室一看，里面早已空无一人。据一个看门的中国工人说，依文斯在昨天夜里就和公司的其他英国人一道坐上船跑掉了。

王友根愤恨地想：“原来，你们昨天就知道情况有变了，可是同我们中国海员招呼也不打一个，还让我们住在船上送死啊！”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开始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国殖民当局向日军投降时止，新加坡几乎每天都受到日机的空袭。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新加坡的工商业几乎全部瘫痪了，人们天天都躲在防空壕里过日子。

王友根自那天从船上逃下来后，把箱子寄在一位侨居新加坡的姓杨的上海朋友家里，白天整日踟躅街头，晚上就栖宿在防空壕里。因为找不到工作，身上剩下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完了。不久，人又生了病，整天躺在阴暗潮湿的防空壕里发着高烧。友根本是个九级风浪打不倒、千斤重量压不垮的结实汉子，可是经不住接连几天的高烧，加上饥寒交迫，甚至连一口水也喝不上，人很快就垮了下来。他一个人迷迷糊糊地躺在防空壕里，不禁想起一九三二年那次重病的折磨，要不是那位师兄找到了他，恐怕早已死于饥饿和疾病中了。可是现在身陷异国孤岛，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恐怕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亲人了。死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怕。虽然他还只有二十五岁，却闯过了多少死亡的关口。他觉得自己所以活到现在，完全是由于偶然的侥幸。使他感到遗憾的是妻子还那样年轻，却要跟着自己受这样的精神折磨。第一个孩子的夭折

就使她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现在丈夫又将死于异国客乡，而且也没一个人给她报个信息，她会成年累月地一直盼望、等待着他。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痛苦啊！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他决定要挣扎着走出去，冲出这黑暗的地狱。这样，他可以请一位过路的华侨帮个忙，在战事平静后，给妻子捎个信去，让她去自奔前程。他实在对不起她……

可是他刚刚试图翻身爬起来，一阵天旋地转的昏晕，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有个在琴行工作的华侨在躲避空袭时发现了她，并把他带到了家里。这位华侨原来也是从上海来的，他对王友根的遭遇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在他的帮助照料下，王友根又一次闯过了死亡关。

一个关口闯过了，另一个死亡关又横在他的面前。

在日本帝国主义进犯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战争中，英国陆军往往一触即溃。只是由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族人民和华侨的英勇抗击，才给日本侵略军以有力的阻截，使新加坡得以坚持了两个多月。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马来亚人民和华侨恨之入骨。在他们占领了新加坡以后，立即对华侨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们先把华侨统统关进集中营，然后就对华侨的住宅和商店进行洗劫，最后对华侨逐个进行“检查”，只要他们认为这个人有点可疑，就当场实行枪杀。当时，王友根也和许多华侨一起被关进了爪哇街集中营，一连三四天不给一口东西吃。不少人没等到进行所谓“检查”，就饿死了。到了第五天，检查开始了。日本人先把人集中到一个大广场上排成队，四面架起十几挺机枪，然后就逐个进行盘诘。每轮到一个人

人，日本人先叫他来回地走路给他们看，然后又是跑步，最后就检查手掌、脚板。检查完的人分左右两队，右面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左面是他们找不出什么疑点的人。但是当时大家是不知道的，只是忐忑不安地在心里猜测着。

由于王友根排在前面几排，检查很快就轮到了他。日本人见他长得身材高大，体质结实，先就对他有了几分怀疑。在看过他的走路和手脚后，便特别详细地对他进行了盘诘：

“你干什么的？”日本人问。

“我是太古公司的船员。”王友根态度自若地回答。

“哪条船？”

“‘万源’号。”

日本人知道“万源”号是条长江轮，便瞪着眼珠怪叫起来：“你的大大的不老实！”

王友根摸不透他是什么意思，也不去理他。日本人把他猛力往右队一推，说了声“去！”王友根就只得到右边队伍里去站着。

这时，旁边一个翻译对日本人叽咕了一通，日本人点了点头，又把王友根从右队里叫出来，并通过翻译重新对他盘问：何时、从何地来新加坡？在船上干什么工作。船长叫什么名字，老轨叫什么名字，新加坡还有什么亲戚朋友。王友根都一一对答如流。最后，日本人又把他往左边队伍里一推，说了声“去！”王友根又只得到左队里站着。

检查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结束。日本人押着右边一队向海边方向走去，王友根则跟着左队通过一座大桥向市区走去。当王友根跨上大桥时，忽然从海边方向传来一阵机枪的速射声。他心里突然一惊。啊！这些畜生，竟把那一队他们认为

可疑的人都枪杀了！他忽然想到那位在琴行工作的华侨朋友也在里面呢！就情不自禁地回头向那里张望了一下，不料背上立即就重重地挨到了两枪托，打得他两眼发黑，差一点没跌倒……。

从集中营放出来后，日本人又叫他们进行登记，并要王友根留在海军港修拖轮。王友根开始推托不会修，可是日本人说他们完全知道他的底细。原来那天在集中营检查时，日本人就了解他是个钳工，所以把他留下来。他们通过翻译告诉他，如果他留下来工作，两年后就送他回上海，否则就把他当抗日分子处置。最后，王友根只好留下，决定以后再找机会脱身。

在海军港，生活比集中营好不了多少。一天强迫做十几小时的工作，却只给两餐麦片饭吃。王友根心里恨死了这批侵略者。他知道，这些侵略者同样也在蹂躏着他的祖国，屠杀着他的同胞和亲人。所以一有机会，就尽量在工作中给他们造成困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拉得很长，战略物资消耗巨大，来源十分困难。有一次，王友根正在修理一艘拖轮，海滩边放着两大桶汽油。平时在他们工作时总是有日本人在旁边进行监视，这天正巧那个日本人拉肚子，经常跑厕所。王友根就趁这个机会，用划针偷偷地将油桶凿两个小洞，并把油桶翻过来，让小洞对着沙滩而不让日本人发觉。过了一夜，两桶汽油就全部漏完了。等日本人发觉油没有了，王友根的工作早已换了地方。有时在修理主机时，他总是把喷嘴放得特别大，所以经他修过的船，耗油总是特别多。日本人渐渐地对他也产生了一点怀疑，但一时又找不到什么把柄，所以除了对他加紧监视外，一时也奈何不得他。

到了一九四三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个亚洲大陆和太平洋战线逐步开始走下坡路，新加坡经常遭到同盟国飞机的空袭，夜里开始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当时，王友根住的房间里一共住着三个人，除了他自己外，还有一个姓陈的广东人。他是不久前被日本人连拖轮一起抓来的。另一个是印度人，叫依带姆。这家伙名义上也是个钳工，实际上什么技术都不懂，而是日本人派来监视他们的一个印奸。有一天晚上，王友根干完一天活，累得和衣躺在铺上就睡着了。那个广东人由于刚被抓来，心里总惦念着家里，也不懂日本人的规矩。晚上便把窗户用衣服遮起来，想给家里写封信（其实信是根本寄不出去的）。那个印度人依带姆装着出去小便，去报告了日本人。广东人还没写满两行字，两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突然冲了进来（印度人故意没把门闩上）。广东人根本措手不及，就挨了日本兵一顿拳打脚踢，又用枪托捣他的腰部，直把广东人打得口吐鲜血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王友根从睡梦中惊醒，一见这情景，心里十分愤慨，就以质问的口气问两个日本兵：

“你们为什么打他？”

鬼子正在兽性发作，哪里容得王友根这样质问。一个鬼子兵用枪口对着王友根的胸口，另一个鬼子就喝令他立正。王友根只好站起身来。当他脚跟还未站稳，鬼子就照准他脸上一拳。鬼子原想这一拳定能把王友根打倒在地，不料王友根除了摇晃一下外，竟稳如泰山，大叉两腿直挺挺地站在他们面前。这一下鬼子更加恼怒了，便左右开弓地在他脸上一连打了十几拳。王友根两颗盘牙也被打落了，嘴里满口鲜血。他紧紧地握着一双大锤般的拳头，只要一拳，就可以把那狗东西

打出门外，再一拳就可以结果他的狗命。可是另一个鬼子的枪口正对准着他的肋下，只要他一抬手，鬼子就会开枪。友根只得以最大的力量控制着自己。后来，鬼子自己的手也打痛了，才不得不停下来。等他停止后，王友根还是要问：

“你凭什么打我？”

鬼子气喘喘地用手一指依带姆：“你问他！”

说完，两个鬼子转身就出去了。

鬼子走出去后，王友根吐掉了口中残牙淤血，用水漱了漱口，又把广东人扶到铺上。他估计日本人已走远了，便决定好好收拾一下那个印奸。

他走到依带姆铺边，见依带姆若无其事地躺着，好不自在。友根心里腾地升起一股怒火。他压低着声音对印度人命令道：

“依带姆，你起来。”

依带姆一听这声音，就慌忙从铺上坐起来说：“你要干什么？”

“我命令你站下来！”王友根仍然压低着声音说，但这声音听起来很可怕。

依带姆见势不妙，便惊慌地想大叫，王友根从腰间“唰”地抽出一把水手刀，说：“你敢叫，我立即宰了你！”

依带姆只得慌忙爬下铺，笔直地站在王友根面前，两腿不住地索索发抖。

“日本人为啥要打老广东和我？”王友根问。

“这，这，我怎么知道……”

老广东在铺上哼哼着说：“是他去报告的。他假装出去小便，又故意不把门上问。”

王友根早就知道这家伙是日本人的——条走狗。过去有不少人都吃过他的苦头，有的人甚至还在他的告密下丢了性命。想到这里，他再也遏止不住胸中怒火，就照着依带姆的下巴颏狠狠地给了他一拳。依带姆应声仰面倒了下去。当这家伙翻过身来刚要向门口爬去时，王友根把他一把提起来又是一拳。这一拳，把依带姆打得瘫倒在地再也动弹不得，只有口中还在连连乞求饶命。

打完依带姆，王友根自知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否则明天必将遭到日本鬼子加倍的报复。所以就决定冒死也要逃出去。他对老广东简单作了几句嘱咐，叫他把一切责任全都推到自己身上，便跨出大门，大步流星地消失在黑夜里……。

王友根逃出军港，一时却无法离开新加坡。他知道，如果不离开新加坡，迟早会被日本人抓回来的。因此便将计就计地上了一艘叫“真神丸”的日本商船。这条日本商船是专跑香港、台湾等航线的，他想，以后也可以看机会逃回上海去。但是，船上的日本头脑们对中国海员监视很严，特别是船靠大陆港口时，日本人根本不让中国海员上岸，何况他又在机舱间工作，脱身的机会就更少了。但他心想，即使回不了上海，在“真神丸”上藏着也比在新加坡安全些。只是他还有一只箱子寄在新加坡那个姓杨的朋友家里。箱子里不仅有自己的东西，还有一位同事寄放的东西，一定得设法把它取回来。在一次船靠新加坡码头时，他便找了个机会去找那位姓杨的朋友。

当时，日本鬼子为了镇压马来亚人民和华侨的抗日活动，经常在市面突然戒严进行挨户搜查。姓杨的朋友住在一幢街面房子的楼上，下面是一个印度老人开的小店。那位印度老人一见王友根，十分惶恐地告诉他：

“唉呀，你怎么还敢到这儿来呀？！这几个月里依带姆天天带着日本人在找你！还要我一见到你就去报告。否则就要把我这小店烧掉。你快走开吧！”

王友根坦然地说：“没关系，我是来拿点东西的。依带姆要找我，正好，我们还有些账要算算哩。”

正在这时，警报突然鬼哭似地叫起来。又戒严了。印度老人惊慌地催着王友根说：

“你赶快到楼上你那朋友家躲起来吧，他们又要搜查了！”

王友根从容地笑笑说：“他要搜查，我躲也没用。那时不光害了杨先生，也连累了你。”

“那，那怎么办呢？”

“回头依带姆如果见到了我，你就说我刚到，你还来不及去报告。”

印度老人感动地说：“唉，你真是个好人的。可他们就是要害你们这样的好人啊！”

过不多久，依带姆果真领着两个日本兵来了。他一见王友根，先是一惊，接着就阴笑着说：“哦，我的老朋友，我天天都在找你，今天总算把你找着了……”

王友根两眼喷火地问道：“你找我干什么？”

依带姆一见王友根这目光，心有余悸地连退了几步，说：“这你别问，到时候你自会知道。”说完，他又对两个日本兵使了个眼色。那两个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哇啦哇啦地把王友根赶上了他们的汽车。

王友根被押到军港，日本人先把他打了一顿，又把他关了几天，便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审讯。他们问他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经他修过的船特别费油？为什么海滩上的两大桶汽油都

没有了？为什么恰好在他逃走后的第二天二号拖轮就坏了，等等。王友根对这些早有准备，他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一一回答了日本人的问题。说到印度人依带姆，王友根则理直气壮地说：

“依带姆是个坏蛋！他经常对工人敲诈勒索，如果我们拿不出钱，他就对我们进行陷害。那次我被打，就是他诬告的。我所以打他，完全是为了报仇。后来因为怕报复，所以只好逃走。”

日本人觉得王友根的回答是无懈可击的，又因为他们当时技术工人很缺乏，而且了解到他离开军港后，是在一条日本商船上工作，也没什么可疑行为，因此就仍然强令他留在军港工作。这样，王友根又落入了虎穴。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打击下，已经穷途末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在日军占领地区，一般物资和粮食都异常缺乏。王友根当时在一艘挖泥船上工作。日本人经常强迫他们一天干二十来小时的沉重劳动，一顿却只给吃两碗稀粥。有些工人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只好去找一种树粉来充饥。这种树粉到胃里不能消化，根本毫无营养，而且容易积在胃里，严重的甚至引起死亡。有两个和王友根同船工作的印度人，接连吃了两天这种树粉，第三天半夜就死在铺上了。王友根是个体魁力大的大汉，更经不住饥饿的折磨，他明知吃了这种东西有危险，也只好拼死吃河豚。每次吃过以后，半夜胃里就开始胀痛，常常闹得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为了不使它在胃里淤积，他只得半夜起来进行运动。这样，慢慢地他不仅得了胃病，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起来。一个背起两三百斤东西健步如飞的彪形大

汉,有时竟连一把十来磅的榔头也挥不动几下。

王友根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在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王友根,也总算得到了一线希望。他象一个从长期昏迷中苏醒过来的人一样,又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和希望,开始了对一切往事的回忆和思念。现在他是多么想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哪!这五年多来,他们究竟生活得怎样?阿妈还健在吗?妻子银兰的身体还好吗?那第二个小子龙法该有六岁了吧?现在战争结束了,侵略者被赶跑了,他们总该也可以舒口气了。整整五个年头过去了,他们没有得到过他的半点音讯,他们会如何地思念他、日夜不安地为他担心啊!每想到这里,他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年迈体弱的阿妈和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的妻子,似乎看到他们守在幽暗的油灯下,相对无言默默地流着眼泪。他真是归心似箭啊!恨不得立时长上两只翅膀飞回家去,告诉他们他还活着,让他们放心,让他们高兴。可是现在他身上分文莫名,甚至连寄封信的钱也没有,又怎么去越洋渡海见亲人呢?

日本人被赶跑了,英国人又回来了。英国老板们一登陆,就忙着接收资产和恢复自己的企业,哪里会来管一个中国穷海员的死活呢?王友根只得把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深深埋入

心底，重新跨上太古公司的轮船。跑了几次泰国的航线，积了点钱，才给家里写了封信并汇了点钱回去，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天他才回到一别六年多的上海。

一踏上上海港码头，王友根的心情多么激动啊！现在，他的双脚又踏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了，尽管这里也会引起他许多苦难的回忆，但这毕竟是生长他的地方啊！一想到马上就可以见到亲人，他的心情就更加不能平静了。可是，当他急急匆匆赶到南市老北门一间小阁楼上一看，不禁从头顶一直冷到脚心。这个六年多前的家，早已不是他的了。这里住着的是一家毫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这里，王友根的家只是历史上的事情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到哪里去了？谁也无法告诉他。

王友根离开了那个已成过去的家，惘然若失地在马路上踟蹰着。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来去匆匆。王友根的家没有了，人不见了，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呢？后来，他忽然想到，去年他在新加坡曾寄过一封信和二百元钱回来，是托一位开木行的同乡转交的。于是，他又急忙来到这家木行。一问，才知道妻子和儿子早在抗战胜利前就已经回到金塘乡下去了。这位木行老板告诉他，他的妻子听说他已死在外国，精神上受了刺激，患了精神病，病得很厉害，目前情况如何还不知道。

“去年我不是寄了二百元钱回来吗？为什么不给她治疗呢？”王友根心情急切地问。

“那时你女人已经病得神智不清，你阿妈年纪大了，又不识字，我怕钱丢失了不好向你交代，所以只好暂时存放在我这里。”

木行老板说完，到里面拿出一叠钞票，交给了王友根。

“钱都在这里，你带去吧。”

王友根心里气愤极了。这二百元钱在他寄来的时候，还能买四五担米，现在却连二斗米也买不到了。很明显，老板是拿了他的钱做了生意，现在又按票面还给他，实际上等于把他的钱给吞没了。这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妻子的病给耽误下来了。他真想拿起那叠钞票照着这个老板脸上扔去。可又一想，这也是自己的不是。天下的老板，哪个不是唯利是图，在这些人面前是根本没什么亲戚同乡情份可言的。自己本来就不应该信托这样的人。事已至此，闹又有什么用？想到这里，王友根猛地站起身，一声不吭地大步走出门去，全然不去理会那老板还在后面虚情假意地给他打招呼。

离开木行，王友根急忙到太古公司请了两个月事假，就连夜乘上宁波轮船，直奔金塘乡下。

离别故乡已经整整八年多了，如今它依旧是那样贫穷破败。时令虽已是仲春，映入友根眼里的却是一片荒凉寥落的景象。当他来到老家时，只见那间草屋有一半已经倒塌，门前长满了蓬草。他推开半掩着的屋门，只见里面黑洞洞空阔阔的没一点生气。他呆若木鸡地站在门口，心中百感交集，只觉全身瘫软无力。这时，隔壁屋子里走出一位大婶，用惊异的目光看了他半晌才问道：“你找谁？”

友根转身一看，这不是沈大婶吗？忙说：“阿婶，我是友根哪。”

沈大婶有些疑惑地揉了揉眼睛，又把他上下仔细看了一遍，更加惊奇地说道：

“啊，你是友根哪？！人家不是都说你——”说到这里，大婶突然刹住了。

友根忙接着说：“阿婶，我还在。——我阿妈和我女人呢？”

沈大婶带着悲凉的口气说：“唉，友根哪，你出去这么多年，怎么连个信也不带个回来？你可知道你阿妈和你女人这几年过的啥日子啊！”

可是，沈大婶又哪里知道友根这几年过的啥日子呀？但友根没有说，他也不愿意说。他急切地盼望早一点看到自己的亲人。

沈大婶告诉他：他女人二年多前就得了精神病，整日整夜地满山遍野乱跑，说要步行到上海去找丈夫。村里人都怕她出事，起先把她关了起来，可是她日夜嚎哭挣扎，病情越加严重，成天连水也不肯喝一口。眼看性命也要保不住了，大家不得已只好又把她放出来。现在由一位远房亲戚把她管在家里。年迈体衰的阿妈见媳妇这副模样，心里又惦记着下落不明、生死不知的儿子，日夜不止地哭泣悲伤，身体更加衰弱。为了生活，邻居们把她介绍到镇上一个赵财主家去做佣人。

友根听着沈大婶的介绍，犹如万箭穿心，但他还必须强打起精神，听完沈大婶的话，便急忙向镇上赶去。到镇上赵财主家一问，才知道阿妈由于身体多病，已被辞退回家，现住在岳母处。他只得又拖着沉重的步子，连夜摸黑地向岳母家赶去。

赶到岳母家，已经是深更半夜了。阿妈一听到友根的声音，激动得鞋也来不及穿，光着脚就奔到门口。她还以为是在梦中相见。后来岳母从隔壁邻居家借来只油灯，让她把儿子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照了一遍，她才一把紧紧搂着儿子，用颤抖的双手反复抚摩着他的头和肩膀，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下半夜，一家人都没有再睡。早晨天刚亮，友根就想去看女人。邻居们怕她突然见到他过于激动，精神上经受不住，反而会加重她的病情。因此劝友根略等几天，让别人先给

她捎个信，下点毛毛雨，让她精神上有个准备。

这天，王友根来到那位远亲家，见妻子正在吃晚饭。他只得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在一边等待着。他仔细端详着自己的亲人，只见她蓬头散发，骨瘦如柴，要不是别人事先介绍，他根本不能认出她来。等她吃完饭，王友根才走过去轻声地叫了她一声：“银兰，我回来啦。”

可是她却毫无反应。王友根又叫了两声，她还是坐着一动也不动。他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有些伤感地说：

“银兰，我回来啦，你怎么不理我呀？”

过了半晌，她才把他的手拨开，头也不回地问道：“你是谁？”

“银兰，我是友根哪。我回来啦。”

她听了突然回过身来，用一对失神的、可怕的眼睛直视着他，说：“你不是的，你不是的，你是红眉毛绿眼睛，你是鬼！你给我走开，走开！”

“银兰，你清醒清醒，我真是友根哪！”

旁边亲戚朋友也一齐帮着给她解释，可是她还是一口咬定：“友根在外国，友根早死了，你不是，……”

她说着，竟要动起武来。没有办法，友根只好退到一旁。六年多来，他日夜思念着家乡，盼望着亲人。今天亲人总算见到了，却完全不是六年前那个办事利落有条理，性情温和的妻子，而是一个神智不清的精神病患者。这个身材魁梧的硬汉子，竟忍不住地掉下泪来。

在亲戚邻居们的帮助下，经过好几天的不断工作，她才渐渐和友根接近起来。

这天，王友根对她说：“银兰，我们回家去吧。”

她摇着头说：“我没有家，我家在山洞里。”

“我们到阿妈那里去，她在等着我们。”

她忽然恐怖地说：“不去，不去，那里有老虎，它要吸我的血，啃我的骨头！……”

友根扶住她说：“老虎不怕，有我，友根在你身边！”

一会，她又唱起来，唱得那样悲哀，哭得那样伤心。

王友根只好这样日夜陪伴着她照顾着她。在这种悉心照顾下，她渐渐开始恢复一点理智了。当她略为清醒一点时，也常向丈夫倾诉离别六年多来的艰难遭遇。

在友根离家以后，留下的一点生活费很快就用光了。开始，她拖着第二个孩子，起早摸黑地给人干家务杂活，半饱半饥地勉强对付了一年多。可是丈夫第一年不回来，第二年不回来，第三年就音讯杳然了。起先，她去找丈夫的同事和朋友，向他们打听友根的消息。开始，他们总安慰她，告诉她友根可能在什么地方。后来，他们渐渐地也找不出什么语言来安慰她了。由于长年营养不足，孩子多病，她白天拚着命地给人干活，夜晚却成夜不能入睡。身体渐渐垮下来，思考能力迅速减退，经常会颠三倒四地说些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友根阿妈见了媳妇这模样十分为她担心，便在友根一些老同事的帮助下，凑了点盘费带着她一起回到了乡下。

回到乡下，生活还是十分艰难。友根阿妈为了生活，只好仍然给人去做佣人，友根女人拖着个孩子，做佣人别人也不要的，她只好去做小生意。她拖着有病的身子，一天几十里路穿乡过镇地来回奔走。为了勉强养活两张嘴，她不得不极度节俭地过着日子。有时在外面做小生意，连几分钱的过河摆渡费也舍不得出，而宁可趟水过河。有一次在趟水过河时，突然

被山洪冲倒了，在水里挣扎了好几分钟，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了，幸而被过路人发现抢救了上来，才没被淹死。自此以后，她的病情就更加严重起来……。

现在丈夫终于回来了，可是她已病得人事不清了。友根只好日夜看管照料着她，除了以自己一颗阶级友爱之心去抚摩她精神上的创伤外，一时也无别的办法。

友根两个月的事假很快就要到期了。超过假期，就有被解雇停生意的危险。于是，他只得带着妻子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友根还是进退两难。一个海员不上船，怎么能够生活呢？要上船吧，丢下她一人在家无人照顾，她的病情会更加严重起来，友根实在不放心。最后，他只好把心一横，辞去了太古公司的工作，在一个汽车修理站找了个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月初可以买到一担米的钱，月底却只好买两三斗了。一家四口，老少三代，还有个精神失常的病人，生活的担子实在压得友根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妻子的健康，友根只得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地苦打苦熬。他觉得，银兰不仅是自己的妻子，而且是自己穷苦患难的姊妹。八九年来，她跟着自己担惊受怕地吃尽辛苦，帮着他分挑生活的重担。特别是这六年多来，她几乎承受了这个家庭的全部担子：抚养孩子，照顾老人，还要日夜为漂流异国、生死不明的丈夫担忧受累。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她而不管，就是饿死，也要死在一起。

阶级情谊的温暖，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友根女人的健康渐渐恢复着。一年以后，她的精神就基本恢复正常，能够独立生活和料理家务了。

妻子的病一天天好起来，生活却一天天更加艰难了。一九

四七年冬，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战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解放大军全面转入反攻。蒋介石为了挽救他覆灭的命运，一面向帝国主义主子卖国借债，一面加紧压榨人民。市场上纸币泛滥，物价如断线风筝似的上涨。友根一家四口仅靠他一人的工资，有时连稀汤也喝不饱。虽说当时阿妈和孩子都在乡下，但就是养活两个人也是十分困难的。一些船上的老同事见友根日子实在过得艰难，便劝他说：“友根哪，还是上船去吧。海风海水苦又咸，海员有家不能归。这就是我们当海员的命运。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是摆脱不了这个命运的。你不能跑外海，就找条中国老板的船跑跑国内航线好了。”

友根觉得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只好花了几天时间说通了女人，就上了一条海鹰公司的“海牛”号轮船。

“海牛”号当时是条跑北方航线的船。每隔一个多月就可回一次上海。每当船靠上海港时，友根就可以抽空回家看看，给妻子一点必要的照顾帮助。工资虽则低些，生活虽然苦些，家里倒也还可以放心。

这样的苦日子熬了一年多，友根的生活又一次遇到了风浪。

一九四九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号令下，突破长江天险，百万雄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蒋匪残兵败将，一举捣毁国民党的老巢南京。五月二十七日，人民子弟兵就解放了上海。当时，王友根的船正在青岛。当他听到上海解放的消息时，内心是多么高兴啊！许多海员都和王友根一样欢欣鼓舞，希望早日离开青岛回到上海去（当时青岛尚未解放）。

六月二日的清晨，“海牛”号还没来得及启碇，突然从码头上涌来一批国民党败兵。他们不问情由，慌慌张张地爬上船

来，用枪口逼着船长和驾驶员，强令要把他们开到台湾去。

这时，大港码头上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解放军追击的枪声。那些国民党丘八们争先恐后，丑态毕露地往船上爬，有的把枪炮辎重都丢入了海里。船员们知道解放军已近在眼前，这批家伙已成瓮中之鳖，就尽量放慢动作，以一切借口来延长启航时间。那些在战场上象兔子似的国民党丘八，在老百姓面前却个个凶似虎狼。他们穷凶极恶地砍断缆绳，丢掉锚链，不顾一切地逼着船员们强行闯出了港池。一路上，他们强凶霸道地抢夺海员的东西，强占海员们的房间，海员们一开饭，他们就象一群苍蝇似的一哄而上，抢食一空。弄得船员们常常只好饿着肚子干活。

王友根和船员们都恨死了这批家伙，恨不得把他们全都扔下海去喂鲨鱼。可是他们手里有枪，并日夜轮班地监视着船员们，船员们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对付他们的办法。

一个多星期后，船到达了基隆港。可是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不让船靠码头，也不许下兵，更不准他们开走。他们只好在港中浮筒上抛着。

王友根离家已经三个月了。他没有想到局势的发展会如此之快，否则他一定要等到上海解放这一天。现在，上海解放了，可是他却身陷敌区，欲归不能。过去他也常从同事们口中听到一些关于解放区和共产党的传说，虽然他想象不出解放后的上海会是什么样子，但那里现在肯定是春光明媚、阳光灿烂的另一个新世界。想到这里，他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可是一想到自己这一回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家里，妻子在长期得不到他的消息后，旧病又会复发起来，这样，他的心里又阴云密布了。他私下和一些同事们议论，知道大家的心情也都和

他一样，决心死也要把船开回去，心里又升起了无限的希望。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国民党才让船上的那些败兵上岸，但他又强令“海牛”号开到汕头去装运物资。在汕头装完物资，国民党又强令他们靠泊香港，不准他们回解放区。

怎么办呢？全体船员们经多方商量设法，把船开向北方海域。当船进入黄海中部，突然转舵全速东向，等到国民党发觉，“海牛”号已进入了渤海湾……。

一九五〇年一月初，王友根和他的同事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曲折的斗争，终于把船开到了天津港靠了码头。王友根怀着狂喜的心情走出机舱间，一片灿烂的阳光照得他眼花缭乱。码头边，街道上，彩旗飞舞，歌声不绝。人们以尽情的欢呼歌唱来庆祝翻身解放：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

王友根翻身了，王友根新生了，王友根从此与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跳出旧世界的茫茫苦海，进入了一个光明的新世界。

当时，国内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刚刚结束，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各方面都需要有一个转变和恢复时期。一九五〇年冬，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并对我国实行疯狂的海上封锁，妄图把年轻的新中国扼死。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海运事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年的夏天，王友根便离船转到陆上工作了。这个三十四岁的

壮年汉，感到浑身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他带着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怀着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满腔热情地投入国家经济恢复的斗争。他背着行李，带着全家，从祁连山下到松花江畔，四海为家，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那里，全力为社会主义祖国发挥着自己的一切技能和智慧。在劳动和工作中，他亲眼看着社会主义祖国在兴旺发达、迅速成长，心中感到无比鼓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一九五二年冬，他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七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一年，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帝国主义的封锁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我国的海运事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就在这一年，王友根正准备从东北再次奔赴大西北参加内地建设，忽然接到领导上的通知，把他调回上海海运局归队，并开始担任了轮机长的工作。

从此，王友根又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大海，当他第一次跨上甲板，极目波澜壮阔的大海时，他激动得眼眶都湿润了。大海啊，大海，过去多少年来，你流的是海员的泪水，今天，新中国的海员才真正成了你的主人！只要革命事业需要，王友根就愿意和你打一辈子交道。

一九六四年，王友根又被调到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跑国际航线。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驾着巨轮，满载着支援世界革命的物资，带着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每来到一个国家，总是被包围在热烈的欢迎队伍和千百双尊敬的目光中。他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歌声传四海，做一个新中国的海员是多么自豪！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也飞快发展起来，英勇的造船工人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造出了一条又一条万吨巨轮。在国内，王友根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轮机长，经常参加验收我国造船工人自己制造的万吨巨轮。他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驾着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巨轮把中国人民的友谊送往全世界，那该有多好啊！

一九六六年，王友根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被调到我国自行制造船体和主机的第一艘远洋轮“东风”号上当轮机长，一九七一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又驾着“东风”号横渡太平洋远航北美洲。

开船那天，五十五岁的王友根笑着对老伴说：“银兰啊，过去我一开船你就提心吊胆，这次我们要跑到地球的那一边，你不想送送我吗？”

老伴故意皱着眉头说：“你这老头子怎么翻起老黄历来！那是什么时代呀？那时人家哪里把你们当人哪！现在我们国家这样强大，威信这样高，你们就是跑到天边，谁又敢欺侮你们哪？我看呀，你们在船上的生活比家里还舒服得多！”

老伴的这几句话，真是说到了他的心坎深处了。是的，王友根深切地体会到，做一个新中国的海员，最深刻的感受是：他不论去哪多么遥远的地方，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时时都会感觉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在他的身后，他就会心明眼亮，力量无穷。这是一个新中国海员的最大的幸福啊！

今年，王友根已经五十八岁了，但他仍然觉得自己还年轻，继续驾“东风”劈巨浪，为社会主义的海运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血泪漫“金山”

——上海五岭旅社(原金山饭店)老工人高启元的家史

一轮红日,冉冉地升起,给蔚蓝的天空抹上了一层金灿灿的颜色。

六十二中学的大门口,有几个红卫兵正在刷着大幅标语,他们刷完了最后一个字,高声地朗读着:“热烈欢迎工人讲师团来我校讲课!”

整个校园里,贴满了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几个身穿白衬衫、梳着羊角辫子的红卫兵,正在出一期批“三字经”和“神童诗”的大批判专栏。

上课铃响了,全校同学们陆续地进入到各自的教室,尤其是七五届八班的同学们,今天显得更有精神,个个昂首挺胸,好象要接受一次检阅似的。

这时一位老工人在八班班主任的陪同下,走进了八班的教室,他身穿一件洁白的工作服,胸前那红艳艳的“五岭旅社”四个字,给人一种朴素庄重的感觉。他,就是上海五岭旅社的负责人高启元。

老高头发花白,步履稳健,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满脸含笑频频地点着头,“同学们好!”

“老师傅好!”全班同学齐声回答。

高启元激动地走上讲台，声音高亢地说：“同学们，现在我国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能容忍吗？”

“不！决不能容忍。打倒孔老二！打倒林彪！”整个教室沸腾起来了，其他拉线的教室，同学们也都齐声响应，高举铁拳，口号声此起彼落，震撼着整个学校大楼。

“是的，我们决不能容忍”等口号声稍停一下以后，高启元继续说：“如果让林彪阴谋得逞，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就要变色，我们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同学们，旧社会的苦水，我是三天三夜也吐不完哪……”老高环视了一下教室，看着一张张生气勃勃、天真活泼的脸庞，顿时，汹涌的思潮把他带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高启元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父亲是给地主老财家帮工的穷农民，母亲给人家去当奶妈。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父亲叫什么名字，为了逃避灾荒和债务，当小启元还在吃奶的时候，就不见父亲了。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母亲又改嫁。小启元是靠外婆一顿薄粥一顿糠拉扯大的。六岁那年，外婆再也无力抚养他了，当时他母亲在杭州做帮佣，就托人把他送进了杭州的一所孤儿院。在孤儿院里，启元过着地狱似的生活。到了十三岁那年，他被孤儿

上
海
大
街
上
的
一
切

院赶了出来。此后，他在杭州一家印刷所里当过学徒，在乍浦等地给资本家做过佣人，但都因为他不肯低声下气地屈服于那些老爷太太们而一再遭到解雇。

一九三三年启元已十九岁，母亲也被老板解雇了，全家人扶老携幼地又回到了绍兴乡下。那时，启元的外婆早已去世，他们只得在一个破庙后面借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的低矮草房，启元娘由于积劳成疾，经常卧床不起。当时，继父已去世，几个弟妹都还小，一家六口人的生活担子就压在十九岁的启元身上。他东打杂，西帮工，连自己一张口也很难糊过，怎能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呢？一家人经常是“十个手指八条缝，肚皮十日九日空”。幼小的弟妹到山上去拾点柴来卖卖，还常到荒郊去挖些野菜和“观音土”来充饥，这样，又苦苦的熬过了六年。

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启元已二十六岁了，可还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职业。那时他听说，上海这个地方很大，找工作容易，心就活动了起来。那天，他打杂回来，对母亲说：“阿妈，我这样在家里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听说上海工作好找，让我去试试吧。”

母亲听儿子这么说，沉思了一下说：“儿啊，这世道不容我们穷人过啊！你想到外边闯一闯，你就去吧！”

但是，启元连一件象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到上海去还要一笔盘费，这怎么办呢？在兄弟姊妹问，启元是老大，母亲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为了给儿子找条生路，这几天母亲到处奔波，设法借贷，每天要等太阳落山了，她才耷拉着脑袋，蹒跚地踏进家门。

“阿妈，饭冷了，你吃点吧！”大女儿把一碗照得见人影的

六谷糊放到母亲的面前。

“唉！”启元母亲一声长叹，眼光直楞楞地望着大女儿，又看看启元。

启元从母亲的一声叹息中找到了一切答案，今朝，母亲又白跑了一天。

有一天，启元母亲又出去了，但这一天却回来特别早，手里还拿了一个小包袱，这时，大妹在门口很远见到了阿妈，就迎了上去，一把接过娘手里的那个小包袱，“阿妈，这里面是什么？”

“衣服。”母亲冷冷地回答。

“你接到生意啦？”女儿天真地问。

“不是，是给你哥哥的。”母亲回答时脸色很阴沉。

“喔，妈借到钱了。”

“唔，是借——到——钱——”。娘的声音有些颤抖，边说边回过头去，暗暗地擦眼泪。女儿疑惑地问：“阿妈，钱是向谁家借来的？”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大妹知道哥哥要出去了，母亲心里难过，也不再多问。

启元打杂回家，见大妹在做衣服，忙问：“这是谁家的？”

“是你的，阿妈说她今天碰到了一颗好心人，借了几十元钱，还给这一包衣服。”

“好心人？”二十六岁的启元已经历过生活的艰辛，饱尝了人间的苦辣，他想，当今有钱人中哪有这样的热心人啊。“阿妈呢？”他见母亲不在，便找到后门，只见母亲独自坐在破庙的阶石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天，无声的泪珠不住的往下滚，连启元走到她身旁也没察觉。

“阿妈，我回来了。”启元把母亲扶进屋里，又问：“这钱是向谁家借的？”

“哥哥，你别问阿妈了，你到上海去赚了钱，寄些来还掉就是了。”大妹怕母亲难过，连忙插上来说。

动身的那天，大妹把几件改好的衣服给哥哥试身，一面说：“哥哥，阿妈身体不好由我们照顾，你放心到上海去。”

启元母亲和大女儿一直把启元送到码头，在上船以前，启元拉着母亲的手说：“阿妈，你得告诉我，钱是向谁家借来的，我到上海以后，也可以写封信去谢谢。”

“不用去谢了。”母亲边说边沉思着，她想现在决不能把他大妹妹卖掉的事情告诉他。但母亲再也忍不住了，泪水象断线的珍珠似的滚了下来。

这时，船催着要开，启元只得跳上船去，老大用篙子一撑，乌篷船徐徐地离开了码头，母亲两眼泪水地招着手，耳边还传来大妹的声音：“哥哥，你放心去，阿妈和弟妹我会照顾的！”启元站在船头上，伸开双手，大声地叫喊：“妈妈，妹妹……！”船去远了，听到的只是河岸两旁的回声。

启元根据母亲告诉的地址，在上海闸北太阳庙附近的一间草棚里，找到了远房亲戚二叔的家。二叔是个拉黄包车的，家里也一贫如洗，听说启元是到上海来找工作的，便叹了一口气说：“启元啊，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看看花花绿绿，失业的人多得莫佬佬，找工作可难啊！”启元到上海，满心想很快能找到职业，听二叔这么一说，好似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二叔听了启元一家人的遭遇，也很同情，就安慰着说：“你也不要着急，就在这里住下吧，以后二叔慢慢给你想办法。”

二叔拉着黄包车，早出晚归，有时通宵不回家，生活过得很清苦。再加上启元，更增加了困难，家里常常有了这顿没下顿的，启元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威胁。那天，他正在纳闷，二叔回来了，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在汉口路上有一家即将开业的旅馆——金山饭店在招工。这给启元带来了一点希望。

这天晚上，启元一夜没有合眼。天还没亮，他就起身了。二叔带他一起跑到宁波路金山饭店招工地点，只见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二叔说的“失业的人多得莫佬佬”这句话，启元现在具体看到了，好不容易挤进去一问，他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要进这家旅馆当一名茶房须得缴五百元保证金，这笔数字，当时可以买一千多斤大米，这叫高启元怎么付得出呢？他望着登记的小窗口楞住了，看到有好多抱着与他同样心情的人，听到这笔保证金的数字，就苦笑了一下离开了。二叔在旁边搓了搓大手，那么大的一笔数字，要他拉黄包车的到哪里去设法呢，真是水牛掉在井里有力使不出，只得和启元一起，蹒跚地回到家里。但是，不付出这笔钱，又到哪里去找职业呢？这天，在吃晚饭的时候，二叔将筷子一搁，下了狠心说：“五百元就五百元，我给你去借印子钱，利息虽高，有了工作总可以慢慢还的。”启元当时只想有工作好做，就能养活阿妈和弟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利息大小呢？就催着二叔赶快去借。二叔就凭着他的一批穷兄弟的担保，东拼西凑，终于借到了五百元印子钱。启元拿去缴付了保证金，填写了一份卖身契似的保单，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进了金山饭店，当上了一名被人使唤的奴隶——茶房。

进了金山饭店，启元满以为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从此可以拿工资维持家庭生活了，不料资本家有个苛刻的规定，就是

对日夜牛马般为他们劳动的工人不给一分钱工资，工人自己要吃饭和养家活口，都要靠自己伸手向旅客去讨小帐。什么叫小帐？就是叫工人在日夜听候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使唤之余，在这些阔老们付完房间及饭食费用之外，再叫工人向那些老爷太太们说好话乞讨，碰上他们高兴，就份外地给你几个钱，名之曰小帐，这和马路上的叫化子没有多大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在街上行乞，一个是在楼内向旅客乞讨。靠小帐收入是很不固定的，往往会热面孔碰上了冷屁股，弄得不好不但小帐拿不到，还会受到人身侮辱。启元是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硬汉子，过去一次次地找到职业，又一次次地被解雇，就是因为他这个性格。如今要他低声下气地向人家去乞讨，这怎么受得了。但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穷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启元为了找职业，借了五百元印子钱，债主天天来逼债，启元除了干下去以外，还有什么第二条路可走呢？！

正当启元在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烦恼的时候，突然接到他妈的一封来信，说为了他能到上海来，把大妹卖掉了，她到主人家后，因受不了虐待，上吊自杀了；不久又因为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又把第二个妹妹卖掉了，并准备带着留下的两个弟妹来上海……。启元看到这里，头轰的一声，眼前一阵黑，差一点昏倒下去，他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从经理室里传来了老板和反动当局头目喝酒碰杯的声音，时而还夹杂着猜拳声：“恭喜发财！”“全家福啊！”启元眼睛里冒出火来，左手紧握着拳头，狠狠地在自己的右手心上一击：“这是什么世道！真是吃人的社会啊！”可是，母亲并不知道启元在上海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如果她知道，再苦也不会来上海的。但高启元不愿让母

亲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他不忍心把母亲和弟妹丢在乡下过这种悲惨的生活，就是饿死，也要死在一起。

二

高启元发觉自己是上了老板的圈套了。他感到自己就象一条被赶进围网的鱼，要冲冲不出，要退无处退。真是进退两难。原来他还以为，茶房既然没有工资，靠小帐总也能吃口苦饭了。谁知事实却又一次打破了他的幻想。

按老板的规定，小帐分明、暗两种，明的是按一定的比例加在房租里的，这部分全部归老板独吞；暗的是在这以外，随旅客的高兴随意给几个零钱，这才归茶房们摊分。就是这一部分，也不是全归工人，贪婪的老板还要动足脑筋榨取，规定旅客所用的茶叶、草纸、火柴、肥皂以及木梳、草拖鞋等费用，都要从这部分暗的小帐里扣除。甚至连老板家里的“包车夫”的工资及老板的娘死后的丧葬费用，也要由这部分小帐中支付。真是敲骨吸髓，石头里也要榨出油。经过这样七折八扣后，分到工人手里的那就少得可怜了。就是这样几个少得可怜的小帐，还不能到手。每天小帐刚分好，印子钱老板就来讨利息了。印子钱是每天收息的，不论你小帐分多分少，印子钱老板的利息可半分也不能少。因此，高启元常常一天忙下来，只落个两手空空。

金山饭店在旧上海只是一个中型旅馆，一共只有一百二十八个房间，却有三百六十多名工人，平均每个房间有三个工人，而这些工人都要靠旅客随意给的额外小帐维持生活，收入之微薄，那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金山饭店的老板为什么要招这许多工人呢？

原来，金山饭店原打算造六层楼，可是当造到三层楼时，老板的资金已经全部用光了，上面的三层再也无法继续造上去。尽管善于投机取巧的老板费尽心机，十三档算盘拨尽，但也无法凭白地骗取到一元资金。最后，刁钻刻毒的老板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拚命地多招工人，并规定每个工人要先付五百元的保证金。在黑暗的旧上海，失业的人何止千万！为了求职，象高启元这样借了高利贷来交保证金的也不在少数。因此，这个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老板，一下子就从那些失业工人身上搜刮到了近二十万元的巨款！但是，当六层楼的金山饭店完工开业后，老板确实感到工人太多了。虽然这三百六十多名工人不需他出一分工资，那近二十万元的巨款也不必他出一分钱利息，但这三百六十多个工人每天分到的小帐连最低的生活也无法维持，有的甚至连付印子钱的利息也不够，长此以往，对老板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使他坐在这座“金山”上心里也得不到安稳。再说，分小帐的工人这么多，每个人摊到的份额又是那么少，他再要进一步捞取就会非常困难。因此，老板认定必须大大减少工人。于是，他又费尽心机，挖空心思地炮制了一百零六条“店规”。这一百零六条，好比一条条绳索，条条套在工人的脖颈里，绕在工人的手脚上。只要工人一踏进“金山”的门槛，要避过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动辄犯规，轻则罚款记过，重则开除出门。真是比走独木桥还难！

虽然小帐收入是如此微薄，而且常常被高利贷老板勒索一空，但高启元每天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去触犯那一百零六条。因为一旦被停了生意，就是勒紧裤带不吃饭，也没法去付高利贷老板的利息。何况不久母亲和弟妹又要来上海靠他生

活呢？生活的担子实在压得他直不起腰来啊！然而不管高启元如何小心谨慎，还是无法避开那一百零六条“店规”。

有一天，已是午夜一点多钟了，有几个房间的旅客还在吆五喝六地打牌赌钱。高启元一天已经劳动了十七八个小时了，人实在疲劳至极。但是，不管时间多晚，只要旅客还没有睡觉，茶房照例是必须等着侍候的。高启元在房门外等着，又没事干，慢慢地上下眼皮就搭起来了。他想到那一百零六条里规定打瞌睡是要罚扣小帐的，又强打起精神，但眼皮实在不听使唤。他只得摸出一支香烟，蹲在地上抽着戒瞌睡。刚抽了几口，忽然听得后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这时，他忽然想起抽烟也是“犯规”时，于是赶忙把香烟捏在手心里站了起来。回头一看，一个稽查（工头）已走到身边，为了掩饰，高启元勉强地同他打了个招呼，那工头只是点了点头，就走过去了。可是高启元的手掌心已烫起了一个大泡。但他庆幸的是抽烟的事总算未被工头发觉。谁知，第二天拆帐时，却被扣去了四成小帐。

又有一次，高启元替一个旅客拿着一只箱子，因为要赶到六楼给旅客开房门，急忙之中，就跟着这位旅客一起上了电梯。电梯开到半当中，他才想起乘电梯也是“犯规”的，于是忙叫电梯司机在三楼停下让他走上去。可是那位旅客却不答应，说他有急事，到房间里放了箱子，拿了东西马上又要出去，因此坚持要同他一起上去。没办法，高启元只得和他一起乘到六楼。后来这事被老板知道了，说高启元明知故犯，无视店规，硬要把他开除。高启元据理力争，那位旅客也为高启元说了几句话，老板又看高启元年轻力壮，还可供他吮吸啃啮，才以记大过一次，扣小帐三天了事。

乘电梯要被开除，不乘电梯也要被开除。就在高启元这事发生后一个星期，有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茶房，替一位官太太捐了一只大皮箱要上四楼。那只大皮箱装得饱鼓鼓的，足足有五六十斤重。这个年高体弱的老茶房已被老板吸干了骨髓，为了生活，又带病上班，怎么捐得动那只大皮箱？他想搭乘一下电梯，一只脚刚跨进去，忽然想到高启元乘电梯差一点被开除，就又立即退了出来，只得咬着牙关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去。他爬了十几级楼梯，就累得一身大汗，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想休息一下，又怕那官太太发脾气，让老板知道了又要说得罪了客人，也是“犯规”。于是，他只得拚命地继续往上爬。刚爬到二楼，他就眼前一黑，连人带箱子一起摔倒在地上，当场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见老板正站在他身边拍手顿足地骂他，说他摔坏了旅客的箱子和里面的东西，硬要他赔，还要把他开除。老茶房知道老板早就想把他一脚踢开，只是找不到借口。他想，这一回看来是无论如何无法再留下去了，实在气愤难平，忍无可忍，便颤颤巍巍地挣扎起来，一头向老板冲去，口里愤怒地骂道：“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狠如豺狼的“金山”老板，本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棍，见老茶房冲来，就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又命令狗腿子们一拥而上，把老茶房架着推出门去，并借口要赔旅客的损失，把老茶房的五百元保证金全数吞没。当时，正是初冬乍寒，外面冷雨霏霏，老茶房穿着单薄的衣衫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不久便气愤成疯。最后，他倒毙街头，含恨死去。

在金山饭店，象老茶房这样遭遇的老工人又何止一个！老板制订的那一百零六条“店规”，本来就是专为压迫工人而订的。在“金山”开业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老板就以各种借口开

除了七十多名工人！按老板的规定，一般工人在开除时是按票面价值发还保证金的。这时，工人拿到五百元钱，只能买到二百来斤的大米，而象老茶房那样的老工人，就连这一点也收不回了。当时，反动当局就是老板的后台，总巡捕房的华捕头，地方上的恶霸地痞，都是老板的把兄弟，工人有冤又上哪里去诉呢！

高启元经历着这一切，感到精神上遭受的折磨比肉体上遭受的折磨还要大过十倍！他是多么想跳出这地狱般的“金山”啊，可是，他纵然跳出了这座地狱，哪里又有他的生路呢？

在那豺狼当道、群魔乱舞的黑暗社会里，真是山山有恶虎，处处有盗贼，穷人连走一步路也会陷进灾难的深渊。这天下班回到二叔家的小阁楼上，启元心里惦记着母亲和弟妹，信已收到半个多月了，为什么至今还没有音讯呢？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来找他，说他母亲在来沪途中遭到了抢劫，现在流落长安镇街头行乞，要他马上去接，说完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启元接过来一看，知道母亲带在身边的第二个妹子的卖身钱和一个破包袱在路上都被土匪抢走了。他气得全身发抖，信从手里掉了下去。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按照母亲来信写明的地址，在长安镇的一个破牛棚里，找到了衣衫褴褛的母亲和皮包骨头的弟妹。短短一年时间，四十开外的母亲，竟变成了一个老人，大妹的自杀和二妹的出卖，这给母亲的额上又刻下了新的皱纹。“阿妈！”启元叫了一声，母亲伸出了双手，抚摸了下启元的肩膀，嘴唇颤抖着说：“我总算见到你了！”

从此，母子四人住进了二叔家那个面积不到七平方，高度不超过一公尺，四面无窗，密不通风的小阁楼里，虽则苦一些，

但总想能安安稳稳的过些日子了。不料灾难又象六月的冰雹似的朝他们袭来。启元母亲开头还替人家缝缝穷,洗洗衣,补贴一些家庭开支,但由于积劳成疾,经常卧床不起。启元最小的一个妹子来上海不久,就得了“瘰子颈”。这年冬天,启元自己又得了一场伤寒症,高烧发到四十度。他挣扎着起来,写了一张请假单叫弟弟送去,老板一看条子,脸色一变说:“他昨天还好好的,不要装死,今天连路也不能跑啦?派头倒蛮大,还要别人替他请假。”第二天就打发人来催启元去上班。可是这时,启元已不省人事了,他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母亲在一旁流着泪,但她无力替儿子看病。这时家里分文没有收入,而那个绰号叫“活阎王”的高利贷老板照例天天到店里来,要高启元名下的那笔利息。开始,店里的同事替他说明一下,就对“活阎王”说:“吴老板,高启元病得人事都不知了,这个时期的利息,等他病好了一起归还吧。”

“不行!”“活阎王”把折子往桌上一甩说:“姓高的生病,我吴某人可不能吃素,你们都是保人,哪能挂挂名的呀!”同事们一听,都很气愤,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大家只好从微薄的收入中节省下来,你一元,他二元的凑钱,替高启元还了“活阎王”的利息,有时还要照顾启元的家庭生活。真是穷帮穷,亲帮亲,只有阶级弟兄才心连心啊。

三

在旧社会,旅馆是剥削阶级寄生虫的淫乐场所,也是劳动人民的地狱。在这里,流氓、特务横行,强盗、骗子霸道。因此,旅馆工人不仅要受到旅馆老板的残酷压榨,常常还要遭到那

些所谓“旅客”的凌辱和敲诈，随时都会遇到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

高启元从一场伤寒中刚挣扎起来，人还没有复元，手脚干瘦得象芦柴杆一样，但是为了生活，为了给妹妹看病，为了还高利贷老板的债，他就拖着虚弱的身子上班去了。每天一到饭店里，他就要忙着服侍那些各种各样的旅客，给他们打洗脸水，叠床铺，送早点，冲茶倒痰盂。忙完这些，又要抹桌椅，擦地板，洗杯盘茶具，还得随时应付旅客的差遣。那些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剥削者、寄生虫，他们视旅馆工人如奴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稍不如意，还要辱骂殴打，拍桌摔杯，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

第一天，高启元就忙得头晕眼花，走一级楼梯两腿直颤。但是他想着家里十一岁的小妹妹，她的“瘰子颈”已经穿顶了。头颈肿得几乎和脑袋一样粗了。整天呻吟惨叫，有时痛得在床上直打滚。想到这些，高启元心如刀绞，他咬着牙，忍着累，决心等拆了帐后带点钱回去给小妹妹买点药，就是自己不吃飯，也要设法减轻些她的痛苦。

这天吃午饭的时候，店里突然闯进来七八个男人，有的穿长衫，有的穿西装。他们一坐下来，就大声叫喊：“茶房，来菜单。”

高启元和另一个茶房即刻递过菜单，他们七嘴八舌地一下子就点了十几个菜，而且全是名贵价高的。高启元估计，他们这一餐饭，加上烟酒，至少也得三担米钱，够穷人五六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但是，这几个家伙看来既不是资本家和投机商，也不象掮客跑街一类的中间人，从他们那不伦不类的打扮和不三不四的谈吐来看，倒象一群白相人或拆白党之类。

因此大家互相招呼，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别让这批恶棍找到什么岔头，免得生出是非。

一会儿，十几盆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摆得满满的一桌子，那几个家伙便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还吆五喝六地猜拳赌酒。高启元和另外三四个茶房一直忙到下午两点多钟，眼看快要收场了，不料其中一个家伙突然狼嚎般地咆哮起来：“茶房，快来！”高启元知道这批恶棍要找事了，便忙走上去说：“还要什么？”

一个家伙一拍桌子说：“要什么！？老子要跟你算帐！”

另一个茶房忙送上帐单说：“帐单早结好了，总共八百六十四元。”

“瞎了你的眼睛，你看看这是什么？”一个下巴上有条刀疤的家伙指着桌子中央一只大盆子说：“你们这是存心暗害我们！”

高启元和另外几个同事凑上去一看，见那盆子里丢着一只长长的香烟屁股，有半截还没有湿透。一看就知道这明明是他们自己丢进去的，却硬说是茶房搞的。不等高启元他们分辩，只听“哗啦”一声，圆台面被掀翻了，碗筷盆碟，汤菜茶水，泼了一地。有几个家伙还无耻地操着生硬的日语，学着日本鬼子的腔调哇啦哇啦地边吵边往外走。高启元等当然不肯放过他们，忙上前拦住说：“你们不能走，烟头不是我们丢的，你们必须把帐算清！”那个家伙眼睛一瞪，从腰间摸出一支手枪说：“你们这些茶房真不是东西，老子不同你们算帐就算便宜了你们，你们还要同老子算帐。好，老子今天没带钱，你要，就把这支‘白朗宁’压给你们，明天，请你们到七十六号来拿钱！”

谁不知道，极司非尔路（现在的万航渡路）七十六号是个

日本人的特务魔窟，被逮进去的人，就休想再活着出来。因此，那时人们一提起这几个字，就会不寒而栗。

事情闹到最后，老板出来了。可是他不仅不叫那些家伙付钱，却当面训斥茶房们不该得罪这些恶棍，又向他们说了许多好话，白白把他们放跑了。

那班特务走后，老板又倒过来向茶房们算帐，不仅酒菜钱全部要茶房们照付，打碎的碗碟也要照价赔偿，全部损失，都要从高启元他们几个人的帐上分期扣除。并且，老板还提出，如果这批特务不肯罢休，以后再闹事，仍要高启元他们几个人负责。

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是非本来就是颠倒着的，几个穷工人又到哪里去讲理呀！高启元心里很明白，老板和那班特务恶棍其实是一路货，与其说那几个特务对他们进行了讹诈，倒不如说老板和那班恶棍勾结起来压榨他们穷工人。

这天拆帐时，高启元被扣除那笔无名的晦气钱之后，所得的只是一个零头了。他为妹妹求医买药的打算又落空了。下班回家时，他路过药店门口，摸摸口袋，只好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妹妹那呼痛的惨叫声似乎又在他耳边响起，心里如万箭穿心。他想，今天即使不能给妹妹看病，也得搞点吃的给她带回去。多少天来，由于穷，妹妹生着这样的重病，也只好和一家人一起吃六谷粉糊汤。今天无论如何要给她熬点米粥吃吃。于是，便特地到一位同事家借了一斤大米。从同事家出来，天骤然黑下来，乌云低垂，眼看一场暴雨就要倾倒下来，他急忙加快脚步向家里赶去。奔到家门口，他两脚突然停住了。只听得从小阁楼上传来母亲撕心裂肝的嚎哭声。此刻，他一切都明白了，妹妹已吃不到大米粥了，她已经被这黑暗

的社会吞噬了。那包大米不知不觉地从他手里掉在地上，撒了一地……。

一阵狂风，卷起马路上的灰尘，刮得满天飞扬，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狂风席卷着亮晶晶的雨幕，向着远方横卷过去，似乎要把那黑暗的旧世界一扫而光……。

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都期待着从此会有好日子过。高启元的脸上也有了一些笑容。可是，反动头子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一心攫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国民党“劫收大员”到处为非作歹，敲骨吸髓，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旅馆业的老板，为了赚大钱，发洋财，到处增设了舞厅、酒吧间、咖啡馆。靡靡之音，随处可闻，美国水兵三五成群，到处寻欢作乐，调戏中国妇女。一面是反动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穷奢极欲，一面是劳动人民在失业、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一夜风雪过，路尸数百具。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

金山饭店老板把底层舞厅和酒吧间打扮得完全欧美化，美国侵略军时常在这里进进出出，往往喝得酩酊大醉，到处行凶闹事。高启元看着这些情景，原来对抗日胜利后的一线希望很快就完全破灭了。

那是一九四五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高启元刚接待好一个旅客，门口又闯进两个酒气冲天的家伙。大声叫唤：“仆欧，仆欧！”

高启元一看，就觉得这两个家伙来路不正，心里先就有些反感。可是一个做茶房的，什么样的人都得应付呀，只得上前招呼他们。走近身边，一眼看到他们胸前挂着的证章，才知道

他们都是“劫收大员”，心里更加对他们存了戒心，便把他们领到五楼开了个房间。谁知，那两个家伙左一个不满意，右一个不称心。高启元只得对他们耐着性子解释道：“先生，我们这小饭店，就算这儿几个房间最好了，……”

没等高启元讲完，一个家伙猛拍了记桌子说：“你给我少噜苏！”

高启元心里很气，心想：我虽是个穷工人，但一不抢，二不偷，三不鱼肉百姓，四不祸国殃民，比你们这帮子要干净得多。但他知道这话是万不能出口的，只要一出口，一场灾祸立即又会落到他头上。因此只好吞下这口气，随即给他们送上一壶热茶。那家伙因为酒灌多了，烧得口干舌焦，一见茶来，也不用杯子，端起茶壶就对着壶嘴喝起来。不料一下烫了嘴巴。忙放下茶壶，缩起脑袋连连往外吐。高启元看着这副丑态，忍不住想笑出来，但知道这是笑不得的。却不防那家伙伸出手来就打了他一巴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你自己不小心，怎么怪我。”高启元气愤地说，心里真想和他们干一仗。可是他们是两个人，而且一闹起来，老板肯定又会帮他们说话，结果倒楣的还是自己。因此只能忍气吞声，又给他们换了一壶温茶来。那家伙一摸茶壶，一口咬定这是别人吃剩的冷茶，一把抓起茶壶，劈面就朝高启元扔去。高启元幸而避得快，茶壶没有打在脸上，茶水却泼了一脸一身。那两个“劫收大员”见高启元这副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嘴里还连声叫着“好，好……”

高启元看着这两个疯子似的家伙，气得浑身发抖。他定了定神，抖落了一下身上的茶水，厉声问道：“先生们，你们开口闭口‘老子抗战八年’，这难道就是你们对老百姓的功劳吗？”

两个“劫收大员”的笑声嘎然刹住了。他们想不到，这个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茶房，竟会对他们问出这样的话来。一时目瞪口呆，竟回答不出一个字来。

第二天，高启元在打扫房间的时候，突然领班来通知叫他到经理室去。他听了心里一愣，“老板叫总不会有什么好事。”他跨进经理室，只见老板面孔铁板，瞪着恶煞似的眼珠，阴气沉沉的讲：“高启元，你昨天怎么招待客人的，你知道店内的规矩吗？”他一听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想：昨天哪里有怠慢过客人呢？这时，老板指着旁边的一把破茶壶说：“这把茶壶你得照价赔偿。”一看见这把茶壶，高启元就想起昨天被“劫收大员”侮辱的情景，满腔怒气又涌上心头，就顶了老板几句：“经理，做茶房的也是人，不过穷着点，但我们靠卖力气吃饭，可不是专供别人出气侮辱的。客人侮辱了我，摔坏了茶壶，你还要我赔，做茶房的难道都是该死的吗？”老板一听，却蛮不讲理地将台子一拍，说：“凭你这张嘴巴，就不会不惹客人生气，不要多讲，不赔茶壶，你就别在‘金山’吃这碗饭！”说完，将破茶壶往高启元面前一放，撩起长衫，头也不回就大摇大摆地走了。高启元看着这把被扔得缺嘴断柄的茶壶，两眼冒火，紧握拳头，真想一把夺过来，连同这个旧世界，砸个粉碎。

四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上海天气阴沉，天空乌云密布，大地黑沉沉一片；远处，不断传来阵阵春雷，震得高楼大厦也嗦嗦抖动。人们侧耳谛听，不，这不是雷声，这是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曙光出来了，天快要亮了！

国民党反动派越接近死亡，就越是拚命挣扎。那几天，警车响着鬼哭似的声音在马路上窜来窜去，到处乱抓人。那些当官的，一面叫嚣着“保卫大上海”，一面却领着姨太太，提着大箱小包，急急如丧家之犬地在马路上奔来奔去，准备登船逃命。

大街小巷，人们在窃窃议论：蒋匪帮已是秋后蚂蚱，蹦跳不了几天啦！

一天晚上，金山饭店闯进来一批国民党官兵，有的拎着皮箱，带着女人。阴雨的五月天还有些寒意，他们却喘着大气，满头是汗，完全象一群丧家之犬。可是，他们在茶房们的面前，还要摆出一副威势来。一些军官都住在四楼，他们仍是不知死活地喝着香槟酒、白兰地，喝得醉成一摊，就象一头头死猪似的躺在床上。酒醒后，又忙着瓜分不知从哪里抢劫来的赃物赃款。为分赃不匀，一个军官太太少分了三百元银洋，她就哇啦哇啦地吵了一阵，后来她想出了个坏主意，就说一只皮箱钥匙坏了，要茶房设法给她打开。与高启元同一个楼面的一位茶房不知其中诡计，就拿了一大串钥匙去试开箱子，碰巧把那个箱子打开了，那个国民党军官太太开始假称“谢谢”，她装模作样地翻了一下箱子，立刻怪叫一声，说：“啊呀，少了三百元银洋！”便一把拖住那个茶房说：“只有你有钥匙，一定是你偷的。”硬是要那个茶房赔出三百元银洋来。那个茶房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突然象演戏似的从里房走出一个国民党军官来，一把抓住他的胸口，恶狠狠地说：“小子，竟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撩起巴掌就想往他脸上打来。这时，同楼的茶房都闻声赶到，“不准打人！”“你说我们茶房偷钱，有什么根据？”“捉贼要捉赃，谁是强盗，谁是劫贼，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

子——明摆着？”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厚脸皮好象被黄蜂刺了一下，微微的抽搐了一阵，他尴尬地环视了一下，看到围着的足有五、六十人，感到众怒难犯，就把已经高高撩起的手又无力地放了下去。但是，当时政权还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结果不由分说，硬是把那个茶房送进了老闸捕房，说要等他赔了钱，才能放出来。高启元等职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如此横行霸道，便团结全店职工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五月二十四日的夜晚，解放上海的人民子弟兵突破了国民党匪军的市郊防线，一夜猛烈的枪炮声，震得敌人闻风丧胆，鸡飞狗走。住在金山饭店的那些国民党匪徒们听到这个消息，吓得魂不附体地各自逃命了。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市区。上海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上海一解放，那位被关进老闸捕房的工友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政权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在欢庆解放的那些日子里，高启元是多么激动啊！当他第一次听到别人以“同志”二字称呼他时，他不禁热泪盈眶了。多少年来，“茶房”“仆欧”就代替了他的姓名，多少年来，他牛马般地劳动，得到的却是无数的侮辱和歧视。现在，劳动人民，到处都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为人民服务，到处都受到社会的称颂和尊敬。对旧社会和反动派的仇恨，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在高启元身上迸发出一股无穷的力量。他以一个翻身工人的姿态努力为人民服务，积极投入改造旧上海的一切政治运动，感到自己越干越有劲，越活越年轻。在同不法资本家的斗争中，他不久就被大家推选为店里的工会主任，在

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斗争中，他又被同志们推举为人民陪审员，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他昂首阔步地走上人民的法庭，对那些胆敢破坏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旧社会残渣余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三年春天，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高启元终于找到了解放前被卖、失去联系十多年的二妹。亲人团聚，一家人分外激动。高启元眼含泪水地说：“旧社会使我们一家家破人亡，骨肉分离。新社会使我们一家人重新团聚。我们要世代记着毛主席的恩情，记着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命根子！”

这些年来，高启元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一九六〇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接着又担任了公方经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金山饭店改名为五岭旅社，他又担任了这个店的负责人。但是，老高还是那样艰苦朴素，还是那样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时刻警惕地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展开斗争，赤胆忠心地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步深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着越来越深刻的变化。领导与群众，旅客与服务员，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情如手足的阶级兄弟。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在旧社会受尽折磨，高启元一直患着胃病。解放后，经多次治疗都无法根除。一九七一年一月，老高的胃溃疡严重发作，终于不得不住进第三人民医院进行切除手术。在他身卧病床的那些日子里，在他大手术后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刻，全店的革命职工和工农兵旅客川流不息地去医院探望和照顾他。那天，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见床前围着许多职工和旅客，一张张脸上，都带着忧虑的神色，见他醒来，大家才如释重负地露出了笑容。一位旅客还过

来握住他的手说：“老高同志，你好些了吗？我代表全店旅客向你表示问候，希望你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老高动了一动嘴唇，激动得热泪泉水般地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脑海里又浮现起解放前那些满脸横肉、张牙舞爪、如狼似虎的所谓“旅客”。面对着眼前这些笑容可亲、情同手足的工农兵旅客，怎么能不使他激动呢？这种激动又化为一股力量，使他更加千百倍地去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和旅馆服务员的工作。如今，老高虽然已是六十一岁的人了，但是他人老心不老。他牢记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深深懂得旅馆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他紧紧地团结全店职工，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那些地、富、反、坏、右和流窜犯、盗窃犯、诈骗犯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

一天，旅馆里来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家伙，他自称是“解放军”，在部队里担任“参谋长”。但是，听他的谈吐，看他的举动，却又不象是解放军。高启元 and 全店工人就警惕起来，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在各方面的配合下，终于由公安机关把这个冒充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坏蛋抓了起来。在公判大会上，高启元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旅馆是工农兵的旅客之家，我们的大门为工农兵敞开着，我们热情地欢迎和接待工农兵旅客；但是阶级敌人要是冒充工农兵旅客，妄图利用旅馆这个阵地来干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勾当，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撒下了天罗地网，管叫他们有来无回！”

高启元和五岭旅社的职工们，以自己的行动履行了他们的壮言。特别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职工们狠批了林彪和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更加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

觉悟，警惕地守卫着旅馆这个社会主义商业阵地，用实际行动回击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狼子野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冲锋陷阵。

上海市黄浦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高楼大厦是见证

——上海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退休老工人吴田根讲家史

在上海,有许多高楼大厦。这些高楼大厦,不论是解放前的还是解放后的,都是我们建筑工人盖的。不过,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高楼大厦盖得越多,资产阶级就越是发财,而我们劳动人民就越是贫困。资产阶级不仅用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血汗造高楼大厦,而且这些高楼大厦的整个建造过程,都拌和着我们建筑工人的血汗和泪水。可以说,这些高楼大厦不是造在平地上,而是造在我们劳动人民的背脊上,造在我们建筑工人的尸骨堆上!

在旧社会,我们建筑工人为资本家造高楼,等这些高楼造好后,我们就连在这些高楼前站一站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走进去了。现在,我们为社会主义盖高楼大厦和工厂,造得越多,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越富强,劳动人民越幸福,我们建筑工人也越光荣。解放后,我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被邀请到北京去参加国庆观礼,在那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我说,这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啊,都是我们建筑工人在两个不同社会的两种不同命运的见证。

毛竹月下苦挣扎

我出生在上海县朱行农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我童年时，全家九口人就靠仅有的两亩薄地生活。正常年景也只能吃些薄粥和糠菜，碰到天灾歉收，那就更困难了。农忙一过，到了冬天，一家人要吃要穿啊！父亲只好带我一起去给别人运棉花，挣几个钱贴补家用。那时，朱行镇上有家轧花厂，每天要把轧好的棉花运到上海曹家渡一家纺织厂去。父亲租了一辆独轮车，他推我拉。开始拉车时，我还是个八岁的孩子，能有多大力气？三、四百斤的棉花包，来回四、五十里路，而且走的都是田间小道，一遇下雨，满是泥浆，独轮车陷进泥里，拉起来格外吃力，绳子背在我肩上，真是走一步眼前冒一阵金星。家里做不起鞋子，只好赤脚。晚上洗脚时，母亲看到我脚上一道道血口子，只好流着眼泪找点破布条包一包，第二天又出去了。

就是这样拚死拚活地做，还是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时常借债。当地一个反动富农总想夺我家的两亩田，父亲宁可饿死也不去向他借债。别的财主也是黑心肠，有一个地主又想利用阎王债霸占我家的塘边田。我父亲只得今天借东家还西家，明天借西家还东家，千方百计地想保住两亩田。父亲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为了给我找条生路，让十岁的弟弟接替我拉车，托人把我介绍到徐家汇大木桥一家竹匠店里去当学徒。那时我才十二岁。

乡下活不下去，当学徒又哪里有出路！

旧社会，竹工行业有个“规矩”，竹匠老师傅是不准带徒弟的，只有开了竹匠店当了老板才能收徒弟。我的老板徐隆盛，

仗着他姐夫开石灰行、拜老头子，有财有势，收了五、六个（以后多到二三十个）学徒，开起了这笋竹匠店。他从来不做生活，就是吸足了鸦片，在外面找靠山，拉生意，全靠剥削我们学徒的血汗发财致富。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要起来烧好早饭，再到肇家浜臭水河里去洗毛竹。双脚浸在臭水里，用稻草把毛竹上的泥洗干净，一洗就是几个钟头，这份苦已经够受了。一到冬天，就更加难受，有钱人在这个时候还钻在被窝里睡觉呢，我只穿着一条单裤和一件夹袄，敲开冰层下河去，刺骨的北风一吹，浑身象筛糠一样颤抖。日子一久，我的两条腿得了关节炎，脚上手上都裂开了，稍一用力，鲜血直冒。有一回，在上海做工的姑父来看我，见到我穿着单裤站在碎冰河里洗毛竹，手脚冻得象胡萝卜一样，难受得眼泪直流。等我洗完毛竹，正向岸上爬，因为双脚早就冻僵了，两只手也失去了知觉，脚立不稳，就摔倒在河边，姑父赶紧把我扶起来。我看见姑父，有多少话要对亲人讲啊，可是我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并叫我姑父回去不要把我的苦处对父母讲，免得让他们知道了伤心。

两、三年以后，我也跟着师兄到建筑工地去搭脚手架。那时，有一个工地在沪西的一家纺织厂内，为造一座四、五十米高的烟囱搭脚手架。

那时正是盛夏季节。我们每天都要天蒙蒙亮就推着车，乘早走十几里路，把毛竹从肇家浜运到沪西周家桥。脚手架越搭越高，师傅们的操作就越来越艰难。脚手架没梯没栏，从地面爬上去，只能双手抓住毛竹，两脚翻上横档，一层一层艰难地攀上去。等爬到脚手架上面，早已精疲力尽了，可是，一天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呢。

我初上工地，师兄们只要我在下面传毛竹。脚手架升高了，从地面传上去够不着，我也得爬上两层脚手架，把毛竹传递上去。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个子又矮小，两只手连档子也够不着，怎么翻上去呢？我只好顺着—根毛竹，象爬杆那样慢慢地朝上登。站在脚手架上，我抬头看看在最上面操作的师兄，好象站在云端里，真为他们捏一把汗；低头看看，离地几丈高，站在滚圆的毛竹横档上，自己也不由得吓出一身汗。

七月的太阳好象要把人烤干一样。可没有一处遮阳的地方，处处晒得滚烫，两只脚在脚手架上烫得站也站不住。我们热得嗓子冒烟，老板却连一滴水也不供给。

脚手架高，上下不便，所以师兄们从早上爬上去以后，一天就不能下来。午饭是我每天回店里去挑的，师兄们从半空里放下一根绳子，把饭吊上去吃。刻薄的老板娘，打饭总是打得紧卡卡的，我们吃不饱，也只能勒勒裤带挺过去。

白天在工地上劳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店里，还要做两三个钟头夜工，劈竹篾，做竹篮、扁担、粪桶环子等竹器，放在店堂出售。当我们五、六个师兄弟做夜工的时候，老板的鸦片烟也吃完了，他把竹榻往工场里—放，躺在那里盯着我们做生活。谁稍微有一点瞌睡，老板竹榻边放着的那根毛竹片，就会落到谁的头上。有一次，我发了寒热，白天还是强打起精神，照样到建筑工地去工作，爬了一天的脚手架，一到晚上，人倦得尽想睡觉。我劈着竹篾，心里想着：“可不能打瞌睡呀！”但两只眼睛怎么也不听话，上下眼皮象粘了浆糊似的，怎么也睁不开。忽听得老板一声吼叫：“小赤佬！”毛竹片已经打到我的头上。我猛醒过来，竹刀已经劈在手上，顿时鲜血直冒。我一摸头，挨了老板的那记毛竹片，已经凸起一个大疙瘩。我忍着伤

痛，看看躺在竹榻上瞪着两只眼睛的老板，心里愤恨交加。

我手上受了伤，可老板还要我下河洗毛竹、淘米、洗菜、洗尿布，不几天，手就肿了起来，伤口发炎溃烂了。老板看我实在不能到工地上去给他卖命了，就叫我在店里照顾门市生意，卖竹头，卖扁担、竹篮、粪桶环子等竹器。

夜里，当我钻进那人都站不直、腿都伸不开的小阁楼上去睡觉时，师兄弟们正在轻轻地谈论着一天的所见所闻。年岁稍大一点的阿林问我：“今天卖掉几根扁担？”

“卖掉十几根。”

“那老板又高兴了，五、六天开销足够了。”

我还是进店以后第一次做门市生意，不知道阿林师兄为什么别的不问，专问卖了几根扁担，也弄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忙问他：“怎么光卖掉十几根扁担，就可以开销五六天？”

“你以前没有做过门市，还不懂老板的生意经。我算给你听：一根毛竹一劈两，可以做两根扁担，两对粪桶环子，多下来的竹梢，再可以做一只篮子。卖出一根扁担，就可以收回一根毛竹的本钱，其余的钱就是净赚的了。今天卖掉十几根扁担，就净赚了十几条扁担、十几只竹篮、二十几对粪桶环子的钱，再加上到外面工地上去做的收入，老板今天一天的进账，开销五六天还是少算的呢！”

另一个师兄插嘴说：“他用我们几个学生意的，一天能化几个钱开销！又不要工钱，一个月只发两个铜板的剃头钱，吃些咸菜汤、黄米饭。所以他不用老师傅，尽用学徒做，就是开销省、赚得多呀！”

阿林师兄接着说：“是啊，要不，老板、老板娘身上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哪里来？还不是我们手里做出来的！”

我听了师兄们议论老板的黑心生意经，不禁想起家里的父母亲，他们终年劳累，却养不活一家老少，父亲为了保住两亩田，正带着弟弟拚死拚活地拉车运棉花，还不得不把我送出来吃这份苦，……天底下为什么这样不平啊！

“遮羞笆”里受煎熬

到了我十七岁那年——一九三二年，老板到处钻营的结果，和其他资本家合伙接到了做国际饭店工程的竹篱笆生意。这对老板来说，又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在接到这笔好生意的那几天，老板一反常态，当我们晚上在工场里开夜工的时候，他不再躺在竹榻上了，而是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两只眼睛不停地从这个看到那个。我正在捉摸他又要搞什么鬼花样时，忽然老板在我身边站定下来：“田根，你跟我来。”我跟他走到房间里，老板“嘿嘿”地干笑了两声，拍了拍我结实的肩膀，皮笑肉不笑地说：“这几年你生活还学得不错，脚头也硬。今天，我诚心抬举你，让你去做国际饭店的脚手架，开开眼界。生活做得好，一年后就让你满师。”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老板还有这么一张笑脸，也从来没有听见老板用这样的声调对学徒讲话，心里感到奇怪。我知道做高层脚手架在那时是一种卖命的活儿，但觉得一年后如能满师，生活总会好些了，因此就咬咬牙答应了下来。

国际饭店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当时统称“四行”）的资本家，搜刮劳动人民的血汗合资建造的。靠南京西路正门的招牌是“四行储蓄会”，转角上的大门招牌才是“国际饭店”。二十四层大楼全高二百五十尺，面积一万三

千平方尺。

我冒着寒风来到国际饭店工地，那里的基础工程已经完成，脚手架正向一层楼以上伸展。好多衣衫褴褛的工人，个个都闷着头，不停地工作着。一些十二三岁的小泥工，赤着双脚，挑着泥桶来回不停地奔跑。我正看得出神，忽然传来“唻哨！唻哨！”的号子声，两个工人扛着一大箩筐碎石子，迎面走来。走在头里的那位工人已经上了年纪，头发都花白了，杠棒压得他摇摇晃晃，蹒跚着步子艰难地向前移动。他们踏上脚手板，正向一层楼的脚手架扛去，那位老工人摇晃得更厉害了，忽然“哗啦”一声响，连人带箩筐翻了下来，虽说只离开地面几尺高，但跌在地上还是站不起来，扶着腰直喘气。我赶快奔了过去，刚把那位老工人扶了起来，一个歪戴礼帽、叼着香烟的监工头已经窜到面前骂了起来：“妈的，没力气也想吃这碗饭，趁早回家去坐着，别到这里来骗钞票！”那位老工人愤怒地朝监工头瞪了一眼，又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小阿弟，谢谢你。”他强打起精神，把散在地上的碎石子装进箩筐里……。

我望着建筑工地上的这一幕情景，不由得心寒起来。那脚手板，不过二十公分宽，刚好只能站一双脚。刚才那两个工人从几尺高的脚手板上翻下来，就跌闪了腰，可这脚手架还要升高啊，我将踏在这脚手板上扎竹篙笆，一直要扎到二十四层楼，要是一个闪失，从几十丈的高空摔下来，还不粉身碎骨！怪不得在建筑工人中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形容那高空作业的苦难：

毛竹搭上白云间，攀架好比走电线；

工头吆喝如催命，一脚踏空把命垫。

这时，我明白了老板叫我来国际饭店工地的用意。因为我还没有满师，老板怕我不乐意，不卖力，所以才捧我几句。我

进一步看穿了老板的鬼主意，更加恨透了他。

国际饭店工程由馥记营造厂承造。营造厂资本家为了防止工地上的材料失落，所以要在脚手架周围，从底到顶扎上一层竹篱笆。其实，这是一层资产阶级的“遮羞笆”！有多少工人兄弟，在这“遮羞笆”里面当牛做马，养肥了资本家，而自己却填不饱肚子；有多少阶级兄弟，在这“遮羞笆”里被资本家压榨得精疲力尽，惨死在脚手架下！

有一次上工不久，我就听到工地上人声嘈杂，“跌死人了！”的叫喊声从地面传到高空中来，一个工人从十几层楼的高空掉下去了，当场惨死。我们几个竹工探过头去想看一看，工地上的监工头马上叫喊起来：“看什么，快做！快做！”当国际饭店建成后，在底层电梯间角落里就发现受难工人的尸骨。这些残酷的阶级压迫惨景，都给这一层“遮羞笆”掩盖起来了。

国际饭店造了三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我就在那里扎了两年竹篱笆，从地面一直扎到二十四层楼。营造厂的资本家为了加快工程的进度，使每个工种交叉操作，规定我们竹工一定要在夜里扎竹篱笆。每天在店里吃过晚饭去上工，做一个通宵，第二天回到竹匠店里才能吃到早饭。尤其是冬天，高空的西北风特别大，特别冷，我只有穿一条单裤，寒风吹来，只能把上身的夹袄用根竹篾扎扎紧。还要特别当心不能打瞌睡，一打瞌睡，就有从高空中摔下去的危险啊！

虽说步步留神，还是免不了有个失手的时候。那是个冬天的夜里，竹篱笆已经扎到十三四层楼高了。在老板家里吃的两碗粥，还没挨到大马路上的跳舞厅散场，我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地叫了。可在那高空里，不要说弄点什么吃的，就连想喝口热开水暖暖肚子也得不到。后半夜的西北风更大了，刮得

几盏小电灯泡摇来晃去，忽明忽暗。脚手架、脚手板上，又慢慢地结起一层霜来。我身上又冷又饿，两只脚冻得麻木了，手也冻僵了，只得把手指放在嘴边呵呵热气，继续做下去，不时地看看东方的天空，希望快些天亮。忽然，我感到一阵头晕眼花，脚下一个踏空，人直往下面斜摔下去，我赶紧抓住脚手架，拚命抱住，两脚已经悬在空中了。好险哪，差一点就摔下去粉身碎骨！等到几个竹工兄弟把我拉到脚手板上，我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虚汗。

在国际饭店工地做了一年，老板答应我满师的时候到了，可是老板假痴假呆，一句也不提。我鼓足了勇气去同老板讲。老板哼哼鼻子说：“要满师？好啊，给我办四桌满师酒，要八元钱一桌的。”好大的口气，八元钱一桌，相当于一担米钱。四桌酒三十二元钱，就要三、四担米钱。我在他店里干了五年，身上穿的还是从家里带出来的夹袄单裤，一个钱也没有，怎么办？我趁一个空档，赶回家去，和父母商量。

父母听说办满师酒要三十二元钱，也听得呆了。本来认为我出来学生意，家里可以省一点开支，可这三五年来，家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多背了几处债。如今我又要这么多钱办满师酒，这钱从哪里来呢？

“出去借借看吧！”阿爸说着便走出了门。向谁去借呢？穷乡亲们是力不从心的；财主人家，阿爸欠他们的旧账还没还清，再去借能行吗？阿爸在村上、镇上转游了一个下午，直到天黑了才回家。

阿爸一进家门就愤愤地说：“有钱人真可恶！”我一听这句话，就知道他今天又碰了壁。阿妈着急地问：“怎么啦？”阿爸说：“我连找了三、四个财主，都不肯借。最后在镇上找到了张

老板，向他张了口，他白白眼睛说：‘钞票么，我手头还有一点。可你欠我的账也实在太多了，再加上三十元，你到哪年哪月才能还得清？’我说，等我家田根满师以后慢慢地拨还他，他却一个劲地摇头。我横说竖说，旁边几个熟人也帮我说情，他才说：‘看在老乡亲面上，再帮你个忙吧，不过，你要拿一样东西来押着。’我说，家里穷得连老鼠都搬了家，有什么东西可以作押的！他打了个哈哈说：‘你这个死脑筋，那两亩塘边田，……’我听到他要打我家两亩田的主意，真象尖刀戳进了我的心，气得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过身子就走了回来。”

阿爸叹了口气对我说：“阿爸弄不到钱给你办满师酒，你就留在家里吧，反正你已经学会了手艺，今后不怕没饭吃。”

阿妈着急地抢着说：“这怎么行啊！不满师，谁肯要他去做生活呢？西村上祥根的事，难道你忘了？”

祥根是西村张家的儿子，比我大四、五岁，也在上海学竹匠。两年前就该满师了，因为没钱办满师酒，回家打算做零活，可是无论是竹匠店里还是工地上，听说他没有满师，没有一家肯用他，老板又找上门来要五年的饭钱，最后，祥根不得不又回到老板店里去继续当学徒，直到这一年老板还不让他满师。

阿爸紧锁着眉头说：“这世道，真把穷人逼死了！”

父母商量来商量去，直到半夜，阿爸痛苦地作了决定：“看来，只好把两亩田的田单押出去了！”他又殷切地对我说：“田根，这两亩田是家里的命根子啊！你满师以后，一个小钱也要积起来，一定要把两亩田赎回来！”

就这样，我在做国际饭店的工程中，非但受冻挨饿，差一点摔死，还背了一身债，典押掉两亩田。

而资本家呢，在国际饭店工程中不知发了多少财。不说“四行储蓄会”的资本家在国际饭店建成后搜刮了多少钱，营造厂老板发了多少财，就是那个小小竹匠店的老板徐隆盛，从国际饭店工程中捞进的，加上平时剥削我们的那些黑心钱，就在大木桥头地造屋，盖了十间房子。

重重牢笼难脱身

办过满师酒，总能有工钱了吧？不料老板又把脸一沉说：“我好不容易教你学会了手艺，拍拍屁股就想跑？没那么便宜！再帮我做一年。”就是说，名义上是满师了，实际上再要当一年学徒。我心里气透了。这个“鸦片鬼”从来不做生活，哪里教过我手艺？我的手艺是向师傅们学的。但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是没有我们工人讲理的地方的。我只得再做一年帮工。

这一年帮工，对我来说真比过去五年学徒生活还难熬。因为家里是典押了那两亩赖以生地的土地给我办满师酒的，自然，父亲也把赎回那两亩田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现在，只好把这个希望再往后推一年了。当我一年帮工做好，国际饭店的竹篱笆生活也结束了。我想，这一回我总可以跳出徐隆盛竹匠店这个牢笼，自己出去赚工钱了。但看看老板还是若无其事。我也不去管他，就跟着其他老师傅一起到徐家汇一家茶馆店里去寻生活做。那时竹工寻生意也和其他建筑工人一样，要每天一清早就去等在茶馆里，等包工头、老板来雇佣。等了两天，好不容易等到徐家汇一家竹匠店要我去。第三天早晨，我就兴冲冲地去上工了，谁知一到工场，老板就对我说：“我们这里人已用满，不再需要了，你还是另找门路吧。”

好象一盆冷水，从头顶一直浇到脚跟，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想再同老板交涉一下，即使工钱低一些我也愿意干。如果没工作，不仅使父亲赎回两亩田的希望落了空，连我自己的生活也没着落啊！可是那老板除了先前说过的以外，再不愿意多说一个字。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沮丧的心情离开这家竹匠店，又一连在茶馆店里等了两天，还是没有一家竹匠店雇佣我。我想，这一下可完了。两亩田赎不成，自己的肚子也混不过去了。过了几天，徐隆盛老板叫人来对我说，如果我不愿在他店里做，他可以给我另外介绍个地方。我想，这“鸦片鬼”怎么倒对我发起“善心”来了。本想不理他，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出路。没有办法，我只好又答应了。

那时，锦江饭店的工程正在进行。锦江饭店的工程虽然比国际饭店早动工，但结束得迟。这里的竹篱笆生意是一家叫顾永泰的老板包的，于是，我就被介绍到顾永泰那里去锦江饭店工地扎竹篱笆了。

锦江饭店工地和国际饭店工地一样暗无天日，我同样是起早摸黑地爬高落低，受冻挨饿，时刻处在生命安全毫无保障的条件下给老板卖命。在这个工程中，我就亲眼看到两个工人被吊车上的角铁撞倒，从八九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摔得血肉模糊，当场毙命。那时，一般老师傅的工钱都是八角一天，可是我却只有四角一天。这算什么道理！我马上去找顾永泰老板讲理，顾永泰却对我笑笑说：“这个你回去问徐隆盛吧。”我又立即去找徐隆盛，他却蛮不讲理地把眼珠一瞪说：“你想拿老师傅工钱，那除非跳出我这片店。”我气愤地说：“我现在是顾永泰竹匠店的老师傅，早已不是你店里学生意的了！”这“鸦片鬼”却嘿嘿冷笑着说：“翅膀还没长齐，倒想远走高飞了。

学满师，帮三年，这是老规矩。”

原来，在顾永泰接到了锦江饭店的竹篱笆生意后，知道我在国际饭店干过这种活，就向徐隆盛借我去，徐隆盛又向徐家汇一带的竹匠店打了招呼，不让别人用我，就又把我在他的手掌里，把我当做工具一样转借给了顾永泰，并讲好我的工资一半交给徐隆盛。这些黑心黑肺的吸血鬼，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他们为了残酷剥削我们工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的！顾永泰这个吸血鬼，靠剥削我们工人，进出坐包车，住的是洋房。他在锦江饭店这个工程中，从我们工人身上剥削的血汗，仅在他的家乡，就造了一条街的房子，后来在市区里又造了花园洋房。

父母指望我满师后，能够积一点钱，把那两亩田赎回来，可我一天只有四角工钱，填饱肚子都不容易，哪里积得起钱呢？而偏偏在这时，我弟弟又忽然生了急病，我得到消息，赶忙奔到家乡。弟弟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父母亲急得团团转。请医吃药都要钱，但这钱从哪里来呢？自从家里那两亩田典押出去后，生活更加困苦，父母亲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地苦打苦熬，把希望全放在我身上，可是我却一分钱也拿不出。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父亲说：“还是救人要紧，两亩田是再也保不住了！”母亲坐在床沿上淌着眼泪看看病危的弟弟，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于是我父亲找到那个典押我家两亩田的张老板，把两亩田卖了，还去旧债，剩下几担米钱，为弟弟看病。

锦江饭店的竹篱笆工程一结束，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决心要离开徐隆盛这个吸血鬼。徐家汇一带是他的所谓“势力范围”，一定要走得远些。我就和几个师兄一起，跑到郊区农村里找了点生活，混过一段时间再说。我事先和父亲约好，在

我离开的那天，由我父亲到徐隆盛竹匠店里去，借口要为我拆洗被头，把一条棉被拿了出来。老板见我们几个师兄跑掉了，等于拔掉了他的“摇钱树”，当然要到处寻找。过了一段时间，风声渐渐平息了，我才到曹家渡一带去接点生活。

可是，我逃出了徐隆盛竹匠店这个小牢笼，却逃不出旧社会这个大牢笼，所有的资本家都和徐隆盛一样的黑心肠。作头、档手、二包、小包，层层盘剥，建筑工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为社会主义大厦搭脚手架

上海解放，几十年苦难的生活终于熬到了头，那几天，我真是高兴极了，走在南京路上，感到一切都变了。走过国际饭店时，在旧社会的国际饭店工地上挨冻受饿差一点摔死的情景，又在我脑子里翻滚。抬头一看，从十几层楼上挂下来的大幅红布标语：“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表达了我们工人的心里话。

解放后我做的第一个工程，是为曹杨新村搭脚手架。解放前，我们工人创造了多少财富，可是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住茅草棚，睡“滚地龙”。旧上海的夜晚，到处都可以看到没有房子住的穷人露宿街头，一到冬天，也不知要冻死多少没吃没穿没住处的穷人。我在上海给有钱人造了几十年大楼，可是连一天舒服觉也没睡过。今天，党和毛主席要为工人造新楼房，心里怎么能不激动呢！想想这些，我觉得浑身是劲，手中的毛竹也象轻了许多。每天一早就来到工地，抢时间做些准备工作。翻身的工人干劲特别大，工地上热气腾腾，恨不

能一天就把一幢房子造好，让我们翻身的工人弟兄们早日搬进舒适的工人新村。

解放后，我们每竖一根毛竹，每扎一根箴，都是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都受到党和人民的极大鼓励。

一九五六年，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上级领导同志在工地上找到了我，把一张鲜红鲜红的请帖放到我手里，高兴地说：“老吴，党和政府关心先进生产者，请你到锦江饭店去参加宴会。”我双手捧着这大红请帖，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我穿着整洁的服装，手持大红请帖，兴奋地走进了这幢自己参加建造的大楼。

昔日的奴隶，今日的主人。旧社会的一个穷竹匠，今天，却被用大红请帖请进了大楼。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这恩情真是比海还深！我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思潮滚滚，心情激动。看看身边同来赴宴的工人同志们，也个个激动得两眼含着泪花，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在党组织的教育下，我渐渐懂得了，解放前的四十年，为什么那样苦，跳来跳去跳不出资本家的牢笼？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维护着残酷的剥削制度，对劳动人民进行着血腥的统治。解放以后为什么这样甜？因为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今后，我们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还要为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于是，我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一九五七年，我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工作与生活更有了明确的方向。

一九六六年，我们工程队接到了支援内地建设的任务。同志们照顾我，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家里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参军去了，小儿子还小，家里需要人照顾，所以一再劝我不要到内地去了。具体的困难确实存在一些，可是，与社会主义大事业比起来，个人的困难再大也是小事，我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支援内地建设，是毛主席的号召，是革命事业的需要，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革命事业的关系，高高兴兴地去支援内地建设。

刚到内地，只见山连着山，岭连着岭，没有一间住房，没有一座食堂，真是“头顶青天，脚踏山沟”，一无所有。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明确了内地建设的意义，立下了开山劈岭造厂房的雄心壮志。有毛泽东思想的明灯照亮，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我们在山沟里搭起了芦棚，安下了家。

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没有食堂，没有炊事员，到哪里去吃饭呢？几里路以外的贫下中农知道了，主动来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搭伙；山上没有水源，我们得到山下去挑水。刚进山时，机械设备都没有运到，我们竹工下了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日夜奋战，架设各种临时设施所需要的工棚，为建筑工人大部队的到来创造条件。尽管困难重重，可是，我们的同志没有一个叫苦的。因为，我想到，这与旧社会吃的苦比较起来有根本的不同。旧社会，是被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苦，现在，则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打击帝修反，造福于子孙后代。这样一想，劲头就更大了，什么样的艰难也不在话下。我把多扎一根篾，多竖一根竹，多流一滴汗，看成是对社

会主义事业的一份贡献。

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党支部书记突然到宿舍把我叫醒，激动地说：“老吴，祝贺你！公司刚来了电话，要你明天就出发到北京去参加国庆观礼，去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听到这个喜讯，我顿时高兴得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解放这些年来，我没有为党为人民作出多大贡献，可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连年评我为先进生产者，今天又要我到伟大首都北京去观礼，这是我在旧社会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同志们听到这个喜讯，也都高兴得睡不着觉，纷纷涌到我宿舍里来，共同分享幸福和欢乐，我觉得这是毛主席给我们全体建筑工人的荣誉。同志们都反反复复地嘱咐我：到北京去，要代表我们建筑工人向毛主席问好。

那几天，我激动的心情一刻也不能平静，在北京高大壮丽的旅馆大楼，住着我们一千五百名来自祖国各地的观礼代表，首长们天天来看望我们，并且一再问我们是否吃得惯，睡得好，就象招待贵宾那样招待我们。

国庆节那天，我十分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我不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观礼以后，我们又向首长提出，希望能再一次见见我们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最了解工人的心情，当他知道了我们的心愿后，马上就同意了。一天晚上，毛主席和代表们一起，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观看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一次接见了我们。毛主席非常关心我们上海工人，我听到毛主席问周总理：“上海的代表在哪里？”周总理朝我们这边指了指，毛主席就向我们招手示意。

那天,我嗓子喊哑了,手掌拍肿了,到接见结束,我真想再喊几声“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再拍几次手。回到旅馆,我怎么也睡不着,新旧两个社会制度下的不同遭遇,一直在我脑子里映现。在旧社会被资产阶级踏在脚底下的工人,今天毛主席把我们请到他老人家身边作客。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幸福的呢?!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革命和生产的劲头更足了。我要一生一世跟着毛主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干革命,搞建设。我没有文化,搞革命大批判有些困难,就请教小青年,教我认字,帮我整理。我积极参加了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战斗。在生产中,同志们见我年纪大了,总是照顾我,要我休息休息,可是,每当我攀登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真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再加劲干它个几十年!

今年我六十四岁,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思想永远也不能退休。林彪这个卖国贼不是要搞“克己复礼”吗?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那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又要回到帝国主义、资本家手里,又会成为压在我们背上的一座座的大山。所以,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是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的大事。让林彪搞“复礼”,我们劳动人民就会遭殃,这是我们坚决不答应的!我虽然放下了手中的工具,但决不能放下思想上的武器,要坚决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不断地升高、升高,一直造到共产主义。

上海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工会、团委工人业余写作组整理